

目 录

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	乌兰夫
乌兰夫同志同内蒙古广播电台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编者的话	
来之不易	
——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	
而作.....	陶克涛 (1)
乌兰夫副主席在土默特左旗.....	张金阳 (23)
投身革命奔赴延安.....	浩 帆 (26)
在延安的学习与生活	
——《我的回忆》节选.....	云祥生 (42)
忆“蒙汉联合支队”和羊都庙战斗.....	(54)
	王秉义 忆述
	赵国恩 整理
日本投降后第一个旗政府的成立	
——兼述旗长色木腾大喇嘛.....	塔 拉 (59)
朱实夫人狱.....	经瑞霞 (65)
玉禄生平概述.....	程景华 (73)
土默特旗工作回顾.....	李 丰 (76)
团结就能胜利	
——忆我们在土默特旗工作的片断.....	(84)
	郭启民 徐史
	李子金 任儒
结束旗县并存前后的片断回忆.....	韩振誉 (89)

光辉的里程

- 前进中的土左旗……………旗委宣传部 (99)
- 一九四六年绥远蒙古自治请愿团
- 赴南京请愿亲历记……………殷石麟 (112)
- 康旅奇袭令狐团……………张希孟 (117)
- 匪徒血洗朝号记……………张尔杰 (122)
- 大青山来了八路军……………史银堂搜集整理 (133)
- 忆兴蒙学院学习的土默特旗籍学生片断……………胡克今 (142)
- 忆母校土默特旗立高等小学
- 兼述土默特旗立蒙文专修学校……………丁成贵 (147)
- 恒升同志编年……………乌云毕力格 (150)
- 抗战胜利前后的毕克齐教育……………王道 (155)
- 记土默特旗农业大学……………云志刚 (165)
- 土默特左旗察素齐第一中学简史……………察一中供稿 (169)
- 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学校的沿革……………云文瀚 荣世德 (194)
- 土默特旗工商业联合会……………薛益寿 (209)
- 民生渠史话……………冯宝璋 (219)
- 三朝亲历话今朝……………张志炯 (231)
- 忆往思今话内蒙

为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

周年而作……………张希孟 (235)

来之不易

——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而作

陶克涛

40年前，随着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随着新老解放区的日益巩固和扩大，适应内蒙古民族与内蒙古地区历史发展及为夺取反美蒋反动集团斗争的更大胜利的需要，一个新的地方民族民主政权，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它在各有关地区的中央局或分局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及联系于人民的各族代表人物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各盟旗已经建起的民主政府基础上，以战斗的姿态轟轟然出现在伟大祖国的北疆。这个政权就是后来誉之为“中国各民族自治区的良好榜样”^①的内蒙古自治区。

正如众多的革命事物在它初出现时所表现的首创性一样，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也具有它的历史首创性。内蒙古人民之有这样一个真正民主的统一政权，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它不恢承前绪，不因袭成式。脚踏实地，自辟坦途，其彪炳于蒙古史册，足为革命垂统者，正不可等闲视之。然而从它的起始到终端，从入手到功成，却并不曾一帆风顺，一蹴而得。恰恰相反，那是有一个认识和论证的过程，也有一个卓绝的实践和斗争的过程的。那里面有险阻，有迂回，有顺利，有逆转。这种曲折的经历不光贯串

^① 《人民日报》1954年2月28日社论。

在政府建成之前，就是在它建立之时，也还是有着某种交织的。但是，不论如何，真理与人民毕竟取得了胜利；自治政府的旗帜终归飘扬在蒙古的高原之上。“历史是由于百万人独立创造的。”^①在这里，人们不能不想到那时为实现自治而尽力，为自治政府的建肇做出贡献的人民及老一代革命者并对他们表示由衷的崇敬。

“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②内蒙古民族为企求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机构，已奋斗了多少个十年；内蒙古的共产主义者为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原理运用于内蒙古实际，以之战胜各种谬误思潮而实现改造旧内蒙的目的，也已经奋斗了多少年。

“历尽人间风波恶，终连飞栈成坦途”。时序进程到40年代，到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奠定，是内蒙古民族历史发展及人民自治运动的必然归宿，是内蒙古人民长期以来寤寐求之的公意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多少年来存在于人们中间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论辩的终结。不难设想，这一政治机构的建造，不特有其独特的政治与历史的伟大意义，并且也具有其理论实践的意义。马克思曾说：“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③内蒙古自治政府创建的实际经验，据我看来，毫无疑问，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将有助于关于内蒙古民族自治问题理论方案的逐步臻于完善。

从1947年5月1日算起，到今天，内蒙古自治政府及“我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发展最快”^④的内蒙古民族自治区，已经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282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417页。

④ 李先念同志1957年4月30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载《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3编第115页。

胜利地度过了它的40个岁月。当然，这不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但是，物换星移，80年代终究不是近半个世纪以前了。“四十年来的民缓带，使君何事不轻裘”，现在已是一种和平安定的局面。对于40年前的史事，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他们曾经身历其境，亲与其事，抚今就昔，每多感奋，这是十分自然的。然而也还有不少人已经对之不甚了了。一些人安于轻裘缓带，既醞醞于当今，而又浑浑于过去。他们把现在与过去截然割断，视过去如蔽履。显然这是一种偏见。应当说，时间是一个无法分开的流体。过去为现在开拓、为现在孕育；现在正从过去走来、做过去归宿。它们互相包含，也彼此解释。过去和未来一样，它可以被看作是一把衡量现今的历史尺度。记忆过去当然不是为了使它复活，而是为了新生、为了未来。40年前，人们隆重地庆祝这个政权的建立；10年、30年、40年之后，又三次大举纪念它的周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为了激励那个三次的当今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高尔基说得好：“对于过去有了认识，就会使们不去过分急忙地追求享受现时的成就，而要想到未来；竭力加深和扩大我们美好的、但还非轻快的日子中不是他们自己所夺得的和赚来的好东西。”①依我看，这段话到今天仍然适用。对于物质生活如此，对精神生活也应如此。前一个时期，有人力图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百般诋毁并一言以蔽之取消我们所坚持的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这不过是40年前反动派反共反人民那一套沉渣在新时期的再泛。那时，他们就是高叫取消共产党、取消马克思主义、取消社会主义道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不光这么叫，也这么做。中华民族正是在他们的这种四取之下，被抛入灾难的深渊。这不是有历史可查的吗？假如人们对过去有点起码的知识或作点痛切的“反思”，对自己的谬误及其所

① 《农村史》，1985年2月24日《文学报》第4期。

带来的危害，当会出一身冷汗的吧。因此，回顾过去，认识过去，绝不能看作多此一举。即此而论，庆祝四十周年也是有意义的。这种庆祝不光是为了当时的成功；为了当年的艰苦奋斗；为了认识过去；为了如高尔基所说的加深和扩大我们今天美好的东西；为了从过去吸取力量，更加激励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我自己作为当时这一运动的参加者，值良此辰，浮想不免翩联。当年意气今犹在，愿献心声饯流光。我的这篇文章就权充对内蒙古自治区四十大庆的礼赞吧！

二

“自治”一词，《辞源》不载。但是行文命义，它的由来却很不浅。在我国，至少从9世纪初就见诸载籍。例如唐代晚期，杜牧之就写过这样的语句：“今者，上策莫如自治。”“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成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廩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虐。”^①在这里，他把“自治”解释为“自以为治”，并将土地经界、人口户籍、财政收支、法令制度、干部任免、农田设施、交通往来、武装保卫、物资屯积等等，都列为“自治”即所以“自以为治”的条件与内容。这种关于“自治”的必要性及其范围的规定，与后世的界说，几乎相等。也许可以说，这个立论或者就是后来各种“自治”理论的滥觞。此后，历代统治者中亦每有议及诸种“自治”的。但是，这里所说的“自治”，指的都是王朝统治者，地方的“自治”不在其内，而由于都没有民族和民主的内容，从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地方自治也就迥然不同。它对内蒙全族的影响当然略无可

^① 《新唐书·杜佑传》186卷。

言。但是，熟于汉籍的蒙古知识层却从此了解到“自治”之说并留下相应的印象。

蒙古民族自从汗权衰微，特别是被满人征服之后，全民族统一的集权已被所谓“众建”所代替。蒙古王公成了满人统治者的支柱，而后者反成了他们的“共汗”。各旗互不相摄，民族权利被剥夺罄尽。从此，蒙古民族一废金戈铁马的雄风而犯喘于凄风苦雨之中。康乾之时，长城边禁废弛和开放，大批内地农商客户，日渐流入蒙地。其后，日俄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铁路的筑，蒙古地方的情势遂日趋变化。一方面民族危机越来越深，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交流，“风气日开”，蒙古人首先是贵族们的民族识意油然而生。恩格斯曾经就16世纪时德国的情况说：“重压……激起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①这话也可以适用于内蒙古的某些贵族们。这里的所谓“民族意识”就是他们的“民族危机”感，就是他们隐约出现的那种企望摆脱帝国主义及大民族主义的羁绊而自立的情绪。在这里，“民族自治”的思想还不曾迸发为一种物质的力量。

内蒙古民族中“自治”思潮的出现，主要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那时，有下面两种情况摆在了内蒙古民族的面前：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汉族革命志士及社会组织，愤于清王朝的腐朽及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又接受19世纪后半期以来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潮，积极广泛地开展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这是符合蒙古人的历史要求的。蒙古居留日本的人士在《民报》发表的言论就作出了这种要求的表述；在京及其它各地的蒙古人之加入同盟会，也作出了这种表达。但是，同盟会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3页。

定章程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①；他们以为满洲、蒙古都是“汉之大仇人”^②。章太炎甚至说：“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毡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③总之，满、蒙二族无论如何，都必须打倒。即使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著述中，也不免内含浓厚的民族偏见，而视蒙古为“非类”的。他明确地说过民国建成，也只是汉族一家，蒙古不得而与。^④伍廷芳在致内蒙古的电文中说：“颇闻京中有人散布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⑤这不是什么“传闻”，而是实有。这种思想大失蒙古民族所望，他们感到清王朝不足恃，革命家也难置信。吴录贞就说：“种族革命之说大昌，将授满人以间。蒙、回必合流以角汉。兵连祸结，邦必分崩离析。”^⑥这话不假。在这种鼓吹下，蒙古民族对革命保持戒心而对满统治者反增同情。因此，他们只得退而自谋。

另一方面，辛亥10月，武昌炮响，宣布独立。从此，“独立”之声，不旋踵而遍及南北各省。外蒙古地处边陲，亦乘时而起，宣布“独立”，并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博格多汗。遂即一面通报内蒙各地，一面即挥兵南下。次年8月，西藏亦称“独立”。1913年1月，藏蒙互相承认“独立”并结条约。7月，“二次革命”战起，各省又先后“独立”，而中、俄二国也共同宣言，承认外蒙“自治”。此后，直到1917年，这种“独立”事件迄在各省不时发生。待到1918年，国内南北政府峙立相抗，一

①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页。

② 《陶成章集》第218页。

③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83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98页。

⑤ 《中华民国大事纪》第2册，第44页。

⑥ 《辛亥革命》第6册第370页。

些名流又提出“联省自治”的立论，主张以省为单位“自治”。制定省宪，行“省人治省”的制度。这种倡议得到各地的支持，而“联省自治”、“自治”的宣传也一时甚嚣尘上；进京请愿“自治”的报道更连篇累牍。诸种“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会办事处”等组织，亦波荡各地，就连北京政府所领区域，亦为之卷入。就当时而言，这种“自治”运动的规模与声势之大，较之“五·四”运动几乎等同，至少算是其后的一项震动较大的风潮。

面对风行全国的这一运动，特别是外蒙的“独立”或“自治”，对于内蒙古民族不能不有直接的影响。在它看来，既然同是一族，各省都要“请愿自治”或径自“自治”起来，内蒙古民族为什么不可以乘风而效尤？内蒙古民族自治的思潮由此而萌。而蒙语“自治”即  一词，也就此应运而生。

必须说，武昌暴动是革命的，然而革命果实的摘取者却多半是革命的对立者。所以什么、“独立”也，“自治”也，无非是各省封建督军的反动割据而已。他们就是利用“自治”，“分权”的名号，既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又对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当年，同样是反动军阀的吴佩孚在他致蔡元培的电报中说：“川湘借自治之帜，以抗中山。豪强割据，部落称尊，又附会分权之说，以自饰其乱。”这真是夫子自道。但是，又何止于“川湘”而已，比比皆是耳。内蒙古当时的自治运动，就全局说，虽还未能形成一种揭天的局面，而究其最初酝酿的阶级实质说，似乎亦略向于那些“联合自治”者。

但是，如果不停止在阶级本质，而进以探讨内蒙“自治”的客观作用时，则应当承认，这种“自治”也是对军阀统治的打击；也是对大民族主义统治的分裂，因而也从一个方面多少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

一般说，就实现“自治”的方法而言，可以有两种选择：一

为革命的办法；一为改革的办法。而随着整个国内形势的发展，内蒙古民族自治的前一种方法被推到首位。这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内蒙的民族运动。那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与外蒙古的支助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表现了鲜明的革命气魄。它庄严宣布“提倡革命运动”；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封建王公制度；彻底实行全族人民的“自治制”并与“被压迫阶级之汉人相提携，以期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这次革命的自治运动尤其受到了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的支持。这是一次真正的民族自治风暴，声势所至，反动派无不披靡。然而垂成的自治运动，随着全国形势的逆转而流产了。运动的失败，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而同时也是由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成员的大部分不是真正的人民的领袖，可以说是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正是他们在运动的关头退却了，他们被敌人的屠刀所屈服，向敌人缴了械。从此，内蒙古民族又消声匿迹，回复到原来的悲惨境地。而一个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势力，在所谓“满蒙政策”的推行中正一步步伸入内蒙古地区，其威胁与损害蒙古民族的严重程度又远甚于国内一切以前和同时的民族压迫。

在30年代，日本侵略者伪造了一个“满洲国”之后不久，即在其境内蒙古人较聚居的地区，网罗一班政客，弄出一个“兴安省”。貌似“自治”，实为进攻苏、蒙二国、尤其是西向侵吞内蒙的跳板。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以及蒙汉民族矛盾的加剧，内蒙西部地区的蒙古人中又兴起了自治运动。

运动轰动一时。参加这次运动的成员并不单纯，而居于重大影响地位的则是蒙古族中的统治或上层人物，首先就是苏尼特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运动的参加者们迫于自身民族的危机日深，起而谋求结束反动的大民族主义民族统治，实行蒙古的自

治，应当无可厚非。事实上，从193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所颁发的文告中，也历次支持各民族的自治，主张“建立自己的区域，均由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并把这些主张定为所颁《苏维埃宪法大纲》的条文之一。1935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更加明确了这点。

但是，这次的自治运动与20年代的自治运动相反，实际上，在其初期，至多只能算是“改良主义”运动。这次运动不但很少有农牧区广大蒙古农牧民积极参加，而且范围也只限于阴山两侧。列宁曾经指出：“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①30年代中期的内蒙西部地区的民族自治运动正是这样。当然，如果真能取得“让步”与“改良”，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列宁就说：“不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②斯大林也说：“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③问题是事实并不如此。从这次运动的立论及实践看，明显地有这些特点：一、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自治方案，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论辩，并且在实践中也作过一些尝试，然而没有一项破坏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它一如一切改良主义那样，“并不废除统治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灭任何民族压迫。”^④二、它所有的“改革”要求与实践，并不发动劳动群众起而进行斗争，而是一味“恳乞”、“请求”，企望以此博取国民党大民族主义统治者的“体恤”或“谅解”。三、空谈日本的威胁，而不言抗日。四、一切活动（从宣传到组织）的政治背景或依据都以“防共”、反对“苏俄”及外蒙革命影响为主旨。可以断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4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57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865页。

言，要自治而不破坏国民党及其地方的反动代表的大民族主义统治，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又反共、反人民、反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支柱，其失败是必不可免的。事实不正如此吗？反动统治者并没有答允他们的要求，他们自治运动的领导层中也日趋“分背相踉”，各有打算。很显然，要实现自己的宿愿，必须改弦更张；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与支持；必须发动人民起而斗争；必须把自治运动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会合起来，取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也提出了这样的号召：“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运动自治的首领们既然不此之图，于是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向反动派投降，接受大民族主义的“体恤”，像颜之推所说的“见役勋贵，处之下座，以取残杯冷炙之辱。”①一向日本侵略者的“满蒙政策”靠拢，引狼入室，而德穆楚克栋鲁普真的这么做了。他在日本占领者的导演之下，终于沐猴而冠，搭起了“蒙古军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或“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血腥绞架，使内蒙古民族进一步陷入绝境；使内蒙古地区横遭更重的劫难。所谓“自治”云云，竟走到了它的反面，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当年反共、反人民的认敌为友者自己也作了战犯，终究缱绻于人民的牢狱。马克思曾说：“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②真是千古不爽。语云“自作孽，不可逭。”对于一切敢于违反历史潮流的人来说，应当是一个历史教训。

那些奔向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首领们、“自治”活动家如

① 《颜氏家训》卷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808页。

何呢？可以说，不唯一事无成，并且为人所讥。国民党政府虽然“体恤”他们，推出了加上“盟旗”字样的地方政务委员会（如察哈尔省境、绥远省境）这种名堂，但是，它除了听命于中央及地方大民族主义军政当局，无法牙崩半个“不”字外，充其量不过被人视为空头排场、权供分肥吃饭的机构而已，谈得到什么“自治”？且看绥境蒙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报告：“抗战胜利以后，只要委座（指蒋介石）决定办法，只须一道命令，他们（指蒙古人）是没有不雀跃乐从的”。“那时，不论政治、军事、教育、经济以及一切合理的制度，都可由我们领袖（指蒋介石）的决策，而予以一劳永逸的改进，那么，蒙（古同）胞所希望的真实幸福，也将从此获得了。”①原来他们闹的“自治”竟是一切听任蒋介石的命令与决策。如此“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试问这算是所谓“自治”、所谓“政务”吗？不唯不是，甚且是宁为“鱼肉”的。在这里，即使“改良”也数不上。

这样，无论投日、投蒋，内蒙古民族中的统治阶级与上层人物所玩弄的“民族自治”、“内蒙自治”云云，都没有为蒙古民族；为蒙古人民带来任何可庆幸的利益。内蒙古人民依旧啼饥号寒，忍辱受凌；蒙古民族依旧水深火热，朝不保夕。历史灾难告诉蒙古人民，要掀翻身上的重压，仰息于这些人及这些人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另找出路。

三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是活动的方式改变了。”②英明极了。当代内蒙古的历史再一次为之提供了证据。

日本帝国主义给予内蒙古民族及内蒙古地区的苦难，真是罄

① 《边疆》第17期，《‘九、一八’与蒙古》。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简》第79页。

竹难书。然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灾难反而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激发了被压迫群众的反抗怒潮。日本法西斯的统治甚至也增进了为敌人效劳的蒙古统治者的愤慨与反抗。早在抗日战争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内蒙古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①这种斗争与内蒙王公所谓的自治运动恰恰成了对照。抗日战争历时八年，内蒙古、首先是它的西部地区所掀起的浴血斗争，成了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这种历尽艰关、冒死不辞的英勇气概，正不啻是内蒙古民族新进的催花之鼓。重要的是待机而发。

1945年，欧洲战争结束三个月，苏联按照雅尔塔（克里米亚）协议即于8月8日对日宣战。9日，后贝加尔方面军在东自兴安岭西至阴山一千余公里的日伪防线上，分几路展开了强大的攻势，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作为方面军的右翼，直指兴安岭西南支脉地区，切断日本侵略者“满洲”与华北的交通线。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亦发表声明，号召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广泛进攻，扩大解放区。8月13日，苏军攻占伪兴安省的首府——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并随即将总司令部设在这里。8月17日，苏蒙骑兵机械化军锋已到达张北、多伦、赤峰、开鲁、通辽、开通等地，并包围了张家口、承德的守敌。从8月始，我人民解放部队，接受毛泽东、朱德为首的总部命令，陆续收复了内蒙地区的集宁、丰镇、归绥、兴和、武川、陶林、凉城等地并向察哈尔地区运动。至此，与苏蒙军汇合在一起，加强了对敌军的围攻。9月2日，日本签降。所有散布在整个这一线的日本关东军、“满洲国”军、“蒙疆”的伪蒙军及绥远部队约120万人，被宣布解除了武装；一切日伪政权被彻底摧毁；整个敌占区因而也获得了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6页。

解放。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①“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②这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低估我国包括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及其光荣战绩的意思。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③这种“不可估计”的影响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影响，首先就在内蒙地区及内蒙古民族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看到，兵锋所至，革命的、解放的思想随即传布开来。借助苏蒙军的影响，内蒙各地各种名目的解放委员会因此也相继出现。尽管这些组织的领导思想及活动方式，不都一致，而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则无不都在民族的自治和无不期望推动建立象苏、蒙那样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可以说，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即消除了民族压迫及民族内部封建王公贵族统治被极大地削弱的条件下的又一次自治运动。刚刚被从日本占领者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内蒙古人民所迸发开来的这种“民族热”，不光为向来所未有，而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们相信，内蒙古必将自治。

内蒙古地区的战略地位，不光对国内，即在国际上也显示着它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对“兴安省”的重视就是从从这个角度着眼的。一个英国人琼斯说过：“如果日本能获得战略上重要的兴安区域里的蒙古族人民的拥护，则它必将以优胜的地位来侵入内蒙古，而且最后能破坏苏联在外蒙古的地位，从而使它在与苏联最终的对抗中，占有政治上与地理上的优势。”^④对于内蒙古西部地区，也持类似的观点。“关东军进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西部内蒙古民族，依靠日满方面，并阻止中国共产军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9、1132、1133页。

^④ 《1931年以来的“满洲”》第4章。

和属于苏联势力圈的外蒙联系起来，以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同时羁縻外蒙，以有助于完成我方对苏作战的准备。”^①这些都是从反面的即反苏、反共的地位去估量的。如果我们反其是而估量，则内蒙古（从阴山到兴安地区）对我们也居于重要地位。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所颁《对内蒙古工作的意见》就指出了内蒙古的重要战略地位，以为妥当处理内蒙地区的民族工作，既能使蒙古民族得以解放，也可以建成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为此指出必须确定我们统一的政策与统一的领导；指出首先组成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进行工作以便随后建立正式的自治政府。11月，又发出指示，应先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为自治政府的成立进行准备工作。从形式上看，自治运动联合会很象是20年前在内地所掀起的那些“自治”、“联省自治”组织（如前所述）的重现，然而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应当说，中央的指示是及时的。它为如何解决当时各种组织纷纭、群龙无首状态；为这种“民族热”的正确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迈向这个方向指出了办法。

根据中央的指示，1945年11月下旬，各地方，各盟旗及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齐集张家口，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正如人们所周知的那样，人们的向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这次大会正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内蒙古民族人民的心之所向。大会始终是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察哈尔省政府的热情关切与大力支持下进行并取得成功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②内蒙古民族与内蒙古地区当然也处于这个阶段。它的斗争目标同样

① 《日中战争》第6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34页。

是反对美蒋篡夺抗日胜利果实。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正是保卫这一胜利果实的过渡性组织。它要一直过渡到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为此，它严正宣布“本会以团结内蒙古各阶层人士，联合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势力，发动与组织内蒙古人民，彻底肃清法西斯残余，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建立内蒙古自决、民主的政权，从事适合于人民利益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新建设，以求内蒙古彻底解放，并为实现自由联邦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①

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首先着重在西部地区广泛开展工作，同时也重视东部地区工作“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②扩大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以巩固与保卫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成果。工作是有成效的。但是，当时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不时感到两个地区或多或少尚有不协调的方面，需要解决。1946年4月30日，东西两地代表开会于承德市，就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磋商。经过深入的论证与认识上的提高，在中共冀热辽中央局及军区的支持及领导下，会议取得成功，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组织统一、领导统一及政策统一达成了决议。这是一次成功的决定性会议。从此，东西两地的自治运动都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目标一致地蓬勃发展开来。

但是，内蒙古地区亦如全国的形势一样，仍在战火纷飞。美蒋反动派进攻，我们自卫，内蒙古解放区亦时遭敌人的进击。由此直到1946年底，虽然我们与反动派之间谈谈打打，而到次年4月，美蒋反动派已把自己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而我们则已进入战略反攻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号召。为了迎接新的形势的到来，依据当时地区成熟的条

① 《晋察冀日报》1945年11月29日。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74页。

件，建立全区的自治政府及自治区已成急切任务。正如列宁所说：“建立拥有完整的、同一的民族成分的那怕是最小的自治州，对于消灭任何民族压迫都是极其重要的。并且散居在全国或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本民族成员，都会‘趋向’这些州，与它们交往；与它们成立各种自由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①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正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它推动本区的人民解放斗争，也将吸引未解放地区的蒙古人民趋向自己，共同斗争。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5月1日，经全体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正式宣布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明确规定“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买办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对内蒙古民族及各民族人民的侵略压迫，并联合全中国一切赞助内蒙古自治的民主党派及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为实现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而奋斗。”^②至此，过渡阶段已将过去，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过渡组织也告结束。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及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大大促进了自治事业的发展，而因此也一举粉碎了反共反民族罪魁如德穆楚克之流的阴谋。这个曾经腆颜事敌的蒙奸，日本投降后，又频频为蒋介石反动集团出谋划策，说要“防止赤化内蒙之工作，或与八路军相结合，造成种种荒谬之组织与事实，使我将来无法收拾处理。”^③针锋相对，联合会及自治政府明确宣布就是要与共产党、八路军结合，广泛进行革命化宣传与组织工作，建立民族民主政权，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反对包括德穆楚克之类的反动派卷土重来。事实证明，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成就。

同时，联合会与自治政府的成立，也教育了一些存有糊涂认

^① 《列宁论民族问题》第119页。

^② 《东北日报》1947年5月28日，载《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

^③ 《德王赴渝报告内蒙状况、拟具措置办法》文件。

识的人们，使他们迅速转变那种导致实践恶果而有害于民族民主自治运动的思想与做法。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①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内蒙古民族甚至包括“劳动人民”在内往往存有“不容易很快消除”的民族成见，以为内蒙古民族借苏蒙军的力量挣脱了日本的枷锁，正应“蒙人治蒙”，不需要与别族例如汉族联合，重蹈被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覆辙云云。当然，这是一种误会。事实上，汉族也并不浑然一致。有蒋介石国民党的汉族；也有毛泽东共产党的汉族。他们不了解对于大民族主义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对的。在这里，各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历史发展已把蒙汉及其它各民族紧紧系在了一起，谁也无法离开谁。各民族互相支援不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尤其也是各民族、首先是蒙汉两族人民各自社会解放的基本条件。当一个强大的、凶恶的民族与阶级敌人严重地压在全国人民的头上并极力企图挑拨和加深民族间的隔阂，以便分而化之，各个击破的时候，各民族之间采取分道扬镳的办法，任何革命事业都是不会成功的。这个至为明白的道理，在自治运动联合会及自治政府成立的过程中，由于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及时地妥善处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人们从自身的实践经验里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就这样，由内蒙古人民开创的历史进步与社会繁荣，终于对旧时的灾难作了补偿。

四

民族区域自治不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并且因此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民族政策，而内蒙古自治区及自治政府的建立就正是这一政策的实施范例。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内蒙地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民主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经过减租、土改及生产运动之后，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各民族团结无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内蒙古的劳动牧民和农民也终于因此得以从他们分散的、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舍和穹庐中解脱出来，走向一个广阔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天地，并在这个天地间增进了自己的认识世界从而也认识自己的能力，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一个民族、一个阶级能够认识自己、能够充满豪情，对于新历史的创造，对于新的道路的开辟，都是极重要的。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具有坚强毅力的各族全体人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民与人物“人类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①对于内蒙古民族的人民说，也是如此。正是从自治实践及自治理论的学习中，蒙古的普通老百姓才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在整个中国的革命斗争与革命建设中，也能与其它各民族、各阶层一样发挥重要的能动力量，也能够居于同样不容轻视的地位。不特如此，内蒙古自治区与自治政府的建立；蒙古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业绩；他们在全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对全国各地、各民族争取实现自治的人民来说，也是一个范例；在客观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起而进行反美蒋反动派斗争的一种鼓动，一种配合，一种支持。

内蒙古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光获得全体蒙古人民各阶层的热烈拥护，而且作为一种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与方向，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也与全国人民及好多政治集团的主张相一致。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早在1935年11月就在它的《临时行动纲领》中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8页。

布：“国内少数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在它的《纲领》中指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得组织自治单位，制定宪法、实行自治，但其宪法不得与国宪抵触。”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48年7月所发该会《政治纲领》中主张：“少数民族得组织自治单位。”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12月在它的《纲领草案》中确定：“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并得组织自治单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在它的《行动纲领》中明确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其它各民主党派在它的政治纲领条文中虽不及自治字样，而坚持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则是异口同声的。足见我党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自治运动也获得全国民主力量的支持。内蒙古自治之能够胜利发展，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与社会组织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我想这应是内蒙古人民始终引以为荣并深为感谢的。

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一把刺向敌人的利剑，因而也受到了一切反动派的仇视。

首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就与其不断进攻内蒙古解放区，并声言要“摧毁王爷庙政权”的同时，执意违反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顽固地抵制与破坏这一政策，它始终拒绝承认国内除汉族外，尚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存在这个事实。早在1943年蒋介石就声称：“中国五族人民的差别是由于地域和宗教的因素”而不是什么民族之差；所有中国境内“只有一种共同的宗族”，谈不到民族的分划^①。既然不存在少数民族，因此，在他看来，也就不存在民族压迫；不存在民族问题；不存在民族自治问题；就以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它的“统一”的妨碍，因而一切提出民族问题

^① 参见《中国之命运》。

及其自治权利的，就都被断然压制。即使与国民党反动派一起积极反共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战后所提出的旨在反共、反人民、反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及自治政府的伪“自治”、“西蒙自治”云云，也一概被予以否定。其大民族主义成见之深，可见一斑！而最足以暴露其公开敌视民族区域自治的事例，可以举1946年其所召集的伪“国大”和制定的伪“宪法”为证。李维汉同志曾经写道：“我要以参加宪草审议所亲历的事实来说明：政协会议只议决了‘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而这些原则中的重大优点，如少数民族自治权，已被三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基本推翻，又被伪‘国大’破坏干净了。”“政协基本原则之一是‘聚居一定地方的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蒋记伪宪显然与此相反。它将政协上项原则推翻之后，为了欺骗，于11章地方制度末尾，添上‘第119条：各蒙族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保障之’。前面说过，对于汉人，连地方自治的影子也找不到，难道会忽然厚爱于蒙人吗？”①这真是一针见血。对于这种蛮横作法，内蒙古人民理所当然地予以坚决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主任哈丰阿声明说：“一党包办的、没有容纳一个真正的蒙民代表的‘国民大会’，我们内蒙人民将不受其任何约束，并否认其讨论任何有关内蒙问题的权力。蒋介石若定然召开这种御用‘国大’来圈套我们，我们将召开内蒙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内蒙统一政权，来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②当然，在自治区，反对的并不止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全自治区人民都反对，都以自己的世代经历，以新旧社会、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对比，广泛控诉它的反动行径。就全国而言，它的“国大”除民社党、青年党及几个“社会贤达”而外，所有民主政派也都一律拒绝出席；

① 《东北日报》1947年1月7日。

② 《东北日报》1947年1月1日。

对其所谓“宪法”，也无不嗤之以鼻。

适应国民党反动派大唱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需要，国统区还有一帮学术界人物也在谗口嚣嚣，煞有介事。他们所持的论调，无不秉承大民族主义统治者的主旨。综合其大意：一是说国内没有民族之分，只有宗族、宗支；我国境内没有少数民族，何必要倡“民族自治”，来分化祖国。二是说没有民族问题，只有边疆问题；“赞成边疆自治是地方自治，不是民族自治”。三是说内蒙古早已改成行省，内蒙只是历史名称的余留，不能成为独立的地理区域或政治单位。四是说内蒙的自治运动为旧满洲与蒙古伪组织的幽灵，是共军煽动支持的结果，成了共军的工具。五是说所有提倡自治、高度自治，都是荒谬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现在看，他们的这些立论都是非常可笑的。他们没有到过内蒙古地区，也没有到过内蒙古自治的解放区，他们既不了解蒙古的历史也无视内蒙解放区的现状。完全是无的放矢，捕风捉影；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一窍不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是蓄意歪曲，信口雌黄。内蒙古历史与现实的真实驳倒了他们。然而在当时，这些人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影响，创办刊物、举行座谈，颠倒黑白、危言耸听，大造舆论，站在蒙古人民的对立面，攻击区域自治政策，则不能不使内蒙古的理论界依据大量确凿的事实及充分的论据起而作针锋相对的驳斥，充分揭露他们的伪善与谎言于光天化日之下，以消除他们的有害影响。恩格斯讲阶级斗争除了政治、经济斗争之外，尚有理论斗争。在全民中开展对类似这些反动谬论的批判，正是阶级斗争在理论斗争中的反映。如果说，我们军事上对美蒋反动派的战略反攻是武的方面斗争，那么，我们对一切谬论的彻底批判则是文的方面的斗争。实践表明，这两方面的斗争对于保卫与巩固自治区及自治政府非常必要，而自治区之所以巩固与发展，这种必要的思想理

论批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方面。

当年，唐太宗曾与他的左右论及“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熟难”的问题，^①以为草创难，守成亦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什么“帝王之业”，而是各族人民的事业。但是，我们也有两难。“草创之难既已往矣”，而守成之难却仍在我们面前。所谓“难”即问题。赵紫阳总理在他最近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析。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或“难”点，并不容易。关键是头脑清醒。只要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问题完全有信心解决。在这里，遵循中央方针，经常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及自治政府建立的40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政策从胜利走向胜利的40年。为了更加推进与发展这个胜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认真学习这一理论是其中重要的一环。50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我看这一号召在今天也是重要的。我们就是应当根据当前的发展，结合现实情况，努力学习以掌握这一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既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也曾有“草创之难”，来之不易。我们要珍视它、发展它。

（全文转载自《民族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① 《贞观政要》卷1《君道》。

乌兰夫副主席在土默特左旗

张金阳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雨后初晴，土默川平原凉爽宜人。正在内蒙视察工作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布赫、副主席张炆公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云照光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土默特左旗看望干部群众，受到家乡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随同乌老回家乡的有乌老的夫人云丽文及其子女等。

上午十一时，当八十高龄的乌兰夫副主席回到自己的老家塔布赛村，全村男女老少齐涌街头，热烈欢迎。五名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少先队员，向乌老敬献了鲜花，塔布赛乡党委书记李文英、副乡长王金奎向乌老敬献了哈达。

乌兰夫副主席一九〇六年出生在土左旗塔布赛村。他的革命生涯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非常惦念家乡的父老乡亲。今天，回家乡看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乌兰夫副主席的旧居曾被日军放火烧毁过三次，乌老如今重返修缮一新的旧居，同土左旗旗委、旗政府的领导谈起当年的情景，不胜感慨。乌老在自己的旧居，同塔布赛村前任党支部书记云三宝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村里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童年故友的情况。乌老还让人把村里健在的几位古稀老人找来，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见面，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乌老在塔布赛村期间，还乘车参观了塔布赛中学和民族小学。

下午三点多钟，乌老在他休息的土默特宾馆会见了云文彦等四位老人。然后，乌老在他亲手题写馆名的土默特左旗展览馆，亲切接见了土左旗五大班子的全体成员以及呼市主要党政领导贾才、赛吉尔夫、云瑞等。五名少先队员向乌老敬献了鲜花，旗党政领导云瑞祥、王铁小向乌老敬献了哈达和《土默特志》下卷，原旗委书记补生瑞向乌老敬献了书画。接着，乌兰夫副主席分别同土左旗五大班子全体成员以及工作人员合影留念。随后，乌老高兴地讲了话。他说：“各位父老、朋友、亲戚、兄弟、姐妹，你们大家都好！我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常常想回来，但因工作关系不允许。这次我回来，见到好多的亲戚、朋友和老同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过去，我在这里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所以没出什么问题，完全是乡亲们掩护、帮助的结果。我今天回来，不仅仅是看看故乡，同时也对在艰苦环境下帮助过我、掩护过我的父老乡亲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说我这几十年搞了些工作，首先应当承认，这里边你们是有份的、有功劳的”。

乌兰夫副主席说：“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更进一步。工作上一帆风顺，生活上愉快，家庭幸福，好好教育子女，把我们老一辈的革命事业很好地接下去”。乌老说：“土默特左旗是很有希望的。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土默特左旗有许多同志为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才；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也应当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我相信，我的话一定能够实现。希望各位乡亲、父老、同志朋友、亲戚、姐妹，你们今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要更加努力，把土默特左旗建设得更好看，比现在更前进一步，这是我的希望”。

讲话结束后，乌兰夫副主席在土左旗党政领导云瑞祥、王铁小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土默特左旗四十年成就展览。当看到介绍土左旗民族构成情况时，乌老说：“全旗有多少个民

族”？旗政府副旗长云秀梅说：“有十一个”。乌老高兴地说：“民族越多越好，民族越团结越好。只有民族团结搞好了，我们的事业才能搞得更好”。看到林业部分的展览后，原旗委书记补生瑞向乌老介绍说：“咱们旗的林业工作得到了中央林业部门的奖励”。乌老听后高兴地说：“绿化工作非常重要，一定要抓好”。当看了展出哈素海景观模型后，乌老对自治区、呼市、土左旗党政领导说：“要把哈素海好好地建设一下，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益。黄河水据说现在少了，黄河水少是临时的，它不会长期没有，黄河水还会长期流。没水是暂时的，有水是长期的。你们一定要把哈素海利用黄河水的问题解决好，让土默特左旗实现水利化”。当听到补生瑞说“咱们水利化很有希望”时，乌老高兴地说：“那很好。等到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就看你们的成就了”。当听到旗委领导说要以实际行动向乌老汇报时，乌老高兴地连连点头。

看完展览后，乌兰夫副主席高兴地签名留念。放下笔，乌老说：“乡亲们很想看看我，我也很想看看他们。一会儿出外面，我要见见乡亲们”。补生瑞说：“乡亲们一大早就等上你了”。乌老说：“我更喜欢早些见到乡亲们”。走出展览馆后，乌老向等候在门外的数千各族人民群众频频挥手致谢，连声说：“谢谢、谢谢大家了”。临上车前，乌老对大家说：“再见了，乡亲们。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再来看望乡亲们”。

下午五点多钟，在乡亲们的热烈掌声中，乌兰夫副主席恋恋不舍地乘车离开察素齐，返回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投身革命 奔赴延安

浩帆

一、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也叫芦沟桥事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京津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我国各族人民也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高潮。

“七·七”事变前的一九三五年一月，日伪军已开始进犯察哈尔地区。一九三六年二月，伪蒙军已正式侵入苏尼特旗的德王府——即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家乡。同年二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日本侵略者和蒙古人民的败类——德王的闻名全国的“百灵庙事件”。五月十二日，日本人怂恿德王在德化县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十一日，日伪军进犯绥远，绥远地区共产党为了组织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成立了抗日救亡会，领导各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支持绥东前线的抗战部队。支持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当时我正在蒙旗师范读书。在救亡会的领导下，我们每天手拿红旗，唱着救亡歌曲，到处进行宣传，进行募捐。当时唱的救亡歌曲主要有《义勇军进行曲》等。

二、降下太阳旗 不当亡国奴

一九三七年八月，北京（当时叫北平）沦陷了，绥远省的各个机关和学校，遣散的遣散，撤离的撤离。当时我们学校属于遣散的单位。我们从蒙旗师范被遣散后，回了家乡，继续进行救亡活动。十月十四日伪军攻陷了归绥市，随着包头也沦陷了。我回到家乡后，搞救亡活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本的国旗（人们叫太阳旗）降下来。

我的家乡是把什，蒙古名字原名巴克希板申，把什是巴克希板申的简称。巴克希板申的汉语意思就是先生的房子。我们村在大青山的狮子山下。村里的住户，在抗战前有三百多户，一千多人口。

我们村子里边有两所小学，一个是汉族小学，一个是蒙古族小学。这个蒙古族小学是旗里官办的，所以叫“土默特把什小学”。

村里除了这两所小学外，还有私人办的小学，叫“私塾房”。私塾房里念的书尽是古书，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论语”、“诗经”等。因为有这个条件村里人读书的比较多，文化比较发达，所以在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人也多。

我回去以后，就在旗里边办的蒙古族小学里教书。当时的校长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家在呼市，经常不在校，所以学校的事情就委托我替他办理。我一方面替他管理学校，一方面教书。

日本人占领归绥、包头以后，我们村里边的一些人因为害怕日本军队和伪蒙古军进村欺侮老百姓，就把一面日本国旗升在学校的旗杆上了。我当时住在家里，第二天去学校一看，咳，怎么旗杆上升起太阳旗了！当时我非常气愤，便开口骂人了：“太阳旗究竟是谁升的？谁升太阳旗谁就是亡国奴，是日本鬼子的走

狗！”我一面骂，一面把太阳旗降下来。我把太阳旗拉下来后，立刻轰动了全村，群众对此事也都议论纷纷。有的群众说：“啊呀，好大胆呀！谁敢把日本旗降下来，胆子真不小。”还有的人说：“把太阳旗拉下来，日本军队和蒙古军一定来追查呀！”好在当时日伪军刚刚侵占了归绥、包头一个月，村里边还没有建立起伪政权，所以村里对降下太阳旗这件事也没人追查过问，慢慢地也就过去了。从我个人讲，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气也出了，心里非常高兴。

降下太阳旗这件事，也曾受到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赞许。一九四零年秋天，我从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回来以后，曾听到共产党在大青山做地下工作的勇夫同志（当时是蒙古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降下太阳旗这件事，表示非常赞许。他说：“拉下太阳旗是爱国的行动。大青山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对这件事很称赞”。

三、消极怠工和破坏公路

日本人占领归绥、包头等大城镇后，一面野心勃勃地还想向西、向东扩张，一面也为保护这几个大城市，因此经常开动大军，往返行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汽车、装甲车、骑兵等，经常出没于归绥、包头之间，这样的军事行动没有公路是不行的，因此它急于强迫老百姓修公路。

修公路是逐段进行的，沿公路两旁住的老百姓，必须承担这个任务。老百姓都是被强迫出工的，大家出于无奈勉强应付。监工的日本人来了，就应付一阵，监工的一走，人们便敷衍了事，反正是凑乎到汽车能开过去就行了。

当时我也参加了修路，因为每户都得派一、两个人，不出不行。我们几个有志的青年，在修路当中，给群众说：“不要给它好好修，应付一下就完了，这是抓差事嘛！”老百姓本来就不高

兴，听了我们的话后，更是马马虎虎，消极怠工，铲平了就算完事。

公路修起来以后，每天总见有日本汽车运兵运粮，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我还在把什小学工作，看见这种情况后，我们几个人悄悄商量破坏汽车路。商议完了后，又悄悄联合了一些学拳术的人，一共有十多个人。在一天晚上，拿锹的拿锹，拿镢的拿镢，跑到公路上，横路挖了一尺多深的一道沟，我们便回村了。第二天有日本鬼子的三辆汽车开了过来。这三辆车尽拉着“洋面”，车上没有军队护送，开到那道壕沟时，一下子给卡住了。汽车司机没了办法，便到村里呼唤人给他们垫路，帮他们推车。当时保甲长们不敢不听，就派了二、三十个人去修路。这些老百姓到了汽车旁边后，一边填路、推车，一边趁司机看不见，从车上拉下五、六袋面。等汽车开走后，修路的人扛着“洋面”回村了。

四、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

一九三八年秋天，我到北京蒙藏学校深造。为什么要去深造呢？主要原因是当时找不到革命的出路。当时我们一行有好几个人，如本村的李自勉同志，察素齐的景湘新同志等。到了北京，我们就暂住在堂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等待考试。九月份，经过考试，我很幸运被录取了，而且还是插班生，插进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班学习。到一九四〇年秋天，我初中毕业了。毕业后我就回来了。

我在北平读书期间，当时的日伪政权对市内大学已经控制得很严，甚至一些中学也控制得很严了。唯有蒙藏学校还比较松，所以我们在蒙藏学校可以读到许多革命书籍，比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另外还有鲁迅、郭沫若、胡绳、成仿吾等人的著

作。而且在图书馆还可以看到抗战前我们地下党所办的刊物，如“新生活”、“大众知识”等。

除此以外，我们在蒙藏学校还可以唱革命歌曲。当然只是在宿舍里唱，和一些知心的人在一起唱。当时唱的革命歌曲我记得有《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凤阳歌》等。

此外在我发起下还出过墙报。先是我们班出的，接着其它班也相继出了。最后在各班办墙报的基础上，我又办了一个综合性的墙报。这个墙报有散文、有论文、也有诗歌，总的来说都是些进步的文章，文章中虽不敢公开喊出抗日，但都渗透着抗日的精神。

这种墙报先后出来后，逐渐引起了校方的注意，训导主任把所有墙报看了以后，又查问了办墙报的人。有一天他找我谈话，并命令我说：“以后不准你再办墙报，学校决定停办墙报”。从此墙报就停办了。

当时，蒙藏学校也有地下党的活动。我曾记得有两个姓韩的同学（名字记不清了），暗地谈论革命的事。这两个姓韩的同学一个和我是同班，另一个是他的哥哥，在高中一年级读书。他们两人经常谈“要去晋察冀……到了晋察冀以后，再到延安学习……”这件事曾经引起我思想上的共鸣。我们曾经商议也想办法先去晋察冀，然后再到延安求学、深造、参加革命。过了不长时间，这两个同学不见了，据别的同学说：“这两个同学和北京的地下党有联系，可能经晋察冀到延安学习去了”。

初中毕业后，我打算回家，因为我的家是雇农，很穷。我家里虽也种几亩水浇地，但都是召庙地，每年下来还得给人家看召的人出租子。除了这以外，只有六亩旱地。因为自己没有土地，每年得半种人家富农、地主的土地。我在蒙藏学校读书期间，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在读书期间没有回过家，暑假、寒假都是在学校度过。在假期我常到北京图书馆读书，所以我在蒙藏学校期

间，读了好多书，长了不少知识。

毕业后要回家，因为没有钱，先把所有的铺盖拿到当铺当了，但仅当了一元多钱，路费差得太多。后来同学孟绍给了我十块钱，叫我做回家的路费。他当时和我讲：“这是大青山党组织给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比较困难的学生的补助，给你十块钱，你拿这十块钱买车票回家吧。”这样我才从北京回了家乡。

五、正式参加革命工作

我回家以后，在家里呆了很短一个时期，于一九四〇年秋到了厚和浩特，（即呼和浩特）。

去了厚和浩特，没有住的地方，就住在李秀山家里，因为李秀山妹妹和我是同学。过了些时候，我请李秀山给我找个出路，他答应叫我跟上他走。又过了几天，李秀山引上我去了伪蒙古军第六师，因为李当时是该师副官长，所以就叫我在副官处，替别人做文书工作。

有一天，我给住在伪蒙军十八团的叶石础打了个电话，约他来见面。当时我们住在大树湾，和十八团驻地段家海子距离不远。叶石础骑了一匹马，来和我见了面。我和他说：“听说寒峰在新民堡，咱们俩走吧，找到寒峰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叶石础也同意了。于是俩人就从大树湾“开小差”跑了。

我俩跑到了段家海子。这是伪蒙古军的前哨阵地，驻着伪蒙军十八团的一个连。段家海子的对面，就是新三师驻地新民堡的前沿。这里驻着新三师的一个排。据了解，这个排从排长到全体士兵，都是土默特蒙古人，而伪十八团驻防的那个连，也全部是土默特蒙古人。那个时候地方乡土观念很浓厚，在这种地方乡土观念的影响下，什么你是敌人啊，他是伪军啊，全都不分了，都是土旗人，都是一家人，这就给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

伪十八团的那个连长，是我的一个亲戚，叫云璉。我们见到云璉后，把去向完全向他讲了。他说：“好吧，那你们就什么也别讲，也别出去。”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云璉派了两个兵，带了两匹马，把我们二人送过他们的封锁线。

一九四〇年十月，我们过了封锁线，到了新三师前沿阵地后，有三个站岗的，看见我们俩人后，就很快喊道：“过来，干什么的？”我们俩人过去后把去向说明，并说明是找寒峰，他们就派了一个人把我们送到了他们的排部。到了排部后，排长又详细盘问我们的来路、去向等，不想问来问去，弄清这个排长也是我的一个亲戚。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他派了两个兵、两匹马，把我们送到新民堡，见了寒峰。

在新三师呆了一个多礼拜后，寒峰、云蔚（都是地下党员）等和我们说：“现在正是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的时期，到延安哇也不好去，新三师的师部在乌素甲尔汗，这里离那儿较远，你们就在这儿吧。将来有了条件，有了机会，把你们再送到延安去”。过了两三天，寒峰、云蔚对我说：“新三师地下党与大青山党组织断了线，你现在的条件比较好，一是穿着学生服，二是你还有个护照（所谓护照就是蒙藏学校放暑假时给开的证明），有这个护照沿路就不加盘问了。另外你还有个学生证，所以派你往大青山送送信。”我当时就答应了。他们给我买了一双松紧口鞋，因为这种鞋是胶皮后跟，可以取下来。他们把鞋后跟取下来，把三封信（一封是给李维中，一封是给予占彪，一封是给贾力更）用纸烟盒里的锡箔纸包好，装在鞋后跟里，又钉上，我就穿着这双鞋，从新三师回大青山了。

出了新三师，碰见一个同行的青年，我们俩就谈起来了。他说是去通兴公有事，两人便搭伴同行了。

过黄河因为我有学生证和护照，所以比较顺利，伪军也没详

细盘问。过了黄河就遇上麻烦了，因为那个青年身上装着蒋介石的《元旦献词》叫日本人抓住了。日本人一看我有护照和学生证，便不问我了，主要盘问他。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日本人把我们俩都放了。晚上我们住在水利公，水利公的人们说：“啊呀，你们真危险、真幸运呀！日本人每天晚上都要抓一批老百姓，装进麻袋里填黄河，你们没有被填了黄河，真幸运呀！”

在这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日本人又来搜查，看见我身上有三十元伪蒙疆票，想都要。我给了他二十元，他说：“二十块钱饶你一条命，太便宜了！”日本人走了后，我们也走了，那个青年回了包头，我怕出事没敢进城，一口气跑到陶思浩，上了火车，回了家。

回家以后，我先和我三哥说明带回来的三封信，问他该怎么送。他把那三封信从鞋后跟里取出来，找到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老万虎，由老万虎把这三封信送到大青山。不久，大青山里的党组织知道我家庭困难，给了我十块钱。

有一天下午，我们村里的王桂树和我说：“今天你不要出去，有事！”大约在晚上快十点钟时，贾力更同志到我们的羊圈里接见了，他说：“你的家庭很穷，也很进步，你虽然没有直接接受党的领导，但也一直是搞革命活动的，所以你就参加革命吧，就在大青山参加八路吧，不要再回新三师了。以后有机会，咱们从大青山再去延安。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就是动员学生。”从此，我就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六、奔向延安的路上

接受贾力更同志给的任务后，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经过反复深思，我决定找一些亲朋学友。经过奔波，我沟通了同乡、同学。在这期间，经常和我接头的是勇夫同志。

一九四〇年底，党组织通知我作准备工作。我写信把潮洛濛从北京叫回来，又把我的两个外甥（一个是太阳村的，一个是察素齐的）叫上来。潮洛濛回来后不敢回家，就在召里边藏着，他怕家里人知道了不让他走。当天晚上，我们四个人由勇夫同志率领，离开了把什村，到了西沟门村。

西沟门村当时是土默特工作委员会所在地。那天晚上，委员会只有吴建勋同志等候我们。我们在土默特工作委员会不能久住，所以在第二天五点钟起来吃了点饭，便由吴建勋同志把我们四人送到了万家沟。万家沟当时是绥西地委所在地，也是八路军绥西游击司令部的所在地。去了后接见我们的有宁德清、于占彪等同志。宁德清同志当时是绥西游击司令部的政委，于占彪同志是司令。

一九四〇年底和四一年初，绥远地区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进行扫荡、蚕食最残酷的时期。所以我们在绥西地委没住多久，敌人就向绥西地委（万家沟）发动进攻了。为了保存干部，西北局和党中央决定大军暂时撤离大青山，民族干部去延安学习。当时调赴延安学习的干部有贾力更、赵诚、李森和孔飞等同志。孔飞同志是从西北局来大青山检查工作的，和我们同路回延安。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八个人的队伍了。当时姚喆同志也在绥西，他接到情报说是敌人马上就要到万家沟进行扫荡，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就跟着队伍转移了。

转移到井儿沟时是下午二、三点钟，我们从山上看见敌人的骑兵、步兵，浩浩荡荡一齐向我们包围过来了。敌人向那个山头包围，我们就在这个山头隐蔽。当时我和贾力更说：“敌人上来了，咱们转移吧。”贾力更同志笑着鼓励我：“是不是有点害怕！参加革命在战斗里出生入死是经常的事情，不要怕！”后来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敌人已抢占了对面的山头，接着就向我们这个山头进攻。敌人也不能带重武器，只能带些机关枪、掷弹筒、

手榴弹和步枪，但比我们的武器就强多了。我们有的只是三八式步枪，而我们四个人连步枪都没有。当时姚司令的那个机枪班有三挺轻机枪，这是最厉害的武器，能打硬仗，当时已经很不简单了。

敌人开始先用掷弹筒向我们这个山头轰击，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撤退了。当时骑兵三团也和我们在一起（这个团的团长是朱有德，政委是姜文华），他们的武器也很强，但因为敌人的人多，火力强，我们只有姚司令的机枪班和朱有德带的一个连（实际是一个排），还有些游击队员、民兵等，再加上我们去延安的人，总共也就是四、五十个人，武器又悬殊很大，所以姚司令也没有主张硬拼。

我们先是在井儿沟的一片桦树林里隐蔽，敌人看不见。后来敌人向我们开始进攻后，朱有德他们先从桦树林撤退了，我们几个人也开始撤退。我和赵诚、贾力更从一个山角爬上一个山头，一过这个山头前面就是一片平滩地，危险区就过去了。我们三个人都是揪住马尾巴硬爬山头，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不住气地嗖嗖打来。

贾力更同志是带着我们突围的。起初，他也和我们一样揪着马尾巴往山上爬，而且这个办法还是他教给我们的。不一会，因为他的马好，便抢在前面，快要突出去了，他便骑上马硬往外闯。他头上戴着一顶狐皮帽子，身上穿着大衣，又骑着一匹比较好的人背马，可能是敌人从望远镜里已认出他是个八路军的领导干部，所以就用轻机枪专门向他密集扫射。

经过这一场战斗，队伍都失散了，我那两个外甥也失散了，我的马也跑了。最后集合起来时，贾力更同志不见了，只把他的马捉住了。我们心中老惦念着，不知贾力更同志转移到哪里了，因为别人不说，我也没多问。

队伍开始转移了，朱有德的部队和游击队留在当地，姚喆同

志带上我们从绥西向绥中、绥东前进。到了绥中后，姚喆同志才告诉李森同志，说是贾力更同志已经牺牲了。大家听到后，都流了眼泪。在转移当中，因为我的马跑了，所以大家把贾力更同志的马让我骑上，跟着姚司令他们，一直突围到绥中。

到了绥东，又增加两个到延安学习的青年，一个叫赵士璧，一个叫张世威。四个人由姚喆同志护送，从绥西到绥中，又到了绥东。

绥东地方比较好些，这个地方八路军的骑兵、步兵也很多。在这里还碰见了杨植霖同志，他对我们的鼓励很大。不久就由姚喆同志派了一个排的兵力，护送我们先到晋绥边区，走上了奔赴延安的大路。

到晋绥边区，要过很多的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就在丰镇。我们到了丰镇封锁线边的时候正是白天，我们隐藏在丰镇北边的一座山里。到晚上，我们吃了饭便出发了。

护送我们的部队在前后小心地保卫，我们夹在中间悄悄地跟着前进。那天夜里没有月亮，漫天漆黑。我们在过封锁线时，还能瞭见丰镇火车站的电灯，但敌人就是没有发现我们。就这样，我们在部队的护送下，平安地闯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过了丰镇封锁线，就上了蛮汉山。出了蛮汗山后，就是晋绥地区了。原来护送我们的那一排部队，把我们交给晋绥的一个部队，便返回去了。我们又走了五天，就到了贺龙将军所在的一二〇师师部。

到了一二〇师师部，由师政治部接待了我们。当时从党中央到地方，对少数民族的工作非常重视，因为我们都是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青年，因此一二〇师政治部把我们作为上宾对待，关怀备至。当时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围剿，另一方面又有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及武装进攻，所以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一二〇师政治部

还专门给我们做了“黑豆面擦擦”招待我们。平时政治部的干部战士，吃的都是煮黑豆。

吃完了饭，我们就住在师部。第三天，我们从一二〇师出发，在保德县的一个渡口过了黄河，到了陕甘宁边区。又经过绥德、米脂等县到达延安。

到了延安，我们住在西工委（即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工委有一个民族工作部，当时接待我们的人是民族工作部的一个部长杨一木同志。不久，西工委把我们四个青年先送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这样，开始了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七、在延安的生活片断

到了延安不久，西工委民族工作部就把我们介绍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王铎同志当时是民族部副主任。后来民族部又分了九个班，我和潮洛濛都编在了高级班（还有研究班）。一九四一年秋，民族学院正式成立，我们这些人就到了民族学院，一直学到四四年五月。这四年期间的延安生活终身难忘，下面我介绍一些片断。

在陕北公学学习时，没有什么教科书，也没课本子，只是听大报告。做报告的人，都是有名望的党的各种专家和专搞理论的人。报告的内容有时事政治、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听报告没有教室，只是在野外或广场。当时给学生发的只有一个小凳子和一个粗糙的纸本子，记笔记全是用铅笔记。有细心的同学学了速记法，记得比较多，象我们这不会速记的同学，只好能记多少是多少。听完以后回来讨论，大家你一段、我一句，也可补充记录的不足。

民族学院成立以后，人就多了。当时一共分了六个班。有一、二、三、四、五班和研究班。后来又增设了六班，是专为从

伊盟去的战士设立的。民族学院的成立充分显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正确，对培养民族干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是在第一班学习。第一班上的课程大体上有这么几门：一门是语文（即汉文）。因为要真正学习理论，必须首先得把语言、文字学好，有了语文基础，才能读好书。第二门是政治。政治方面的内容就比较多了，但主要是马克思、列宁有关革命斗争的理论和时事政策。第三门是经济。基本上是讲政治经济学。这是三门主课，另外还有一门蒙文课，我们还有一位蒙文老师。

我们从陕北公学到延安民族学院，这期间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所谓共产主义生活就是供给制，军事化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出操，唱革命歌曲。晚上睡觉前也要点名，点完名还要唱歌，唱完歌回去睡觉。

吃的更是相当困难。一九四一年正是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时期。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把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各级政府，各机关的干部和人民困死、饿死。党中央和毛主席针对这一情况，及时地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到大生产运动时毛主席又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才逐步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但是在反封锁的初期，生活还是相当艰苦的。

当时，我们住的都是自己打的土窑洞，有的是土炕，有的搭几块木板。每人发一块皮褥子。

吃的，最好的情况就是小米子，一天三顿都是一样。早晚是稀粥，中午是干饭。在最困难的时候连小米子也没有，吃的是黑豆、麦粒和老玉米、高粱。陕甘宁边区根本不种麦子，主要是晋西北的同志为保卫党中央而运来的。那时吃饭没有菜，只是用一些盐水就饭吃。当时每人一根皮带，皮带上挂一个小磁碗，衣兜里装一把小勺，这就是餐具。每个班分几个组，每个组领一盆饭，大家围着吃，想起来很有趣。

当时我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八路军衣服。棉衣三年发一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戴的帽子冬天是用羊毛扞的毡帽，是八路军式的，夏天是军帽，是布的。鞋都是自己打草鞋，没有稻草就用烂布条搓起来代草绳。冬天没有袜子，每人给发一块薄羊皮裹在脚上，外面穿上布条做的“草鞋”，即可过冬。

当时经济生活虽然困难，但文化生活却搞得热火朝天。文化生活除了唱歌外，还要出墙报，还要演点戏。戏是自编自演自看，主要是秧歌剧，有时还演话剧。还有跳舞，差不多是每星期六举办，男男女女，载歌载舞，非常热闹。

另外我们还有学术研究组织，是在学生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同学根据各人的不同爱好，参加各种学术研究小组，爱诗歌的就组织诗歌研究小组，研究怎样写新诗，怎样写古诗。愿意搞文学的同学，就研究散文、小说等的写法。还有研究理论的，就专攻哲学、社会经济学及系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这不但丰富了文化生活内容，还补充了学习的不足。

正因为我们当时革命目标非常明确，加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所以大家什么也不想，更没有什么当官呀、发财呀的个人打算，一心一意地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华民族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心情是非常舒畅、非常高兴的。

除了学习而外，劳动也很紧张，我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真正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我们住的窑洞是自己打的。所以到延安的人都会打窑洞，而且打得非常漂亮。冬天取暖怎么办呢？那时也没有煤，有一点煤也只能供伙房做饭。主要取暖是靠烧木炭。我们自己去延安的深山老林里烧木炭。

那个时候，延安附近土炕沟一带都是原始森林，树干都很粗，有一、两个人搂不住的。我们先用斧头把树砍倒，然后锯成

几节再放进炭窑里烧。烧木炭必须打窑，所以我们不仅学会打人住的窑，还学会了打烧木炭的窑。

窑打好以后，便把砍倒的木头一根挨一根地装到窑里边。装好后便把窑口完全封闭，只留一个大口。大约烧一个星期后，即看见烟囱冒青烟，就说明木炭已烧成了，再把烟囱堵死，再过三、四天后，火完全灭了，才能打开窑门往外搬木炭。

取木炭时，窑里的温度还相当高，必须用冷水毛巾把鼻子堵上，再用冷水浇湿全身，才能在窑里呆三几分钟。取木炭不能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轮着进去取。

窑洞里取暖的办法是弄一个大盆，先把木炭点着，冒过烟后，再放回窑洞里取暖。当时我们烧的木炭不仅供应自己取暖，还要支援别的兄弟单位。

更繁重的劳动是开荒种地。延安地方都是山，开荒就是开荒山。开荒是用大镢头刨，镢头的面子有铁锹那么大。荒地开好以后，有的种谷子，有的种山药。开荒、种地、秋收，都是自己干，打下的粮食自己吃。

一九四二年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这时我们开荒种地也有了较好的基础，于是我们从单种粮食转向粮菜皆种，以达到改善生活的目的。我们种的蔬菜有白菜、抱头白、茄子、辣椒、芹菜、韭菜，还有西红柿。其中白菜是大量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蔬菜都能吃上，不仅可以吃烩菜，而且还可以吃炒菜。

除了种菜以外，我们还养猪（主要由学校的伙食科饲养）。另外，因为粮食较充足了，我们还用山药磨成粉面，做粉条子吃。这样我们过时节还能吃上猪肉粉条子大烩菜。

我们还要纺线。纺线有两种，一种是纺棉线，另一种是纺毛线。棉花线都是交公，边区用这种手纺棉线用手工织布机织布，人们称“边区布”，用来给军队干部做衣服。毛线是把羊毛

的犍子毛先剔去，然后用纺毛车纺成线，质量较粗，只能织毛袜或交公织毛毯。现在想起我们每天手把摇车，坐在窑洞前象个妇女一样纺线的情景，不禁百感交集。

上山砍柴，也是劳动的一种。延安地方烧煤是困难的，尽是靠木材。我们去深山老林里把那些死树、山树砍下来，用马或驴车拉回来，运在食堂里做饭，真是省钱热火。

劳动的项目还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所以我们从延安出来的这批人，本事是多方面的。不仅会生产、会种地、会做饭、会打窑洞、会烧木炭、会砍柴，并且在战争年代还学会了打仗，真是能文能武。这些从实践中学来的本领，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回忆在延安的情况，我们就是依靠这优良传统才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击溃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保证了党中央对全国抗战的坚强领导。

（荣世杰根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 孙才

在延安的学习与生活

——《我的回忆》节选

云祥生

（一）在陕北公学院

一九三九年九月底，我们一行二十多人顺利抵达延安，住了中央招待所。入冬后，招待所按时给我们发了冬装，一人一套灰布棉衣棉裤、一顶毡帽和一双粉底皂布棉鞋。这时，李森等几位同志，也从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来到延安学习，同我们住在了一起。

发完冬装后，招待所领导召集我们所有的住宿同志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作了时事报告，并传达了中央教育部门的指示。他说：“由内蒙古大青山地区远道来延安的二十多位蒙古族男女青少年，除朱玉珊和云广生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外，其余全部到杜家沟陕北公学院学习。领队人暂定宋友田同志，他是山西省平遥县人，抗日革命老战士。大家要亲密团结，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即日便赴延安学习去。”

杜家沟陕北公学院在杨家岭北面的荒山中，距中央招待所约十五华里。会议结束后，招待所派出两位同志赶来一辆三套胶轮大车，把我们的行李送到了杜家沟山湾新开设的公学院。学院的半山腰有三十多孔窑洞，门窗已装好，专供学生住宿；山下平滩上盖有十来间土木结构平房，专为做灶房、做仓库和后勤办公用；学院的吃水是在距灶房约三华里的东山沟内，那里有一眼小

清泉和一眼大口井。我们刚到，就看见五六名炊事人员和勤杂工在忙着砌炉灶。一位号称“老八路”的勤杂工，赶着一头大黑公驴，专门为学院驮运吃水。

中央招待所派的那两位同志，把我们介绍给学院的接待人员就赶上大车回招待所去了。自此，我们就正式成了陕北公学院的学生。学院后勤机关派了一位同志把我们领到东山湾半山腰的宿舍内，按上级规定分配了住房。据他介绍，上级规定每个窑洞要住四人，女同学可少于四人，工作人员带办公可住一室。

学院的生活比较艰苦。宿舍既没有炕，也没有床，只有一个土台子，后勤机关还给每人发十五斤蒲草。学员就在这上边睡觉，在土台下支一块儿木板学习。窑洞虽然是夏季打好的，但潮气还很大，睡上一宿，蒲草和被褥就湿透了，象洒上了许多水似的。天好时，一起床就先晒蒲草和被褥，到晚上休息时，再把晒好的蒲草和被褥拿回重新打铺。遇上阴雨天，就只好在潮湿的铺上过夜了。

每天早晨，学员要带上牙具和毛巾到二里外的河滩上出操跑步，顺便在延河边洗脸漱口。要想洗澡，天冷时，我们全体整队去延安城里借用老机关的澡堂洗，大概四、五个月能洗一次；天暖和以后，我们就到延河里去洗。

我们是第一批由内蒙大青山抗日前线到达延安的住革命学校、学革命知识的蒙古族学生。入学初编队时，我们被编为五十五队。全队有三十多名同学，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初中、初小和初识字三种情况。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再加上上课没有教室，教学没有课本，每人只发给一个小板凳，这困难就更多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旷野或宿舍前围住老师一坐，听老师讲解；天气不好时，就在窑洞里听讲。有文化并能用笔记的，边听边记；没文化的和不能用笔记的，听讲完以后和大家一起参加讨论。同学们对老师讲的内容，在分组讨论时，你三言他两语

这么一凑合就完全融会贯通了。这样，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同学们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学校的伙食很单调，隔一个月或二十天才能吃一顿蒸馍，隔两个月才会一次餐（猪肉炖萝卜）；平常一日三餐不是小米饭化盐汤，就是小米饭煮萝卜汤。我们的宿舍在半山腰，厨房在山下平滩上，一日三餐我们都要下山。遇到雨、雪天，常常有一些同学从山上滑倒滚到山下。他们除了沾一身泥巴外，有时还会碰破头、崴了脚，打烂碗、洒了饭。虽然生活这样艰苦，但是同学们的心情非常舒畅、精神非常愉快。同学们一个个吃得红花满面，学习积极性更高了，更加努力了。

不要看五十五队文化水平低，对教师还有选择呢。给五十五队上中国革命近代史的第一名教师是大学生赵通儒。他是操着陕北方言讲学的，如把旧时代货币说成是“麻麻钱”，还经常说“尔个现在”等等。学员们认为他水平低，土里土气，都不愿听他讲课。一到他讲课，就有许多消极抵抗的表现，一些学员不是打盹瞌睡，就是躲在宿舍里迟迟不出来听课。这样，使赵通儒费力不讨好，很难为情。结果西北局派来王铎换走了赵通儒。后来又派陈也兢（女）来五十五队做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并给部分学员上文化课。后又派郭健来讲党建，派徐敬业来讲游击战术等。这些教师都说普通话，学员们的学习情绪也就转变了过来。

新年伊始，同学们各分吃了一把香甜美味的大红枣就算度过佳节。新年后，抗日前线和蒋管区的爱国有志青年一批又一批地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延安学习。其中二百多名学员被分配到陕北公学院。学院成立了五十六和五十七队。我们五十五队也新添了十来名新学员，两名汉族，四位蒙古族。汉族学员是姐妹俩，我只记住了她俩的绰号，姐姐叫大冬瓜，妹妹叫二冬瓜。四位蒙古族姑娘，一名叫云清，是乌兰夫的胞妹；一名叫云利雯，是乌兰夫的内亲；一名叫巴增秀，一名叫云霖。学院按五十五队增添学

员的情况，编了两个中学班，两个识字班。学员的年龄最大的三十九岁，最小的十三岁。

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已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大肆进行反共勾当，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制造军事磨擦，使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政治形势紧张、经济供应困难、物资奇缺的境地。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一方面积极组织力量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一方面号召、动员边区全体军民（包括学生）“俭省节约，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陕北公学院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勤俭节约办学。十五天发一灯油（用墨水瓶做的油灯），半个月发一张纸，三个月发一支铅笔。这样，要想看书学习、整理材料，还得节省灯油、纸张和笔墨。那时，学院还号召职工和学员利用业余时间上山砍柴，以每斤三分钱的价格卖给食堂。我们一些年龄较大的男同学，如我和云治忠、李永年、云霖秀、云志安等，都是利用星期天、节假日上山打柴。每人每次能往回砍七八十斤，卖两元多钱。我们每月上山砍一到两次就能解决学习用品经费。还有一部分同学，如赵有禅、云生格、赵维兴等，都是利用星期天上山拔落蝇草和苏勒茂，背回来做成扫帚拿到市场上卖，每把卖二角钱，劳动一天也能挣二到三元。我们的学习、生活用品经费就是这样解决的。

我们在陕北公学院学习，基本上是半耕半读。春天开荒耕种，夏天锄耨，秋天收割碾打储藏，学习是在农田劳动间隙中自习或听大报告。陕北地多人少，荒山野岭到处有。一九四〇年春，公学院有三百余人，领了近千亩开荒任务。这任务要求把荒山草坯一锹一锄地翻过，当年就播上各种作物的种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劳作时需要付出许多血汗。

学院的同志们虽然在以前都做过工，都在农田里劳动过，可是，在荒山野岭大面积地开荒种地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所以同

学们就有些不大适应。开始劳动还有些猛劲儿，没过几天就腰酸背痛、满手血泡，连镢把、锹把都握不紧了。尽管这样，同学们的积极性还是挺高，劲头也很足，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更没有偷懒当逃兵的。胳膊肿胀疼痛，就在晚间用热水洗一洗，手上打起了泡，就用热毛巾敷一敷，第二天照样早早起来继续坚持着干。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胳膊也不肿不痛了，满手的血泡、水泡也磨成老茧了，同学们锻炼得更有劲儿了。开始每人一天只开二、三分荒，后来每人每天平均开半亩、六分。在大家的努力下，千亩荒地按时开完，还种了六百亩谷子、三百亩糜子、一百亩荞麦。这一年雨水多，苗出得齐、长势好，秋天获得了大丰收。

（二）加入党组织

生活实践的体验、革命理论的学习，使我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我完全认识到，我们穷苦人有了出路，是共产党指引的结果，是党拯救了我们。我暗暗下决心要永远跟党走，为解放千百万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去奋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就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初的一天，我们用午休时间，把内心的活动和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想法写在一张纸上，交给管理学员政治思想工作的陈也兢同志。两天后，她找我谈了一次话，让我抽时间再写一份入党志愿书给她。第二份入党志愿书送去后的五、六天，陈也兢同志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拿出一张表让我填。隔了半个月，陈也兢和王铎同志同时告知我，上级党组织已经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候补期两个月，入党介绍人是陈也兢、王铎。当时我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一下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只说了一句：“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信任。”

由内蒙大青山到延安的学员中，和我一起加入党组织的还有奇峻山、云曙碧。那时每到星期五，我们三人就由王铎和陈也兢

领上到僻静处开党小组生活会。有些同学非常羡慕我们，也经常靠近我们。我们遵照党组织的教导，也经常深入到同学们中间积极开展工作。在劳动中，我们首先以身作则、积极卖力，哪里困难大就到哪里去，时时处处以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因而，开荒种地的任务完成得好，受到了学院领导的表扬。

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备有一个针线包，哪位同学衣服破了或纽扣掉了，我就主动帮助他们缀纽扣、缝补衣服。经过多次帮助，有些同学还跟我开玩笑，说我过去叫云宪（线）文，常带有线供人们用；现在改叫云世珍（针），既带针又带线，真是一位少有的人。

参加生产劳动上山下山多，鞋子很快就磨破了。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和老八路学会了打草鞋，帮助同学们解决了穿鞋难的问题。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好的表现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同学们一致选我当了生活班长。

自从被选为生活班长后，我的工作更积极了，总是想尽办法为全班同学办好事。同学们也很关心我。有时忙得误了吃饭，组里的同学就帮我留饭；有时忙得误了课，他们就给我补课。虽然是繁忙受累，但为了给大家办事，我始终是精神饱满、心情舒畅、积极努力。由于这样，我还被同学们选为学院的模范青年代表之一，出席了延安模范青年代表大会，得奖章一枚，日记一本，革命宝书——《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各一本。

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从各地区来陕北公学院学习的人员来了一批又一批，其中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学员全编在了五十五队。五十五队的人数一下就增多了，光少数民族就增至一百多名，有苗族、藏族、回族、东乡族、蒙古族等。学院当即宣布改名叫民族部，并与学院的大灶分开，另立伙食单位，从杜家沟内搬到沟口东山梁下新开的窑洞里。

民族部由王铎同志负总责，任忠善、巩凯旋和陈也兢负责后勤

工作，李永年分工专管伙食。人员增多了，要求进步、申请入党的青年也逐渐多起来。党支部又批准接受了一部分申请入党的少数民族青年，其中有回族青年李占荣和东乡族青年马德荣，我还参加了他们的人党宣誓大会。大会由陈也兢同志主持，王铎同志讲了话。他要求共产党员要时刻注重团结非党同学，要发扬阶级友爱、互相帮助的革命精神，努力学好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要在各方面做群众的模范，和群众一道共同努力，为革命而奋斗！

（三）挖窑砍柴烧木炭

一九四〇年秋，党中央毛主席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以后，又向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和民众团体提出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号召立即动员起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衣、食及生活必需品。

陕北公学院领导及时召开全体职工干部和学员大会，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提出“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自己想办法解决冬季取暖燃料”的倡议。在讨论中，五十五队蒙古族同学一致表示，同意学院领导提出的倡议精神，并代表全队同学向学院领导提出了“愿为全院冬季取暖，到荒山野林挖窑、砍柴、烧木炭”的请求。当时学院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慎重考虑，批准了我们这一请求。

会后，五十五队由班主任王铎同志指导，队长宋友田同志主持，召开了队委扩大会议。我和李永年、李文精、奇峻山、巴增秀等学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五十五队的实际情况和接受的具体任务，经与会者认真研究，作出以下决定：

（1）体弱多病的、女的和年岁小的同学不去烧木炭，一律拨到后勤组纺线；

(2) 由队长宋友田同志负责，让所有参加烧木炭的人员在出发前检查好准备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 要求学院派一名烧木炭有经验、懂技术的同志一起去山沟指导生产；

(4) 烧木炭人的行李和劳动工具，学院后勤派一辆大车送到生产地区；

(5) 十月十日前生产所需的东西准备好，十二日准时出发到生产地区。

生产地区选在了距延安南四十里的土房沟。这是一个原始森林区，山上长有杜梨、山榆、红果、椴树、野葡萄等；山沟里长有杨树、柳树、冈树、龙木等；山下沟渠里有一股清澈见底的泉水潺潺流过；山林里还不时地传来群鸟的叫声。整个山岭郁郁葱葱、幽雅动人、空气清新。

第一批被批准到土房沟安营扎寨的学员，有李永年、李文精、奇峻山、赵维新、张玉庆、云生格、云治安、云霖秀和我。我们的宿营地是在山间一个土丘下的草滩上，仅有一间约二十平方米的孤独土房。土房没有安门窗，屋内没有煤炉灶，屋前的小土台经整修后安放了一口大锅烧水煮饭。晚间，用木板和棍棒把门窗挡住睡觉。延安地区在十月左右还不太冷，但睡到半夜常被恶狼或土豹子的嚎叫声吵醒。那声音传到耳内，使人毛骨悚然、皮肉紧缩。

到了土房沟生产现场，宋友田同志就把我们十多位同学分成两部分。李永年、云生格、奇峻山、李文精、云治安跟学院派来的技工学挖窑、装木烧炭。我和云霖秀、赵维新、赵有禅、张玉庆等，每人一把长柄扁斧，进山林砍树、集木、运材。劳动了半个多月，多数同学的臂膀浮肿、手打血泡，象针扎一样难受。尽管这样，同学们还是用破布把血泡手包扎住，忍着痛又去劳动。

领导很关心我们，还给我们放了三天假，让我们把浮肿的臂

膀用盐水洗了洗，震破的手抹了些红药水。这些药品真管用，使疼痛减轻了许多。几天后，浮肿的臂膀全消散了，手上震起的血泡变成了老茧。我们很快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要领，一个个成了熟练工。砍树的，越砍越有劲儿，碗口粗的冈木树四、五斧就砍倒了；烧炭的，越烧越有经验，一个多月就烧出五万多斤木炭。当同学们看到学院派的大车开始往回盘运时，一个个手舞足蹈，好象是娶媳妇抢亲那样欣喜若狂。

由于虚心学习，努力生产，我们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消息传回学院后，其他队的学员自动拿出鞋袜衣物表示慰问。学院领导组织了一个慰问小组，由巴增秀带领，拿上慰问品来到生产前线土房沟。巴增秀她们四、五位女同学在小土房内住了五天，除了帮助我们洗衣服外，还帮我们掏窑出炭、抬木装窑烧炭。巴增秀虽然是一只眼，身体也比较肥胖，但就数她表现得最为突出。她帮助我们进窑掏过炭。当时的烧炭虽然在灭火后凉了七八天，但是窑内的余热还是七八十度，就是青年小伙子进窑都热得喘不过气来，进去一二分钟掏上四五根就得赶紧跑出窑来凉风，可巴增秀进窑能待四五分钟，能往外掏十多根。从烧窑出来以后，她的衣服全湿透了，脸上的炭灰扑得满满的，和戏剧舞台上李逵、包拯的大黑脸一模一样，逗得同学们大笑不止。

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各方面的鼓励后，我们就有些骄傲自大了。工作也不够细心了，劳动随随便便。砍伐的，把带朽的杨、柳树都砍倒运到了烧窑处；装窑的，也就把带朽木材装进窑里。结果，新建场烧好的十几窑约二万多斤炭，出窑三天后，带朽的被风一吹，死灰复燃，火苗冒下两丈多高，两万斤木炭全化成了灰。在附近劳动的同学看见新出窑的木炭起了火，赶来灭火抢炭，炭也没抢出，人倒被烧伤了。我们砍树的人不警惕，有的把脚也给砍伤了。这些伤员都被送进了后方医院。这一教训，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生难忘。

（四）在延安民族学院

一九四一年春，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全面调动各族人民的抗日力量，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革命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决定在陕北公学院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

民族学院设在延安城北的一个三面环山、水源充足的小山沟里。新建的一排排窑洞窗明眼亮，象珍珠似地镶嵌在黄土坡的半山腰。在山下斜坡的广场上，盖有一座一千二百平米、能容八九百人的土木结构大礼堂，这是学院集会和文娱活动的场所。学院的食堂建在校园东南角的平滩上。当时的院长是高岗，副院长高克林，教育长乌兰夫，副教育长王铎，总务处长宋友田。

民族学院正式宣布成立后，就把从各地到延安学习工作的蒙、满、藏、回、苗、瑶、彝及东乡等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壮年陆续调拨到民族学院集中学习。当时以学员的文化程度高低、工作经验多寡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分别编为六个班，约有三百多人。

我从陕北公学院调拨过来时，被编到第一班学习。我记着第一班的学员，有李永年、李文精、李世昌、李自勉、李新民、李存义、李国玺、云霖秀、云志安、云曙光（布赫）、云清、云丽雯、云世珍（云祥生）、云生格、荣钟林、郑国兴、彭华安、瑞俊（锐军）、浩皇（潮洛濛）、浩帆、周兴元、马思义、海涛、苏冰、张玉庆、张培德（李景山）、胡士贤等。我在一班学习了不到半年，就被调到学院油印室，接替霍流同志的工作，主要刻印各班讲稿、学院文稿、表格，还兼管阅览室。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我参加了民族学院职工干部的学习。学习的方法，是在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各自对

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存在的缺点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检查批评，认识提高以后就可总结。那时，我虽然已是二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具有大专文化知识的革命干部，但我在各方面表现得还很幼稚，一受到批评就发急脸红，给人提意见比较主视、片面，态度比较生硬，常引起顶头上司的反感和忌恨。后来我被调到西北局民族科。

（五）去西北局路上的见闻

农历七月，延安地区正进入雨季，我顶上雨去西北局报到，住在了半山腰上的西北局招待所。山下延河水猛涨，山洪暴发，浪头有一丈多高。这时，延安正举行体育运动会，定边专区的十六名运动员住在延安城南门外体育场的土台棚里。杜甫川来的特大洪水汹涌澎湃，延安城南门外体育场上的所有建筑物全被冲倒推走。体育场被冲了一道丈余深的沟，定边专区的十六名运动员全部遇难。西北局招待所宿舍窑在大雨中倒塌两孔，我几乎被葬在破土窑里。

雨过天晴，道路仍是泥泞不堪，各河沟里山洪余流的势头还很大，我单人行走确实有困难，只好在西北局招待所又住了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我除了阅读些书报、学些文化理论知识外，就跑到学校听同学们谈整风情况。听说“云北峰等被公安局叫去关押了，有些同学被软禁、围攻”等等。据说，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出了一个馊点子，叫做“抢救”，就是只要坦白交待自己是“特务、反革命分子”就受到从宽处理，除了解除监禁、围攻与批斗外，还受到优待，给吃挂面荷包蛋。

这一馊点子出来后，有些机关、学校就召开大会。有一人在台上胡乱讲一通，台下就有一些人举手呼应“我也是特务、反革命！”这些人马上就让退出会场，被领到解放室给吃挂面、荷包

蛋，美其名曰：优待解放新战士。凡是这样做的干部和学员，当即就可以自由行动。然而，他们坦白交待下的“特务、反革命”材料，要签名、盖章、存档。这就给自己留下永不光明的后遗症。“特务、反革命”帽子被长期戴在了头上，这些人也就被限制起来使用。以后各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因此被围攻、批斗、打骂，甚至有的被折磨得身残、命亡。实质上，这些人都是蒙受了不白之冤。

责任编辑

赵国恩

忆“蒙汉联合支队” 和羊都庙战斗

王秉义口述 赵国恩整理

我的大部分经历已在《上默特史料》第九期上登载过了（题为《我的戎马生涯》）。在此，我仅将“蒙汉联合支队”和羊都庙战斗作一回忆。

“蒙汉联合支队”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编制而成的，下设三个大队。绥蒙军区的潘济武部长给我们发了委任状。李森任支队长（当时他不在，由曹文玉同志兼任），曹文玉任政委，赵俊锋任政治部主任；我和洪永德任第一大队正副队长，李耀清和云德胜任第二大队正副队长，马建功任第三大队队长。当时，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一带。过了春节以后，我们顺着榆林、新甸子，探到和林、清水河这些地方打游击。我们还解决了三道营的乡公所，缴获了十几支枪。后来，又进一步深入到了凉城的小王村，在那儿吸收了一部分人，扩展了队伍。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敌人向左云、右玉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这两个县。当时，上级决定战略转移，命令我们支队协同康张骑兵旅（康建明旅长、张达志政委）护送当地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出发。在厂汉营南面，我们将党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安置好以后，又奉命向内蒙挺进。我们从凉城东边的岱海滩、卓资山的东边一直往北走，转战到了大青山一带。在这一时期，张达志政委

经常给我们讲些打游击的知识。有一次，他举了个例子问我们，这是敌人的封锁线，西边住的是敌人，相距五六十里，你们从哪走呀？我们回答不上来。他教我们必须先看一看，敌人的哪个据点力量薄弱，你就贴住它走，哪个强，你就躲开它。你从弱的地方走，等他发现了，你也就过去了。我们听了以后，觉得人家的道理讲得很对。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获得了不少知识。

我们支队和康张骑兵旅在行军途中经常与敌人接火。走在武川那一带就跟敌人打了一仗。平常，部队每天是五更行军，赶到八、九点就宿营，白天不动，走的路程挺短。那次，走得有点儿晚了，恰巧遇上了敌人，双方打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人没多牺牲，只是跑了些马子。到了淖尔梁休息下，部队领导决定让没有马的回大青山打游击，坚持工作。水磨沟的王疤子、乌尔素沟口子的豹豹，领了二三十人进了大青山。把他们打发上走后，我们朝土毛尔台方向进军。半路上，又和鄂友三的部队打了一仗。这次战斗比较激烈。一团从左边进攻，四团从右边进攻（黄厚的二团从口里走了）；我们支队和三团配合从正面进攻，正巧和鄂友三的司令部打了个照面。三团在五、六挺机枪的掩护下冲了上去。我们支队协助他们从右边冲杀。两面夹攻，把敌人打了个稀里哗啦。缴获了敌人三、四十支步枪、四挺轻机枪。得胜后，我们以一黑夜零半天的时间连走了二百多里路，到了福生庄北面二十多里的地方休息了一天。们们为了把敌人的部队引到福生庄来，就在第二天一早，挺进到离福生庄十来里的地方。到了傍晚，我们又朝土毛尔台的方向走了。

当时，“蒙汉联合支队”的政委兼支队长曹文玉被调上走了，我们一大队和二大队在康张骑兵旅的保护下，来到了红旗大庙。康张骑兵旅就把我们两个大队交给了内蒙骑兵十七师师长云继珍指挥。云继珍是在一九四五年投降的八路军，这次出来是为了发展队伍。我们归他的时候，他身边只带着二十多个人，当官

的多，当兵的少，成天就在土毛尔台东边的嘎化斯台、一八树尔这一带转。我们来了以后，才象个队伍的样子。云继珍爱喝点儿酒，喝上酒就睡在那儿了。我们和他工作了一个时期，政治部主任赵俊锋就有点儿不乐意了，觉得象这样下去非吃亏不行，就叫我去和内蒙骑兵十一师联系。我到了德密旗庙碰上了朱玉珊（善岱人），在他那儿住了一夜才和十一师的人联系上。十一师非常欢迎我们，还给了我们些衣服。我们就这样和十一师到了一块儿。十一师的师长是乌力吉敖其尔，政委是毕力格巴图尔，政治部主任是李文精。我们和十一师配合上跟鄂友三、孙兰峰的部队打了一仗。人家部队有好几千，还有好几十辆汽车，一直攻打到草地，占了德密旗庙。这个地方一丢，我们就朝东、西宿泥板北面的沙漠中撤上走了。在战斗中，我们也消灭了不少敌人。就在这个时候，云继珍的骑兵十七师和李耀清的一个大队也在察哈尔西边跟敌人接上了火。云继珍和几个部下被敌人活捉了。后来，云德胜跑回来了。那时候，云继珍领的人有魏震、云雨霖、云惠芝、云文义等。这次战斗死的人不算多，大部分撤出来了。大约在四七年的六、七月，李文精、赵俊锋和我带了五、六个人回了贝子庙。上级分配我们到干部团学习。过了几天，大部队也被调回了贝子庙，学习政治课。

学习期满后，我被分配到内蒙骑兵十六师一团任副团长，团长是云一立。十六师的师长是李秀山，政委是寒峰。就在这年的八月十五前后，十六师二团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老万虎团长被俘（他被俘后，被关押在张家口，解放张家口时他才得救），布利亚特匪徒趁机攻占了离贝子庙百十来里的羊都庙。在这里，我们一团和十六师的另一个团（林国亮任团长）跟布利亚特匪徒打了一仗，这就是有名的羊都庙战斗。

布利亚特匪徒很猖狂，经常在贝子庙附近骚扰。羊都庙有咱们的旗政府，旗长叫公嘎。公嘎原是王爷的一个奴才，我军解放

了这个地方后，把他任为旗长。这次羊都庙失陷，公嘎落在了敌人手中。布利亚特匪徒威胁他，逼他投降。我们十六师听到了这一风声，就派我团二连连长云德胜去援助。云德胜派了两个人（一个是土旗的，一个是正黄旗的）进去探听虚实。临走时，让他们拿上小旗，并吩咐他们有了情况该打什么旗号，没有情况该打什么旗号。这两个人一进去，就被匪徒绑架了。有几个匪徒拿上旗子出来乱摆。我们的人一看摆旗的不是自己人，也就不敢进去了。这些匪徒见我们的人不进去，就追了出来。双方打了一会儿，我们的人退了下來。向贝子庙驻地的奎璧、李秀山报告。他们研究了以后，命令云一立和我带一个连，林国亮团长带一个连去攻打羊都庙。

这天下午，我们两个连的人马到了离羊都庙约三十多里的地方。林国亮、云一立和我在一起研究怎么个打法。林国亮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他说，羊都庙南面是水，河洼子和树多，敌人肯定不从这儿逃；西南面是开阔地，是敌人逃跑的必经之路，我带上人隐蔽在这儿堵截，你们骑上马从正面进攻。我们讨论了一番，决定就这样行动。林国亮带了些人朝西北走了，我们带上人马向羊都庙冲去。羊都庙脑包上的哨兵发现了我们，打了两枪，可是，他们经不住我们一百多人马的冲击，一下就乱了营。我们冲上去，把他们堵截在了东边的庙院里，待我们卧下马后，就扑过去打脑包底下的匪徒，打得他们四散而逃。我们一直从东边打到西边的白塔旁，打死了十来个匪徒，其中还有个当官的，活捉了十几个。我们追出去以后，发现林国亮的人马连一个匪徒也没截住。原来，这几年十六师的人被布利亚特的匪徒给打垮了。他们在这里根本就沒敢打。据说有一次，一个指导员带着十一个人在一户人家内吃面片，被两个女人掏出手枪逼住，又从沙蒿柳林里冲出一伙人，把他们全部捉住、整死了。这些匪徒确实是够凶狠的，怪不得林团长他们不敢打。

我们打走了布利亚特匪徒后，怕人家反攻就撤了下来。我当时不怕，觉得那些匪徒已经乱了，没有反攻的能力。我一边往下撤，一边思虑着，真后悔没有把庙内的一群骆驼赶上。走到半路，我还硬是叫了三四个人返回去，把那一群骆驼赶了回来。我们退出二十多里后，才在草滩上休息下。当时，云一立心里不踏实，决定要返回去看一看庙内究竟有没有窝藏下的匪徒。他和我带了几个战士返回去详细地查看了一遍，庙内确实跑得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后来，听说这些匪徒朝多伦跑了以后，再没敢过来。我们返回贝子庙向奎璧、李秀山汇报了这次战斗的情况后，就地学习了一段时间。赶到冬天，我们又奉命到克什克腾旗经棚保护土改。

日本投降后

第一个旗政府的成立

兼述旗长色木腾大喇嘛

塔 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绥包战役前，绥西地委书记白成铭同志、专员李维忠同志，带领以汪贤才同志为首的（汪为副团长）大青山骑兵三团两个连二百多人，由商都打到包头横扫千里的战斗情况已在《呼和浩特史料》第四集“绥包战役序曲”一文中叙述，现在再将我军进入牧区——召河的情况略加叙述。

部队从商都出发，大多数时间是白天行军晚上休息，当部队行进到距呼市不远时，即改为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以免暴露，引起国民党军队的注意。有一天夜间，部队行动到武川县城附近，尖兵发现一个村子有马叫声，汪贤才命令立即将该村包围，一枪未放就将住在该村的几名国民党兵全部活捉。由于夜间行军紧急，来不及对这些家伙审问，所以就把他们捆在马上尽快又出发了。又走了一、两天，一天早晨，进入了牧区。我军大队人马进入牧区还是少有的，抗日时期，我军在大青山活动，但大队人马还未到过牧区。我军进入牧区的头一个点是召河庙东边的五卜浪河（五卜浪河是蒙汉语混合名称），这里的牧民对八路军的大队人马，还是第一次见到，但对八路军是干什么的还是有所耳闻的。整个抗日时期我军活动虽然离这里不远，但真正进牧区打游

击还是没有的。这里的牧民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八路军，也没有表现出对我们不理解、害怕、惊慌、逃跑等现象，一切都很正常，同农区的老百姓一样，牧民对我们很热情，让进蒙古包，安排吃喝。可是由于牧区居民少、房子也少，我们大队人马的来到，都进入房子里和蒙古包里就困难了，于是，就在牧民的屋外，蒙古包外生火烧茶，供我们吃喝。

刚要休息，白成铭同志即要我到召河庙或大营盘与外蒙古军联系（因我们带有电台，每日与上级有联系，得知这里住有外蒙古军，我们这次来到召河就是与外蒙古军来取得联系的）。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找了一个牧民和我一同前往。这里到庙或营盘有十几里地，因为幼时来过，路还是熟的，只是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路虽不远，但由于我骑的马腿拐了，大约走了一个钟头才到。我先到了营盘，结果这里住的不是外蒙古军，而是当地的蒙古地方武装。尽是些老兵，穿着很破旧，多是便衣。由一个汉话不好的老兵将我引见了他们的头目，可能是个队长。这个上年纪的人无精打采，情绪不振。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也毫不隐瞒，告诉他我是八路军，来与外蒙古军联系的，这个队长见到我这个陌生人，又是八路军，好象有些不知如何是好，而且说外蒙古军驻在召河庙里。正在筹划之时，有两个穿戴整齐、带有肩章的外蒙古军人赶来了，其中一人三十多岁，脸上有些麻子，追问来的是什么人，那个队长将我指给他们。我表示与他们来联系，那个队长用蒙汉语为我们做翻译。这个营盘在召河庙南，围墙有丈余高，只有南门，距召河庙四、五里地，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呢？原来外蒙古军在庙顶上站了岗，用望远镜看到有人进了营盘，他们马上就赶来了。他们知道了我的来意，随即要我跟他们到庙上去。到了庙里，由于我不会蒙语，表达不了意思，正好瑞军同志早已来到这里和外蒙古军住在一起，他会些蒙语，而且我们是同学，总算搞通了，当他们知道白成铭同志等住在五卜浪河，有一

个四十岁上下的外蒙古军中尉，小个子军官还会说两句汉语，说什么王明等，可能是认识或知道王明，这个中尉带了一个人，背了两枝枪，其中一枝是老式大连珠，枪上有瞄准镜。我们一同赶回五卜浪河，会见了白成铭、李维忠同志，由瑞军当翻译，就坐在草滩里进行了洽谈，也就是取得了正式的联系。然后那位外蒙古军官和瑞军返回庙里了。

在五卜浪河这个牧民村子里，虽然牧民第一次见到八路军仍对我们很热情，照顾我们吃住。但村子太小，住不下我们这二百多人，而且我们已与外蒙古军取得了联系，下午就往离召河庙不远的鸿记移动，（鸿记在召河庙的北面四、五里处，是一个专做蒙古生意的大商号，有大院落）。已是秋末季节，牧区仍是绿草茵茵，骑马行进在草原上，一片旷野、空气清新，好不令人生快。部队正在行进中，突然听到喊“跑啦”，紧接着听到清脆的枪声，这声音是从后边传来的，当我回头看时，原来是在武川附近抓到的那些家伙，其中一个仗着马术好，双手被捆着还想在行军中跑掉，没想到跑出离队伍不到几百米处，通讯员一举枪就结果了他的性命。当我在马上回头看时，那家伙已摔到地下，而那匹白色的马却若无其事，身上除去了负重，自在地啃起地上的青草来。这家伙想跑，不是被狼啃就是喂鹰了。战士们把那匹悠闲的马牵上，我们继续向前进行了。

我们在太阳落山前到了召河，住在了当时最大的做蒙古买卖的商号——鸿记。白诚铭同志第二天就去百灵庙会见外蒙古的高级领导人去了，汪贤才同志因白诚铭同志不在，带部队去召河附近的农区活动去了，我跟李维忠同志移到召河庙——席勒图召的东坎下，距庙约半里多的一个叫阿拉并赛的大喇嘛家住下。

我们在那个喇嘛家住了不几天，外蒙军即从召河庙撤走了，他们人并不多，只有二十多人，外蒙军在庙里住时，因人少，白天在庙的最高处站了一个岗，晚上就把岗哨撤了，由两个

骑兵围着庙不停地转，以加强他们的警戒，外蒙军穿着苏式单衣，戴着朝天帽，外套呢子大衣，武器有苏式和捷克式步枪，没有机枪等重火器。

外蒙古军走了以后，李维忠带我们几人住到庙里。接着，住在召河庙南营盘里的当地武装全部跑掉。汪贤才带的部队住进营盘里，他所带的部队时来时去。我们住进庙里时已不见一个喇嘛，到庙后我们对全部房屋及神殿进行了查看，查看中发现了几枝步枪，又在庙的大殿东头，也就是现在供旅游者吃饭的那间大屋子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地窖，里面放着不少大捆的斜纹布和未开箱的砖茶，这些东西都是庙产，属佛爷所有。这个大殿西南方向的几间房子里，也放了不少杂货及大批粮食。据了解，后者是哈里西亚（即合作社）的物品。

在李维忠的主持下将以上东西做了如下处理，合作社的东西，全部分给召河的牧民。这些东西堆放在那里看着有不少，可是给所有的牧民分就显得不多了。有些物品对于牧民来说并不迫切需要，如土筐等。当时牧民最需要的是吃穿。由于日本统治多年，牧民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布匹，更为紧缺。李维忠同志决定，为了给牧民解决困难，把地窖里存放多年的布匹用借的名义，分给了牧民，因庙产是佛爷的，牧民们迷信，开始还不敢要，李维忠同志动员我们给牧民送到家里，经过说服，才逐渐收下来。后来有的牧民听说了从老远的地方赶来，几天就都分光了。据了解，召河所有的牧民基本都分得了一些。这对开展牧民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我们部队也用了一些布。

把以上东西处理后，李维忠同志决定尽快在召河成立旗政府。召河原本是属于土默特旗的地方，召河庙也是属呼和浩特市席勒图庙的分庙。席勒图庙原是土默特旗庙，召河地方在伪蒙疆时成立过旗，以庙的名称命名，叫席勒图旗。

成立旗府问题，在李维忠同志主持下，经过酝酿、宣传，召

开了一部分有代表性人物参加的会议，宣布旗政府成立，仍称席勒图旗，旗长由该庙最有声望并愿意从事政治活动的大喇嘛色木腾同志担任。当时他本人不在当地，被外蒙古军带到外蒙古去了，就在宣布他为旗长后的两、三天，这位愿搞政治的大喇嘛同志就返回来了。回来后得知自己当选为旗长，老头子非常高兴（他从小出家，熬上席勒图召第一号大喇嘛时已五十多岁）。我们向他解释关于借用庙产的布，分给了群众，他说很好，群众没有衣服穿，布放在那里不用，应该给群众解决困难。另外我们向他解释骑兵驻在庙里，马粪很多，不太干净（庙的院内按宗教习惯是不能养牲口的）等，他都表示没有问题，打扫一下就行了。另外佛像前幔帐等稍有损坏，他也说没事，坏了重搞。总之对我们很好。这里再把这位大喇嘛色木腾同志后来的情况简略交代几句，关键是这个大喇嘛后来居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和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了。

色木腾同志当旗长后，就把这个旗政府交给了他。此时我军大部队已攻克了集宁、卓资山，包围了呼和浩特。大军又向包头挺进，绥包战役已经拉开，我们也就西进了。在绥包战役最紧张的时刻，他带了几个人专程到包头地区，向专员李维忠汇报旗里的情况，还做了请示，待他请示完返回时，李维忠同志还给了他几十枝枪。色木腾也不敢再在召河待下去了，把他带回去的枪埋在地下，带了两个人，把妻儿扔下（他在喇嘛中娶妻较早），同我们一起撤退，一起打游击去了，从此参加了革命，后来背叛了宗教信仰，由李新民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他被派到锡盟，对开展锡盟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后，他当了一个时期的乌盟副盟长，对开展乌盟牧区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为革命奋斗二十多年。色木腾同志由一个大喇嘛转变为一个共产党员，并且在革命过程中做出了一定贡献，这是不多见的。色木腾同志在解放战争

中和解放后的详细情况，因我未和他在一起，了解的不多，只是概略说一下。

关于在召河牧区最早成立的一个旗政府，只简要回忆如此，更详细的情况请李维忠、瑞军等同志补充。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

责任编辑 云文瀚

朱实夫入狱

经 瑞 霞

一九三一年，我正在北平蒙藏学校读书。一天，我看见从男生宿舍里走出一个陌生的青年，他身材匀称，面目清秀，一双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仅仅是短暂的一瞥，却那么神奇地吸引了我。真是英俊、精干的青年人。他的影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真想知道他是谁，从哪儿来的，他到学校找谁，他又在做什么事情。可一个姑娘家怎么向别人去打听一个男人呢？我偷偷地窥视着男生宿舍的门口，希望还能够看到他。可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悄悄向我的表弟殷文麟打听他，才知道他叫朱实夫，是旗下人，也曾在蒙藏学校读过书，现在他常常走蒙古。

从那以后，他的形象总在我眼前晃动，不知不觉中，敏感的女同学发觉我对朱实夫的感情。她们要探测我的内心世界里是否真的有这个人，于是开了一个令人肝肠欲裂的玩笑，却促成了我与朱实夫的婚姻。

“喂，瑞霞，听说那个走蒙古的后生在路上死了！”

我顿时怔了，木呆呆地睁大了眼睛，接着我竟悲痛地哭起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非常喜爱他了。虽然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就在那一瞥中，他的精神魅力，是那么强有力地攫取了我的心，并倾注了我全部的爱，如果他没有了，我对爱的向往，又到哪里去寻觅呢？我精神世界最美好的期望全部消失殆尽了。

我觉得自己浑身无力，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一味地抹泪。

女同学都慌了。这玩笑开得太残酷了。接着她们向我解释，那不过是玩笑，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直到她们起誓发咒，我才平静下来。

我这样的痴情，在同学中间传开了，并得到了他们的关注。热心的男同学主动要把这件事情撮合成。

一九三二年，朱实夫又到蒙藏学校时，男同学向他提及了这件事。朱实夫感动地说：“真有这样多情的女子？……她是谁？”

男同学指着我给他看。

朱实夫愉悦地笑了：“我听过她在宿舍里唱歌，她唱得真好听！”

“这么说你也早注意她了？”

朱实夫默认了。

当我们见面时，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在我眼里的他，是一个很俊的男子，我觉得自己与他相比，实在是太丑了。我知道自己虽然身材娇小，皮肤白净，但小小的眼睛是不讨人喜欢的，所以，我忧心忡忡地望着他。

他却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立即对我说：“咱俩都是从小就失去父母的人，我们都能体味到对方的苦衷，我想，我们会相处好的……”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及个人遭遇：

我的爷爷叫朱隆阿，在土旗衙门供职。我家原籍在归绥城南掌盖营子村，现住市里衙门口。我的父亲叫巴彦，在我四岁时因房产基地问题打官司坐狱而死，母亲跟先父而早亡。我有个大姐叫兰兰，妹妹叫秀英。姐姐是同父异母，妹妹生得可爱漂亮，我很喜欢她。我父亲去世后，我们三人由爷爷抚养。我有一个继奶奶，是个满族人，她不喜欢我们，常常背着爷爷给我吃发了酵的面片儿，穿絮着破棉花的棉衣，我总是冷得哆哆嗦嗦。爷爷发现

后奶奶儿子穿的新棉花絮的衣服后，伤心地说：“在我们家也唱起《鞭打芦花》这出戏来了”。从此，爷爷在饭馆给我订了个折子，并雇人给我做衣服，那时，我还能得到爷爷的疼爱。爷爷要把我培养成才，六岁就让我读私塾，后来我又上了土小。

在我十五岁的那年，爷爷也去世了，家里分给我的房子由三叔代管。在没有父母的家庭里，我深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因此，产生了独立谋生的欲望。有一次三叔打了我，我一气之下，偷偷卖掉爷爷的皮背心，用这钱作盘缠逃到了北平，入了蒙藏学校。因为我没有经济来源，就托人在驻京办事处给我找了个招待蒙藏人的差事，星期日干一天能赚一元。

后来，我到了黄埔军校（肆期）毕业后去苏联炮校和东方大学继续学习，然后又到了蒙古工作。这次回来后，才知道我妹妹死了……我在国外期间，家里人作主，把妹妹嫁给一个山西的洋行老板，那人已经五十多岁了，妹妹是去作小的，后来她喝大烟自杀了……如果我在她身边，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没有尽到作哥哥的义务……

他悲痛地噙着泪水，我看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男人，对他更倾心了。他的家庭和遭遇使我知道，他需要的是真诚的爱，我自信自己是能够给予他这些的。

“瑞霞，我是学军事的，军人的命运是不能未卜先知的，我知道，你小时候也吃过许多苦，尝过苦的人是不会惧怕艰难的……你跟着我是不会过那种安逸的生活的”。

“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不会拖累你。”

我们于一九三二年订了婚。

我姐姐得知这桩婚姻很不满意，她认为我父亲经权（经子衡）是都统，我们是大家闺秀，怎么能下嫁普通人家呢。

当她看到了朱实夫后，赞赏地说：“实夫聪明能干，人又

好，是个有前途的青年……是土旗有希望的人才”。便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天气阴沉，浓重的乌云凝聚在天空，使人感到异常窒息。那天，我望着夹着尘埃的旋风，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这时，我兄经革陈突然仓惶而来，神色紧张地对我说：“叫实夫他们赶快离城，人家要抓共产党呀！”

我顿时急得团团转，实夫常常不告诉我他的去向，我真不知他现在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哥哥说：“到他的同学和亲戚家去找找看。”

于是我连跑带颠地出人在我认识的人家，从中午到黄昏也未找到。天色渐渐晚了，夜幕即将降临，我的心拧紧了，可怕的事情往往出现在黑暗之中，似乎实夫会被黑黝黝的夜吞噬了。我急得背脊上渗出了冷汗……

他们为什么要抓实夫呢？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呀。我知道他是从苏联和蒙古回来的，他对我说起过苏联有集体农庄，人家的生活过得好。他还讲起过西伯利亚大铁路，那火车一趟走十几天，横贯了东西，真了不起！他说的都是好事呀，当局为什么不容他们呢！

有一次他高兴了，肩上搭着一条毛巾，手里拿着扫炕笤帚，学着货郎摇拨郎鼓，嘴里还念叨着：

大布褡裢，取灯灯，

玛乃买卖，拨郎楞，

奇阿布了阿布①

不阿布玛乃亚布亚②

这是蒙汉语混合的话，是草地汉人做买卖不精通蒙语的夹生

① 你要买就买。

② 不买，我走呀。

话，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实夫会俄语，也会蒙语，他告诉我，从蒙古回来时，就是装扮成买卖人回国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次回国是护送王若飞同志，和他结伴的还有吉合同志。

那天我怎么也找不到他，就往西河沿他家的方向走去。后来我想到西河沿还有补智邦，我就去到他家里。进屋后补姐姐说：

“实夫在邻居家”。我立即闯了进去，看见他们正在打牌，我真有点生气，实夫跟我走到院中问：“有什么事？”

我嗔怪地说：“人家要抓你们，你们还打牌。”

实夫说：“我们有事呢！你怎么知道要抓人？”

我把哥哥的话告诉了他。

他思索了片刻说：“口子上是出不去了，我到小西街木匠铺躲躲，你先回我们家等着我，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他从东走了。

我到他家不一会儿，便听到踢门声，接着进来一伙穿黑衣服的人，他们有的上了房，有的进了屋，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到朱实夫搞赤化的罪证。

这时，院里的住户也替实夫的安危着急，东屋的裁缝想出去给他捎个信儿，可是大门口和四周都布满了警察，他借口要上厕所都不准出院。

警察闹腾了很久，一个管事的指着我说：“把这个女人带上，好钓大鱼！”

他们把我一拉一拽地拖到了大门口。

一伙人刚走出大门口，忽然听到拍手声，一个警察又趔了回来，拉开了大门扇叫道：“是他，在这儿呢！”

我不由一怔，他到底没有逃脱……

他被一个人紧紧抱住，而抱他的人正是林祥。

接着他们用绳子把他五花大绑起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街口已经没有行人（估计是半夜十二点了），我们被押着走了很远很远，走过了大南街又走过了小十字后，便在路东的巷子停下来。我一看是三仙庙，原来市党部就设在这里。他们把我推进了东房，后来才知道，这是徐德的住处。

当天夜里有好几个人审问我，我只认识一个叫陈国英的，他是我在女师上学时同学的父亲，是省党部委员。他说：“想不到是你呀！女娃娃也干起共产党来了……”

我瞟了一眼这间房子，屋角上摆着水桶、麻绳、手铐、脚镣，还有一些我没有见过的刑具。

陈国英又说：“你好大胆，还找了个共产党的男人！”

“我只知道他是土旗人，他没干坏事，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我们抓他是有证据的。”

“我看看你们的证据。”

“那不能看！”

后来他又象哄小孩似地对我说：“你不过是个共产党的小毛卒卒，只要你供出谁是共产党，你们干了些什么，在什么地方开会，我就放你出去！”

“我不知道那些事！”我回答他。

他们一连审了我好几天，我只说：“不知道”。

他们把我关了五十多天，突然把我放了出去，我以为实夫也会出来，却没想到他们把他送交了高等法院。

我出来之后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在大西街徘徊，身上没有钱怎么能回萨县姑姑家呢。这时又遇到了补大姐，她让我到她家住，我却执意要走，于是她给了我五元钱，叫我放心，她会去探望实夫的。

到了萨县，我姐姐也在那里。

我姐姐知道我在归绥被抓，就让我姐夫赵仲容去作保。当局

说：“你是山西人，我们是归绥市，你必须让经革陈作保，我们才认这个帐”。有一个人比较客气，说先可以把你妹妹放了。

我姐姐就给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革陈哥打了电报。我哥回来问怎么回事，我姐让他找姓潘的和姓张的，设法把实夫保出来。

后来我哥告诉我姐说：“他们说党部缺本地人，让我入呢！”

我姐说：“你先入了吧，以后再说”。

我哥就这样入了国民党，人家才同意他为朱实夫作保。

可是朱实夫迟迟没有释放，直到七月份，补大姐来萨县找我，说：“实夫出来了，让我来接你”。

我急忙回到归绥，到家一看，他躺在炕上，眼睛直直地望着我，他整个面容已经变了模样，脸色发青，头发花白，这哪里象个二十多岁的人呢，几个月的狱中生活，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我望着他泪水簌簌地流淌。

他三叔告诉我，实夫在狱中得了伤寒病，多亏狱中的难友关照，他还留一口悠悠气。

三婶说：“我每次送饭，他都把饭让给难友吃，他这个人又挺随和，也不知道他和难友尽说些什么，那些人都对他特别好。他得病以后，我亲眼看见，那些人因为牢房潮湿，睡觉时，难友躺在地上，让他睡在他们身上，他是得了人家的心啊！”

三婶又说：“他是病重了，眼看就不行了，你三叔就去找你哥，又找了荣祥，又以一个朋友的商店为铺保，才得到个保外就医放了出来”。刚回来时，高烧人事不省，我们请了张纯一大夫，大夫看完病说：“你们喂冰块吧，到明天还不清醒，就不要找我了”。我们喂了一脸盆冰块，整整一夜和一上午，后来他醒过来，并且要大便，张纯一大夫又配药给调养，现在好多了。”

我在他身边照顾他，在病中他对我说：“国民党也扯淡，还

审问我呢！我反过来问他们，还被我问住了，他们骑虎难下，要不是得了病，还不知关多久呢！”

我想起了狱中的刑具，再看看他被折磨的样子，便问：“他们给你动刑了没有？”

他深情地对我说：“我们这种人进监狱不会只一遭……在那里面由人家折腾，你听了会吓坏的，以后不要再问了……听说你在里面什么也没供，真是好样的，你为我吃苦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狱中他被打得昏死过，以后就扔到一个非常脏的屋子里（有臭虫和跳蚤），所以才得了伤寒病。

我笑着说：“同甘共苦嘛！”

我们虽然还未结婚，我象他的媳妇那样侍候着他，直到他的病痊愈。

病好后，他说他是军人，要找冯玉祥到他的部队去。那时冯玉祥的部队已从后套到了宁夏准备到新疆。他追到后套追不上了就返了回来，后又到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当教官。一九三四年他回来说他是蒙人，去德王那里吧，那里需要人。于是，他走了，到德王的乌滂守备队去了。

（连载之一）

玉禄生平概述

程景华

玉禄，字鼎臣，蒙古族，土默特旗右翼二甲首佐人。一九〇四年间，绥远将军贻谷从土默特蒙古兵中拔选出五百二十人，用三百枝德国造和二百二十余枝汉阳造步枪装备，编制成土默特陆军第二营，玉禄被拔丁入第二营当兵。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后，山西阎锡山的革命军由太原出发，经过伊盟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进占了包头城，接着挥军向东挺进，击溃了萨县城的满州兵。绥远将军坤岫急令土默特旗的陆军第二营营长发义率军，由归化城出发，在陶思浩附近之刀什尔村，阻击革命军，激战一天，将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王家驹打死，部下士兵伤亡甚重。革命军败退，以后玉禄晋升该营第三连连长。

一九一三年间，继任绥远将军张绍曾鉴于土默特陆军营的实力很强，又因外蒙古宣布独立，对土默特的影响也很大。张绍曾命令驻归化城的第二营一、二连到旧城北门外小教场集合，暗派重兵将一、二连包围，强行缴械，解散了。当时该营的第三连玉禄部，驻扎在武川的大滩，被遣散后的一、二连士兵们，纷纷投奔到玉禄部下，拥有几百人了，并有陆军营派出述吉太等十二人，赴外蒙古去联络，在返回途中，被张绍曾发觉，在二道沟遭到滂江守备队逮捕，十一人被杀害，仅达挠一人幸存脱逃，向玉禄报告了遇害的消息，玉禄闻讯大怒，立即率队到二道沟，将滂江守备队歼灭，率部起义了。

玉禄部起义后，绥远将军张绍曾，多次派兵追击，都以失败告终，接着又派土默特旗的参领森鄂等去招降。玉禄单人匹马赴武川会见了森鄂，森鄂等向玉禄施加压力，胁迫玉禄受降。玉禄借上厕所的机会，骑马夺路而走。并把队伍拉到外蒙古，外蒙当局用俄式武器重行装备了玉禄部，同时调遣了部队协助玉禄部，反攻北洋军阀，白灵庙战役，玉禄部获胜，北洋军败退到武川防守。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袁世凯与沙俄签订了《中俄条约》，外蒙承认中国为祖宗国，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根据条约规定：外蒙撤退在中国境内的各路军队。玉禄也同意招抚，经过谈判，绥远将军张绍曾才答应给玉禄部编制三百人，番号是“绥远骑兵游击队”，任命玉禄为游击司令。从此，群众称他玉司令。

一九一四年间，卢占魁为匪作乱进扰武川时，被玉禄的游击队击溃逃窜。于是改编为“绥远骑兵第四路警备队”。一九一五年秋天，玉禄率队将窜入陶林境之卢部股匪追剿向绥西后套逃走，保住了绥包间通商大路，受到广大商贾的好评。

一九一六年，玉禄率部将卢占魁残匪追出伊盟，窜往陕西，凯旋回驻武川。同年蔡成勋接任绥远都统伊始，将玉禄部扩充为两个队，并派往陕西剿匪，进驻榆林波罗堡。陕西的军阀井岳秀鉴于玉禄部和该地的老百姓相处甚好，怕夺了他的地盘，遂电告北京，诡称玉禄部叛变了。又电告绥远的蔡成勋谓：“玉禄部已投靠陕西了”，蔡成勋接电后，甚惊，急调玉禄率部返绥。当玉禄率队急行军赶回归化城以后，蔡成勋方知上当，乃命玉禄部驻防包头，玉禄部开进包头城时，已是阳历五月天了，士兵们仍穿棉、皮衣。包头商会给全体士兵，赶制了一套单衣，还筹借给一个月的军饷。为了保护商路，玉禄部赴武川、白灵庙一带驻防，很快使后山（固阳、武川）的商路，畅通无阻。玉禄还率部帮助驻地农民收割庄稼，获得群众称赞。

一九二〇年，马福祥接任绥远都统，因当地土匪猖獗，调玉禄部的一个队驻防包头，一个队驻防萨县。哥老会的大龙头杨万楨（又名小五羊）纠合苏雨生、周老尧等股匪，伙众六百多人，突然包围了包头城，驻包的甘军坐视不理。玉禄加紧布防，并发动民众和商号青年上城，与匪激战了两天多，命令驻萨县的一个队从刘宝窠子侧击，才把匪众打退，包头城解危。

一九二三年春，省府下令清乡，“凡哥老会人员及大、小土匪，格杀勿论。”任命玉禄为清乡司令，在萨县地区清乡中，先后捕杀了匪首周老尧、张长腿等，受到上级传令嘉奖。并将所率民族健队，改编为“绥远骑兵补充团”，不久，正式命名为“绥远骑兵第一团”（即以后的老一团），委玉禄任上校团长，满泰任中校团副，参佐戎机。玉禄率团东征西剿，勇往直前，各地股匪无不闻风溃窜。

一九三四年间，仍有巨匪刘喇嘛等，盘踞伊盟一带，杀人放火，残酷抢掠，并与卢匪余孽苏雨生合伙，相互为虐，声势汹汹。扰得民不安枕。玉禄奉命率团渡河追剿，匪势不支，窜退至杨三虎圪卜，与匪激战中，因不悉地理，陷入重围，玉禄在掩护队伍突围中，不幸被俘，他犹誓死骂贼，遇难身亡，终年五十二岁。群众获悉噩耗，莫不悼惜。正在接任的李鸣钟都统，尤为内疚，在玉禄牺牲不久，请准上级，晋级少将军衔，从优议卹，并在归化城内，特为建昭烈士祠堂，以祀其生荣死哀。

玉禄自从束发从戎，素以勇敢善战建功，他忠厚而心地伉爽，待人接物，极为和蔼，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临阵每以身先，伙匪遭击必披靡，因而他的威名震重绥西，包、萨民众歌颂载道。

根据民间保留的记忆和有关资料整理。

（责任编辑 万青林）

土默特旗工作回顾

李 丰

我是一九五一年四月廿八日正式调入土左旗的。原来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和土旗的同志们在一起学习，相处几年都较熟悉，但对土旗的情况还不了解。来到土旗以后，才了解到土旗的全名叫土默特旗，原名叫土默特特别旗，是纯蒙族的旗。

后来听人家说，土默特旗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形成蒙汉一地二主，旗县并存，蒙汉分治。

我记得当时土默特旗的纯蒙族约两万九千人。他们分散居住在土默川上的七县二市（即凉城县、清水河县、和林县、托克托县，归绥县、武川县、萨拉齐县、包头市、归绥市）。这些地方的蒙族不属汉族的行政机构管辖，直接受旗政府的领导，但是，蒙汉人民之间还是经常共事的，群众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我记得还有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经过一段废保建政。原来的蒙古族地方机关总管衙门改成旗政府，总管衙门的总管是荣祥先生，改成旗政府后，第一任旗长还是他。总管衙门的下属机构是督导处，督导处随之改成了区。那个时候，土默特旗共有七个区。第一区设在呼市东门外讨号板，副区长是王珍；第二区设在百什户，区长是云飞龙；第三区设在和林的脑莫齐，区长是王瑞富；第四区设在毕克齐，区长是常瑞；第五区设在塔布赛，区长开始是云崇善，后来云崇善去北京学习，由康振邦负责；第六区设在萨拉齐，区长是云福祥；第七区设在召河，区长是沙里。当时有多少行政人员我记不清了。召河那个地方有牧区，也有农

区，牧区全是蒙族，农区有部分汉族。召河原来叫硕并地。召河那个召，是呼市席勒图召的属召，席勒图召的庙产——牛群、马群都在这里。

另外一个特点是，土默特旗也属于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的解放区，土默特特别旗的总管荣祥先生也在“通电起义书”上签过字，虽然总管衙门改成了旗政府，但是，衙门里的办事人员一个没变动，这和其它地方是不一样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解放绥远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口号“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这个口号成了当时工作的方针。土默特旗政府遵照这一方针，自始至终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我记得荣祥先生的职务不仅是旗长，还是绥远和平解放组织军政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当时，绥远军政委员会的主席是傅作义，副主席是高克林。后来，成立了绥远省人民委员会，董其武任主席，杨植霖同志任副主席，荣祥先生是绥远省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这都是根据荣祥先生当时的身份、声望、社会地位安排的。绥远省当时还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奎璧同志是主任，而主要负责民委工作的是苏克卿；负责民族行政工作的是郝秀山和孟纯。绥远省当时有绥东专区和绥中专区。绥东专区也就是集宁专区，管辖的是丰镇、凉城、集宁、兴和、陶林、（即后来的察右中旗），绥中专署最初设在和林，我来土旗那个时候，迁到了萨县。少数民族地区伊盟、乌盟建立了专区一级的自治政府。东四旗和土默特旗直属绥远省领导，“暂维现状”。

土默特旗政府本身按当时党的政策是“以傅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除原土默特特别旗的旧人外，当时李文精同志任旗委书记兼副旗长，我是旗委委员、组织部长，旗委只有我们两个人。除荣祥先生任旗长外，田玉任民政科长，东部区来了一个蒙族同志叫察干的任副科长，云景贤任财政科长，克寿卿任副科长，殷石麟任建设科长，云硕望任副科长，常龄任卫生科长，

锡琨任教育科长，副科长是关其格扎布；云健飞任税务局长，副局长都希；荣祥兼法院院长；任儒任公安局副局长，满纳胜任公安队队长，云存瑞任副队长，指导员是王永肿；卫生院院长是云沛霖。当时还有个幼儿园，那个人事业心很强，叫巴静山。那时，政府办公室没有主任，秘书是李桐、丁林秀、福秀其和王禄。

一九五一年的上半年，党委开始组建。我和李文精同志商量了以后，征求了内蒙民委负责人苏克卿的意见，吸收任儒、都希、田守义三位同志为旗委委员，由我们五个人组成旗委。都希任宣传部长。那时，旗委的办事人员，有云旭升、张爱齐，这两人是宣传干事；乔恒记、王守业这两人是组织干事；省妇联还给调来一个妇联主任，叫罗桂芝，她是由妇女代表会选举的。武装部最初由张德胜负责，后来又调去个张志锐。那个时候，还成立了一个农牧民协会，负责人是王高槐。当时有人问，人家都叫农民协会，你们为什么叫农牧民协会？我们说，因为这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既有农，又有牧，我们为了团结农牧民，共同反封建，所以就叫农牧民协会。共青团负责人是刘德春和赵枫。这半年，我们主要设置了一些党政机构，配备了些工作干部。

一九五一年，正是“抗美援朝”刚刚开始，中国代表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演非常激动人心，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人们觉得这才是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为了打击帝国主义者，全国掀起了捐献运动。当时，土默特旗的少数民族表现得很突出，一片爱国之情。旗长荣祥召集旗内各区的人开了两三次动员大会。在会上，他首先献出一个金元宝和五百块现大洋。在荣祥先生的带动下，全旗各界人士都捐献。我记得满纳胜拿出一百块现大洋，李秀山的母亲也拿出不少。过去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手中没有钱，我只捐献了一套衣服（那时候，李文精同志是小灶费，二十一万，合现在人民币二十一元；我是中灶费，十七万，合现在人民币十七元。上级每年给我们发

两套单衣、一套衬衣，二年一套棉衣）。总而言之，全旗上下的干部群众都不同程度地捐献了钱或物。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土旗人数虽少，但对各项工作都能踊跃参加，不甘落后。

一九五一年冬，绥远省开始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运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省民委苏克卿同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有关条款，结合把什试点经验，起草了两个文件，一个是“绥远省西部区蒙旗土改实施方案”，另外一个“绥远省蒙旗划分阶级成分补充细则”。起草好的这两个文件，先拿到土默特旗充分酝酿讨论了，然后在民委讨论通过。我记得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张济清（回民市的副市长）。参加人都是民委委员，其中有李森、敖其尔呼雅克图、孟纯、任秉钧等同志。我虽然不是民委的委员，也被邀请了去，参加了讨论。文件讨论通过后，以省的名义报到中央政务院，政务院批准后才照办的。

“文革”时，有人说乌兰夫把土旗蒙古人的成分在划分时降了一格。这简直是毫无根据。当时，乌兰夫同志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在张家口，那时，绥远省和内蒙根本不是一个机构，况且，乌兰夫同志虽然回来过，但没有说过上述那种话，怎么能说成是他把蒙古人的成分降了一格呢？当时，我正是土默特旗工作团的主要负责人，是党委书记。我记得工作团走的时候，李文精同志跟我说，任儒当团长，经验没你多，任儒出了问题也是你的。所以，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我后来在“文革”时对蒙古人划分阶级成分作了说明。当时划分地主有三种，有大、中、小之分。我说，如果降一格，这就没有大地主了。有人说我这是给乌兰夫辩护了。我记得毕克齐划了几家大地主，其中有李福田和孟纯的家，乌兰夫的姐夫（十里坡的）也划成了大地主。我说，如果降一格，这些大地主就不存在了。

在镇反的时候，我听李文精同志说，在朱堡还镇压了一个大地主。他还给我们介绍过，你到地里看哇，哪块地里的草长得

多，哪一家的人口就少。确实如此，蒙古人中间，在外面干事的比较多，老汉们在家种地，而这些种地的大多数不行。另外，蒙古人占有的土地比较多，这就出现了租种和伴种这两种情形。在划分阶级成分时，我们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地主、富农不要超过总人数的7—8%）来划分的。我记得当时奎璧和潘纪文（省委的统战部长）同志来检查的工作，我和任儒去作了汇报。两位领导人还十分强调，划分地主、富农，蒙古人不要超过7—8%，汉人也是一样，但是，不能将蒙汉两族混到一起划，如果混到一块儿，蒙古人就超过这个比例了。因此，这个地方的蒙古人划成小土地出租者和小土地经营者的比较多，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超过一般人。

在土地问题上，原来的土旗有一个旧时遗留下来的习惯，叫推地（即卖地）。蒙古人中间经常有推地的，到了期只要些地盘钱。地盘钱一般是过时过节去要，有了拿上，没了拉倒，或者要上些肉呀面的，也算了结。为这个事情，奎璧同志和李森同志还经常给这些人讲，大意是共产党解放了以后，咱们都挺好，蒙古人要想彻底翻身，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靠自己劳动解决问题。

土改时，有少数人主张蒙改蒙、汉改汉，还按蒙汉分治这么办。我们为了完成中华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共同任务，就采取了蒙汉联合土改这种形式。土默特旗搞联合土改的人没有其它县里的人多，总共才一百多人。地区是东至打尔架、台阁牧，西至此老，北至大青山，南至三两、东、西厂克。这一地区以土默特旗工作团为主，还配备了些归绥县的干部。当时绥远省、中央民委的一些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团。察素齐、归绥等地方又是一个工作团，旗委也派了少量的工作人员。象萨拉齐、托县、和林这些比较远的地区，土默特旗还派出一些工作团的同志到那里，参加到以县为主的工作团里，挑选蒙古族聚居的

地方，开展工作。

土改以后，党正推行互助合作，组织互相组，建立合作社。蒙族群众原来的土地就比较多，按党的政策规定，他们每人给土地一份至两份。当时各个地方的执行情况不统一，每人一份土地的有，大多数是一份半，两份的也有。蒙族群众劳动力虽然差，但是他们土地比较多，农具比较全；汉族群众劳动力虽然比较强，但是他们土地和农具比较少。另外，有的群众分到了土地，没有牲畜，有的群众有了牲畜，没有农具。因此，组织互助合作很快就被群众接受了。可是，到具体组织的时候，土默特旗蒙族群众的互助合作就遇到了困难。因为蒙族群众居住太分散，纯蒙族居住的村落不多，大多数村落是汉族多，蒙族少，蒙族群众想要组织一个十户、八户的互助组，还得联系相隔好几里的几个村子的人家，很不方便。这样一来，好些群众就提出了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不分蒙汉组织互助组的要求。按这个要求去一组织，就解决了实际困难，蒙汉双方取长补短，促进了互助合作，增强了团结，发展了生产。到了秋天收割，汉族群众觉得联合起来收得比较快，蒙族群众也觉得是这样。

在蒙汉团结方面，原来有些村的蒙汉关系就比较好，但是有些村比较紧张。经过几次大的运动，通过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蒙汉群众之间的团结更加紧密了。那个时候所谓的民族团结，主要是蒙汉团结。政府这一方面，我们主要是团结那些旧人员（起义的、留用的），象田玉、昌瑞他们这些人。这些人都是非常积极肯干，对那个时候工作起过不小的作用。那时候，我们和一些旗县的联系也比较密切，经常接触一些蒙汉群众。当时有些群众就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要结束“旗县并存”。这实际上是蒙汉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民族团结的具体表现。因为当时不管在生产上、革命上、或者实际建设上，都体现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所以这一要求

的提出是必然的，这一工作做起来也比较顺利。

“旗县并存”并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早在明朝、清朝就已形成，因此，土默特旗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充分酝酿讨论了这个问题。经过代表们的反复讨论，在全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出了结束“旗县并存”的决议。这一决议上报了绥远省和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经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批准，绥远省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布了结束绥中地区“旗县并存”实施方案的命令。这一方案的实施，撤销了原归绥县建制，将归绥县所辖地区，及其邻近的各纯蒙村及蒙民聚居多数的村庄划归土默特旗，并将萨拉齐县境内的沙尔沁、云社堡、章盖台、杭盖等村和托县境内的塔布赛、乃莫板、口肯板等村，以及和林县境内的大路一间房、小西平、班定板、公布板等村划归土默特旗。这些地方的蒙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都属土默特旗人民政府领导。原属土默特旗管辖的第七区（召河）划归乌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第六区的磴口乡划归乌盟石拐矿区。原土默特旗管辖的蒙族人民，现在哪个县市就归哪个县市的人民政府领导。同时，土默特旗人民政府还给这些有关县市派去了部分蒙族干部。云福祥被派到萨县任副县长，云景贤被派到和林县任副县长，云崇善被派到托县任副县长。凉城派去了云生、巴如刚，包头市派去了云惠志，清水河也派了人。新土默特旗是由归绥县和原土默特旗的人员组成的。原归绥县的县委书记郭启民同志担任了土默特旗旗委第一书记，徐史同志担任旗委第二书记兼旗长（原土旗旗长荣祥先生调到呼市任副市长），以后王高槐任副旗长，李子金任旗委副书记，我任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原归绥县的干部都留在了土默特旗。

旗县合并以后，我和徐史、郭启民同志坐在一块闲谈也好，开会也好，经常强调两个机构同志们的团结，防止形成各是各的一伙。我们常说，咱们是一加一等于一，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别

的同志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反正我在任何一次干部会议上,只要一讲话,就总得把这个问题摆一下,强调班子内部的团结。由于领导们的思想和口径都一致了,因此,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出现过你是你,我是我,整个干部队伍是比较团结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强调干部要量才使用,党内党外一视同仁,要顾全大局。象田玉和韩振誉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那个时候还任副旗长。象韩振誉同志文化水平比较高,干工作一直很扎实,在农业生产方面很有建树。后来,郭启民同志调走了,又调来了阎兆麟同志任第一书记。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调出土旗的。一九六五年的秋天,上级派我来土旗搞“四清”让我担任“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到了土旗后,又任我为旗委的代理书记(其实我还没有正式调到这儿,仅带组织关系,其它仍然在凉城)。当时工作团的团长是乌兰察布盟盟委书记阎耀先同志。我这个代理书记主要是管生产这一套,现在毕克齐路上那些树,都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发动群众栽的。“文革”期间,就因为这些还把我揪到了土旗。我记得云旭升同志是乌盟宣传部的科长,“四清”时派到这儿,和我们一起工作,当时他还是旗委代理副书记,在“文革”时也被揪了来。我们被揪回来以后,一直到打“内人党”还在监狱里管着。后来,我又被关到了凉城监狱,因为我在那儿还担任过县委书记。

以上所述,就是我在土旗大致上做了的工作以及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如有不妥之处,请知情者补正。

(赵国恩根据录音编辑整理)

团结就能胜利

——忆我们在土默特旗工作的片断

郭启民 徐史 李子金 任儒

一九四九年，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以董其武为首的原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知名人士，在绥远省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和傅作义将军的恳切教诲下，欣然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绥远方式”，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光荣起义。九月二十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说：“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据此，原中共绥远省委和中共内蒙古分局党委书记乌兰夫共同商定在绥远全省进行土地改革，并根据蒙族占有土地多、劳动力少、生产技术差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蒙汉两族不同的土地改革方案，报请党中央、政务院批准之后，又制定了蒙旗土改实施细则。这个细则明确规定：对牧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对农区的蒙族阶级成分要放宽尺度，分别划为地主、小地主、小土地出租者等；在分配方面，蒙族每人分地一份半到两份。在土改过程中，还号召所有干部要尊重蒙族的风俗习惯，并尽量让蒙族干部做蒙族群众的思想工作。实践证明，这种分别做好思想工作的方法是极其有效的，在当时不仅顺利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蒙汉分治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为今后搞好蒙汉团结和各项生产建设工作开了先例。在此，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奎璧、吉雅泰等老一辈蒙族革命家，他们积极地支持了这项重大改革，促使土改工作顺利地完成。一九五二年冬，又按政策进行了土改复查，对成分定得不适当的给

予纠正。这就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团结，调动了他们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打下了基础，为贯彻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贺电精神具备了有利条件。

在此基础上，结束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进行了剿匪反霸、取缔反动的“一贯道”和禁烟禁毒等工作，并且顺利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和征集义务兵等项新任务。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旗县并存、蒙汉分治”使土默特旗管辖的蒙族群众分布在七县二市（即武川县、归绥县、凉城县、清水河县、和林县、托克托县、萨拉齐县、归绥市、包头市），真是地域辽阔、人口分散。而分布在各县、市的蒙族和汉族人民，世代相处，多数和睦友好，只是“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人为地影响了蒙汉人民的团结互助。

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内蒙古党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为了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为了蒙汉民族在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公布了结束绥中地区旗县并存实施方案的命令，决定改变“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旧制度，保留蒙族主要聚居的土默特旗，撤销归绥县制。并同时决定将土旗分布在呼、包两市和其他旗县的蒙族人民划归当地政府管辖。

归绥县并入土默特旗后，组成新的中共旗委会。郭启民任第一书记，徐史（蒙族）任书记；李子金任书记，李丰任副书记；组织部长张忠良，宣传部长都希（蒙族），生产部长王高槐，武委会主任李子金兼，办公室主任云旭升（蒙族）。旗人民政府旗长徐史（兼），副旗长任儒（蒙族）；公安局长郭希贤，法院院长云耀兴（蒙族），粮食局长李占银，旗政府办公室主任田玉（蒙族）。中共各区委、政府各职能科、区政府，都是由原旗县二十多岁的蒙汉干部组建成的，他们有朝气、有干劲，生龙活虎地干工作。

这两个工作班子，虽是由原来的旗、县两个单位合并而成，

但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开诚布公地谈问题，讨论工作。个别同志有些意见，也能按照内蒙党委的指示分头做工作。原县委的领导干部多做原县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原旗委的领导干部多做旗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实践证明，新的中共旗委会、旗人民政府是团结合作的集体，是有战斗力的集体。

当时，旗委、旗政府工作比较繁重，除了统购统销粮食、征集义务兵及禁毒禁烟、取缔反动的一贯道外，还要复查已进行过的土地改革，发动蒙汉人民开展农牧业生产、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动员农业技术工人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等等。虽然摆在面前的任务这样多，但是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还是顺利地完成了。

象统购统销粮食是全国胜利后的一项新政策，也是一项硬任务。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的粮食贩子，保证对城镇居民所需粮食的合理供应，根除旧社会“谷贱伤农，丰年饥馑”的弊端，国家对农民生产的粮食，除征收农业税外，对余粮实行统一收购，对城镇居民实行统一销售的新政策。当时，多数群众能够理解，也有少数人不理解。特别是农民自由自在惯了，他们认为“我种地打下的粮食，愿意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自己保存着多好”。市民中也有人认为统一定量供应不如自由选购随心所欲，等等。这些思想认识问题，通过全旗蒙汉干部深入群众、宣传政策以及党员们的模范带头，也逐步解决了。到年底，全旗顺利地超额完成了乌盟分给的四千四百万斤购粮任务，为这项工作开了个好头。

所以能胜利地超额完成统购粮食的任务，是凭着蒙汉人民团结互助生产的积极性。如保尔舍少村共产党员高色楞（蒙族）、太平庄的蔡大明，为了夺取粮食丰收，和蒙汉群众一起战天斗地，以蒙汉劳动人民的汗水夺得高产。达赖庄子、毕克齐等地的甜菜亩产达到七、八千斤以上，使党的民族团结变成了物质力

抗。

一九五四年，政务院公布将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全国征兵四十五万。当时，有些群众没有注意到这四十五万是全国的征兵数字，害怕适龄青年都得应征，有些青年竟然往山沟里躲藏。旗委、旗政府发现这些情况，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研究解决群众思想顾虑的办法。会后，除进行宣传教育外，还由旗长徐史的名义，布告每乡只征兵一至三人，布告张贴到各乡村周知后，解决了群众的误解和顾虑，自愿报名参军的适龄青年大大地超过了征兵人数。当时我们考虑蒙族人口较少，少征蒙族青年，但是蒙族青年积极要求参军，甚至劝阻也无效。记得台阁牧的蒙族牧羊倌，因他是扁平足，不让他参军有理，但他坚决要求参军，办理征兵的同志和军队接收新兵的单位只好收下这个英俊的小伙子。

新征的一百八十名兵，穿上新军衣之后，兵役局让他们回家看看父母家人再正式入伍接受训练。当时也有个别同志担心新兵不能按规定时间返回兵役局报到，而旗委、旗政府相信具有革命传统和革命先驱影响的土默特旗蒙汉人民是有觉悟的，是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不出所料，新兵都高高兴兴地按时返回报到了。

还有一项任务是动员会种蔬菜的农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援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一九五四年，我们动员了三十多名蒙汉农业工人，是由旗委宣传部副部长阿明布和（蒙族）带队前去的。

土默特旗的蒙汉干部，党和政府需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尽力去干，他们热爱土旗的山山水水，热爱自治区，热爱祖国。蒙汉党员干部团结互助合作，是团结蒙汉党员和群众的核心力量，是发动群众完成各项政治任务、生产建设事业的动力，土默特旗在内蒙古党委、政府和乌盟盟委、政府的领导下，实事求是地培养使用蒙汉干部、进行党的组织建设，依靠蒙汉群众、开展各项生产建

设，文教卫生事业，亦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做出了应做的贡献，呼和浩特又为土默特旗的各项事业给予了积极的支援。

总之，不管干什么工作，蒙汉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就能取得胜利。

结束旗县并存前后

的片断回忆

韩 振 誉

三个政府各自为政

解放前，在现呼和浩特市内，除原绥远省省级机关外，还存在原归绥市、原归绥县和土默特特别旗三个政府。这三个政府，互不隶属，各自为政。归绥市管理市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事务；归绥县管理市区外县辖区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事务；土默特特别旗管理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凉城等七县和归绥、包头二市境内的蒙古族事务。形成一种市县并存，城乡分治和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特殊局面。这种局面是历史形成并延续下来的。这种局面的存在，对市、县、旗的行政管理方面都有很大的不便，而最不便的是旗，面积大，人口少，分布广，又大都与汉族杂居，真是一去数百里，到村四五家。市县视辖区内的蒙古族如同侨民，旗对境内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亦作如是观，实在是别扭。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举行起义，一九五〇年二月新旧政府合并，仍然暂时维持了这种现状。只是在各个政府前边加了“人民”二字，成为各个人民政府，虽然仅有二字之加，但有本质上的区别。

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

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府，以至于后来的所谓革命民主政府，不论是旗总管衙门还是省市县政府，对于人民无非是两种索要：一是要钱粮（田赋杂税），二是要人（差徭兵役）。根本没有什么给予，如果有的话，那只有给人民以痛苦。临近解放前夕，在土默川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兵匪遍地，盗贼如毛，灾害频仍，赋税苛重，不少蒙汉农民背井离乡，家破人亡。象我的故乡——独立坝村，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连年遭受水旱灾害，土地半数荒芜，农民啼饥号寒，而官家还一股劲地抓兵要粮，加紧压榨，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可喜来了救星共产党，全国解放了，绥远解放了，我的家乡也解放了。

解放后，新的人民政府一成立，首先是集中全力领导人民恢复发展生产。那时基本上没有工业，所以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农业生产上。政府工作一年四季均以生产为中心，其他部门工作都围绕中心工作去进行。春季以春耕生产为中心，夏季以夏锄保苗为中心，冬季以备耕生产为中心。每季工作开始前，要召开一次扩大干部会议，会上由书记、旗长亲自动员和布置工作。会后旗领导和环节干部带队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区深入到自然村进行工作。当时旗里根本没有汽车，通讯用的自行车也仅有两、三辆。干部下去（包括领导），大都背背包步行。少数有自行车的同志骑自己的自行车下去，那就是很了不起的阔绰了。

当时，非常强调阶级路线，干部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下乡工作要依靠贫雇农，土改以后是依靠贫下中农，走群众路线，要求与群众“四同”。所谓四同，就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吃饭是在贫下中农家里轮流吃派饭。以此体现同吃，但不能吃地主、富农的饭，否则就犯了路线错误。为了体现

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做到知识分子工农化，贫农的饭不论如何不好，如何脏，都不能不吃。住，便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千万不能住地富家，不然便是路线错误。当然住在谁家要帮助谁家做些零碎营生，如烧火、担水、清扫等。干部下去参加劳动，叫做以生产领导生产。在参加劳动中，学得生产技术和经验领导起生产来不说或少说外行话，避免瞎指挥。还有在劳动中可以与群众建立阶级感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小问题会同村干部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再向旗汇报。至于同商量，就是多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和乡、村干部的意见，弄清问题的真象，防止主观武断把事情搞错。

当时农田基本建设基础很差，首先是帮助农民发展水利和防治水患。仍举我的故乡独立坝村为例，因为常遭水灾，政府积极领导农民打坝防洪、引洪灌地。经过几年治理，基本控制了一般水患并淤出大量土地。原村北至小独立坝村西，全是盐碱滩，后来成了新淤土好地。所以在五十年代最好年成，一年给国家上交粮食一百几十万斤。至于发展水利也仅搞一些小型的修渠打井工程。比较先进的提水工具要推解放式水车了，该水车既拉轻又出水多，较之从前的水车是一大进步。其次是推广新式农具，如七、八寸步犁比老式犁又拉轻又耕得深，亦颇受农民欢迎。第三是推广药剂拌种。解放前莜麦黑穗病危害很大，有时一块莜麦百分之七、八十成了霉霉。过去唯一办法是用白酒拌种，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解放后用硫磺粉拌种，黑穗病得到控制。小麦黑穗病以前根本没有办法，只是听天由命。解放后推广了用“赛力散”拌种，起到很好的效果。与此同时还推广了手摇拌种器，比用锅拌既均匀又提高工作效率。第四，提倡和推广小麦、莜麦密植疏播的种植法，收到了较好的增产效果。第五，提倡选育优良品种。玉兰小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由农民戚玉兰精心选育出来的，一时传为佳话。第六，药剂防虫也开创了历史先例，受到农民的称赞

和欢迎。此外，对于困难农户，政府发放救济粮款，生产中缺乏资金，给以贷款扶植。通过一系列支农措施和引导农民进行科学种田，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这是从一解放就做起的。一九五〇年实行新的农业税政策，农民除一年交一次农业税外，再没有任何负担。旧社会不论土地好坏，产量高低，均按亩均摊赋税，地、富好地多，贫农坏地多，再加上地、富掌权，沉重的负担压在了贫农身上。新的农业税政策负担很合理，首先要经过查田定产。根据土地好坏和产量高低评定常年应产量，根据常年应产量，按累进税依率计征。这样产量多的，税率高，税额也多；反之，产量越少，税率越低，税额也越少。与旧社会却成反比，贫农减轻了负担，地、富增加了负担，在合作化前起到限制富农经济的作用。如果农田受灾减产，经过评灾，实行依法减免，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这种税法既合理又体现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深受广大农民拥护。

政治上经过了废保建政、剿匪肃特、减租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社会空前安定。完全是一派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景象。不怕贼偷土匪刁，夜夜能睡安然觉。不论城乡人民都安居乐业，舒眉展眼。因此各族人民在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对人民给得多，取得少，而且是先给后取，这样的政府历史上从来没有，所以，人民对党和政府十分爱戴，十分信赖，党和政府叫干啥就干啥。他们总结出—条经验，就是跟共产党走没有错。因此，当号召参军时，人民将自己优秀的子弟争先恐后地贡献出来，参加解放军，并以此引为光荣和自豪。秋征粮食时，农民把粮食晒干扬净，把颗粒饱满的好粮交给国家，留下次粮自己吃用，否则，他们问心有愧，对不起党和国家。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农民也积极响应，纷纷参加。互助组和初级社一般体现了自愿互利原则，办得较好。只是在高级社时，脱离了现实，超过了

人们的接受程度。人民公社化一阵大风席卷了全旗，一刀切掉了个体所有制，“一大二公”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结束旗县并存势在必行

土改以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件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在世界上也震动很大。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仍有不少困难，因之，互助合作运动在政府的倡导下随着兴起。广大蒙汉贫下中农在互助合作中，深深体验到蒙汉继续分治下去诸多不便。旗县政府在领导生产中亦感到继续分治下去问题越来越多。同时新政建立，百废待举，百弊应改，难道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弊政，能让它继续下去吗？不能。总而言之，群众要求改，政府主张改，在这种情况下，结束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不改，更待何时。

经原绥远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撤销原归绥县建制，将县辖区域划归土默特旗，另外把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三县边境地区蒙族较多的部分村庄亦划归土默特旗，成为新的土默特旗的全部管辖区。在旗新辖区内不论蒙汉及其他民族均由旗统一领导。原来分散在六县二市的蒙古族，均各归当地政府统一领导。这对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发展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土默特旗摘掉了特别旗的帽子，划归集宁专区领导，旗所在地仍暂留驻现在呼和浩特市内。直至一九五八年撤销了原萨拉齐县建制，把县属地区划归旗领导后，旗所在地才暂迁于萨拉齐城关镇。这时才算彻底结束了两个分治局面。一九六〇年旗所在地又迁到察素齐镇才固定下来。

团结奋斗一心为公

旗县合并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除依法批准外，还通过旗县双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做出决定，履行了这种民主方式和程序。合并的办法是对口合并，如旗县党委合在一起，县政府合在一起，党政各职能部门都是各对口合二而一。先搞了约三个月时间的合署办公，彼此熟悉情况，然后才正式合并。

旗领导与上级领导，对原归绥县的干部安排很慎重，尽量做到合理安排，务使各得其所。除少数干部调走外，大部分都留在旗里。有的比照原有职务安排，有的进行了提拔。我没有查阅档案，仅就个人记忆所及略述如下：原县委书记郭启民任旗委书记，原县长李济民调走，原副县长王治斌任副旗长。由原县干部任旗环节干部的有财政科长韩振誉，文教科科长李芝如，察素齐副镇长杨鸿文，第二区区长张宗华，第四区副区长韩继甫，第五区区长荆宣三，第六区副区长马秉钧，第七区副区长王冠洋等人。新的旗党政领导班子组成后，首先是领导人团结得很好，为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他们严格遵照党的民族政策办事，要求蒙汉各级干部紧密团结，为建设新土旗而努力奋斗。蒙族是主体民族，蒙族干部发扬主体民族的风格，关心、爱护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也尊重和照顾蒙族干部。各民族干部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开诚布公、亲密无间，十分融洽。彼此间考虑的是革命建设问题，一心为公，根本不考虑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恩怨和利害关系。当时的旗长徐史、副旗长任儒，对我十分关怀，使我受教不浅，我永远铭记不忘。其他的少数民族干部与我相处得都很好，没有一个人和我闹过意见。我和妥玉川都在财政科工作，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每次下乡搞中心工作，我都抢在前面，从来没有让他下去过。因为我考虑他是回

族，下去在生活上有很多不便，尤其对于农村工作我比他熟悉。田玉、云鹏在十年浩劫中不幸致死，我甚为伤痛，还为他们做过吊亡诗。干部如此，人民之间也是如此。各族农民在生产斗争中，在互助合作中、在原来团结的基础上更加深了友谊，能够互相帮助、取长补短。

那时的干部都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绝大部分能以革命利益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不少人能做到公而忘私或因公废私。我国是低工资制国家，那时工资更低，干部收入比较少，但大家都不计报酬，不置家业，不求华衣美食，不讲个人修饰，女同志的穿着也很朴素，更不擦油抹粉。工作上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绝不拖拉；指到哪干到哪，绝不挑选，叫怎么干就怎么干，绝不走样，不论白天黑夜，风里雨里，绝不叫苦退缩。评奖、评工资、评补助时，都互相推让，对困难工作都争着去做。当时的机关制度也比较严，环节干部以上一般都住机关，到星期六晚上才回去和家人团聚。每天早上最少学习一小时，不占办公时间，外住的同志提前到达，晚上也经常学习或研究工作，一到冬天都两头不见太阳，黑来黑去。回想起来我在一九六八年以前，基本上很少过过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很少在夜里不加班。一年四季总不清闲，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在水利工地上更是如此。搞中心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一段工作大体是三个月时间，我下乡就一次带足三个月的粮票和钱，中间没有特殊情况不回家。老伴嫌我不顾家，有意见，我说我是国家的人，你们不要指望我。当时我就是这样的一意孤行，现在我感到内疚，感到愧对家庭。至于搞突击任务，随时布置，随时行动。一九五四年深秋的一天傍晚，徐史旗长召开紧急干部会，他说明天凌晨有霜冻，大家于晚饭后下去，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发动和带领群众做好薰烟防霜工作。晚饭后，领导带头立即下去，没有一个人落后。我记得我是去城东如意和村的，组织群众整整搬运了一夜柴草，凌晨点火，

四处冒烟。直到红日东升，才带着胜利的喜悦步回家中。突击防虫也是如此，记得也是一九五四年，蚜虫为害相当严重，把小麦、莜麦的叶子基本咬光了，虫子都在四令以上，有的五、六令，用六六六粉杀灭，根本无济于事。于是发动干部下去，顶着骄阳，汗流浹背带领群众搞人海战术，进行人工捕杀。当时的领导和干部所以能做到这些，除制度纪律的约束外，更可贵的是自觉精神。现在回想起来，我总觉得那时的干部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这是什么精神？在当时叫做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是，以现在一些人的眼光看来，这完全是傻劲。我总以为这种傻劲还是多一点好，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遵纪守法勤俭节约

那时干部纪律很严格，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完全适用于干部。特别是下乡工作的干部，与群众生活、工作在一起，更应注意。必须遵守群众纪律，尊重群众风俗习惯，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更要严格遵守，如有违犯，严肃处理。因为干部是代表党和政府下去的，在群众心目中干部是高尚的，如果犯了错误，就给党和政府造成不良影响。干部也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格外小心。工作方面，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强迫命令，必须讲究工作方法。要坚持说服教育，在做通群众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去完成任务。更不能打骂群众，就是对违法的群众也不准捆绑。一九五七年春，李丰书记、云旭升和我去后合理村搞中心工作。由于抓赌，云旭升同志在气极之下将一个赌徒捆了一绳，就犯了错误，回旗后三番五次进行检讨，接受批评。

干部和群众在一起，不能搞特殊化，要与群众吃一样的饭（派饭），不准喝酒，不吃请饭。自己有钱也不能单独起伏，连搞一次打平伙式的改善生活的饭也不能吃。深怕脱离群众，影响党

群关系。吃派饭，必须按规定标准付钱和粮票，逢时过节，碰上好饭，就另加钱。上至领导、下至一般干部，都自觉执行，习以为常，群众也不拒收。有时在农村干部家吃饭，由于惯熟、不愿接收，干部临走时也要偷偷把钱和粮票放在某一个地方，这样才心安理得，否则就违反了纪律。住宿也是如此，在冬季烤火期间，不管房主人生不生火炉子，干部都要按规定标准按日交付烤火费。一九五五年秋天，在合作化高潮中，部分群众思想上有顾虑，怕羊入社充公，偷偷地杀羊卖肉，价钱很低，每斤仅二角多钱。但下乡的干部只能进行思想教育，劝阻宰杀。这种便宜肉，一口也不能吃，一斤一两也不能买，更不能带回家里。是不是我们的干部都是素食者，不香肉？不是，完全不是，而是坚决执行政策和维护纪律。还有一件事，在开始发放布票前，领导给干部讲了话，申明了纪律，干部一律不得突击买布，大家都严格执行了，事后检查基本没有发生问题。

在三反后，各级机关单位都取消了机关生产和小金库，财政制度相当严格，十分注意勤俭节约。各机关单位和个人都制定增产节约计划，人人节约成风。我记得办公室的火炉内烧下料炭，都要拣出重烧一遍。打扫卫生，粉刷墙壁，干部也都自己动手，我也带头都干过。大家都能廉洁奉公，公私界限分得也很清楚，个人写信连公家的信纸信封都自觉不用，我同样执行过几年。这些让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认为是迂腐，但回想当年，做为历史陈迹，都千真万确，绝非乌有。

那时党政机关，也有送往迎来，但不做招待。一般客人仅白开水一杯。贵宾和上级领导前来，也只是清茶一杯，不放纸烟。一般不吃饭，如果吃饭，吃什么饭花什么钱。记得一九五七年夏天孙兰峰副主席来旗检查工作，也是清茶一杯。孙副主席听完汇报，做了指示，即行返回。还有一件事，一九五四年旗县合并之初，徐史旗长意欲与原旗县部分领导同志（包括环节干部）进行

一次简单的聚餐。那时的酒席一般四菜一汤就算不错了，大致需要花一百多元钱。从现在的眼光看简直是小事一件，但当时他对此大为作难，他不愿自做主张去开支。我那时任财政科长，徐旗长很客气地和我商量，毫无半点命令口气。我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及领导的用意和苦心，于是破例同意。

以上这些片断回忆，因为事隔三、四十年，记忆不清，可能在时间、地点、人员以及情节方面，有出入或不准确之处，请知情者不吝赐教，给予纠正。

（责任编辑 云文瀚）

光辉的里程

——前进中的土左旗

土默特左旗三十一万各族儿女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

土默特左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解放以来，全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团结、建设的旗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胜利的里程，为建设美丽富饶的家园作出了巨大贡献。土左旗，正迈着时代的步伐，奔向光辉的前程。

(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我旗随着自治区地区的解放而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使我旗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地位，开始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从那时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旗开展了土地改革等民主改革运动，巩固了革命成果，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一九五四年，顺利解决了旧社会形成的“旗县并存”问题，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实行的“蒙汉分治”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我旗正式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从此，我旗在自治区领导下，按照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把个体农牧业经济

引上了合作化道路，把私营工商业也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我旗农、工、牧业生产和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对国家建设的支援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所酿成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致使我旗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严重受挫，各项事业遭到破坏。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旗和全区、全国一样，革命和建设事业才重新走上正确轨道。

农业方面，我旗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保证了农业生产持续、稳步地向前发展。一九八六年，我旗农业总产值完成七千九百九十七万七千元（按一九八〇年不变价格计算），是一九四九年的七点一七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点八，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达到一亿七千九百三十九万斤，是一九四九年的三点六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二，甜菜总产一十六万四千四百吨，是一九七八年的三点八倍，油料总产量达到一千七百八十五万斤，是一九四九年的六点四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五百八十一。

我旗在抓紧农业生产过程中，努力发展林、牧业生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政策激发了各族人民种草种树、养畜致富的积极性，群众退耕还牧，加强草牧场建设，大搞植树造林，促进了我旗林牧业的发展。到一九八六年底，全旗累计围栏保存面积八万多亩，大小畜存栏共二十一万九千头（只），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三点六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一十八，其中奶牛存栏达一千二百二十三头。牧业产值达一千五百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六点六。一九八六年，全旗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十五点七七，其中当年植树四万三千亩，是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二十四倍，比一九七八年多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四旁绿化成绩显著，不少乡实现了农田林网化。

建国以来，我旗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从小到大，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解放初，全旗仅有一些简陋不堪的小型手工业企业，年产值只有四十多万元，仅占全旗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点三；交通运输更是落后，全旗只有一条六十五公里长的国有公路，机动车辆几乎没有。三十多年来，我旗工业发展较快，逐步形成了化工、建材、采矿、轻纺、皮革、食品加工等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到一九八六年，全旗各类工业企业达二千八百四十五个，其中国营、集体和乡办企业有八十一个，固定资产达四千二百四十多万元，较大的国营企业有年产十三万吨水泥的水泥厂和年产十二万吨碳酸氢氨的化肥厂。随着体制改革，企业逐步挖潜革新，厂长（经理）负责制得到进一步改善，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稳步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增加。其中曲酒、紫砂地面砖等产品分别通过呼市、自治区级鉴定，投入批量生产；紫砂地面砖、石墨分别填补了自治区的空白；骏马牌碳酸氢氨化肥连续六年保持了自治区优质产品的称号，并经过国务院化工部鉴定，评为部优产品，化肥厂被评为“全国小氮肥红旗单位”；剪绒皮经外贸出口，换回了外汇，是我旗拳头产品之一。一九八六年，全旗工业总产值完成七千零一十万元，（包括村办、联办、个体工业）。创历史最好水平，是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六十三倍，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交通运输蓬勃发展，公路四通八达，客货运输日益发达。截止一九八六年底，全旗境内共有乡镇级以上公路六百多公里，拥有各种机动运输车辆七百二十多辆，其中大型客车二十辆，各种货车五百八十三辆，小型汽车一百一十七辆，全年完成货运量五十二万三千六百吨，完成货运周转量一千一百多万吨公里，完成客运量二十八万多人次，客运周转量达一千一百四十二万人公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政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广大群众因

地制宜地开办多种形式、多种产品的乡镇企业，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走出田地，加入了办企业的行列。到目前为止，乡镇企业已成为工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旗乡镇企业以农副产品加工、建材、建筑、采矿、机械加工、机械维修、粗纺、饮食业为主，总数已达到四千六百多个，从业人员约二万一千人，占全旗整半劳力的百分之二十。一九八六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到五千多万元，乡镇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我旗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经济村，为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建设城郊型经济提供了经验。

解放初期，我旗商业非常落后，一九四九年我旗社会商品零售额仅仅五十七点九万元。一九七八年以后，我旗逐步对流通体制进行了改革，主要是通过建立不同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增强了企业的活力；除国营商业渠道外，恢复了农贸市场、集市贸易，大力发展集体和个体工商业。现在，供销社、分销店或代购代销店遍布全旗城乡，个体工商业发展到三千六百一十户，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系，极大地活跃了城乡市场，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八六年全旗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八千三百九十三万七千元，是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五倍，是一九七八年的十八倍。

一九八六年，我旗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一亿五千零八万元（按一九八〇年不变价格计算），是一九四九年的十二点七倍，比一九七八年翻了一番。农民人均生产粮食六百三十斤，人均纯收入由一九七八年的七十六元八角七分增长到一九八六年的二百六十五元，职工年人均工资收入达到九百六十七元，比一九八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二，城乡居民储蓄额达三千二百六十八万元，是一九七八年的六点四倍。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一九四九年，我旗仅有小学一百零三所，中学一所，在校

学生六千四百八十三名，教职工一百五十九名。现在，全旗共有学校三百一十五所，是解放初的三倍，其中小学二百六十一所，普通中学四十八所，职业中学五所，教师进修学校一所；在校学生五万六千二百七十九人，是一九四九年的八点七倍；教职工总数四千三百三十人，是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七倍。其中民族教育得到很大发展，现有民族中学二所，民族小学十三所，在校少数民族学生五千九百三十七人。解放以来，我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六年，我旗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共三千一百二十七人，其中大专院校一千零三十二人，中等专业学校二千〇九十五人，平均每年为四百四十七人。近年来，我旗还十分重视发展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现有幼儿园四所，其中民族幼儿园二所。在园幼儿总数为二百四十四人；成人教育中积极开展职工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族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我旗文化建设不断发展，建立了专业歌舞剧团、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新华书店等文化机构和设施。近年来广大农村建立了乡村文化站，初步形成了旗乡两级文化网，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反映我旗风土人情和历史发展的《土默特志》下卷已经出版，上卷初稿也已经完成。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初，我旗广大城乡缺医少药，仅有一个卫生院，全旗医务人员九十二人。现在，我旗共有医院、卫生院二十一所，专业医务人员四百八十人，病床位共二百七十六个，兴建了具有五十五个病床位的旗综合医院，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三十多年来，我旗科技工作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良种选育、农药、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工业的技术革新、技术引进和新产品试制等工作，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益。尤其是经过科技体制的改革，我旗科技部门加强了科技信息传递、科技咨询服务和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加强

了科技横向联系，使先进的科技成果在工农业生产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科技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到目前为止，全旗有各级各类技术人员一千零八十六人，其中工程师五十七人，助理工程师一百人。建成了多功能的科技馆和科技情报中心，并设有一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十九个乡镇都组建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厂矿企业中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管理组织。科技，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着我旗经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我旗城镇建设发展迅速，人民武装建设不断加强，邮电事业成绩显著，广播事业从无到有，新闻工作日趋活跃，逐步设立了旗调频广播电台，在山老区和偏远地区，建起电视差转台十三个，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八。

总之，解放以来，我旗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百业兴旺，蓬勃发展的土左旗。

(二)

几十年来，我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经历了无数成功与失败、顺利和挫折的历史，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反复证明：

一、维护和加强各民族大团结，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和保证

我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民族聚居旗，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十分重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才能不断维护和增强民族团结；只有民族大团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前进。

五十年代，由于我们重视和开展了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各族干部群众，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正确处理了民族关系，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民族团结不断加强，蒙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同心同德，形成了民族关系史上的“黄金时代”，促进了我旗各项工作迅速发展。十年内乱，党的民族政策曾一度遭到践踏，民族关系受到严重损害，致使我旗生产停滞，事业受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旗认真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为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清理了民族工作中“左”的错误，重新确立并坚持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正确思想，拨乱反正，平反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冤、假、错案、医治了十年内乱在民族关系上造成的严重创伤，广泛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活动，大力培养和选拔蒙古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使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巩固和发展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出现了民族关系史上又一个最好时期。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四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推动着我旗各项事业胜利向前。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改革，是我旗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

从民主改革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符合我旗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一系列政策，蒙汉联合完成了土地改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我旗工、农、牧业的发展，迎来了五十年代繁荣昌盛时期和民族团结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产生了无视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脱离实际的“左”的政策，到了“文革”时

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轰大嗡的“放卫星”，不切实际的“穷过渡”，以至把发展多种经营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给我旗政治、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旗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同我旗实际结合起来。在自治区“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导下，我们根据全旗的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条件，确定了“以农为主，林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突出了农业在全旗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同时，避免“一刀切”的错误做法，对全旗不同地理条件和经济特点的地区实行分类指导，做到了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对经济结构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和布局，自觉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在企业的改革中，围绕增强活力这个中心环节，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冲破了阻碍生产发展的旧的管理模式，新的管理体制日臻合理，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改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给我旗经济带来勃勃生机。“六五”期间，我旗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二点八，是我旗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之一。

三、只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才能保证我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就应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最根本最主要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然而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是在一个时期

内一个接一个地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才使我旗经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几年来，我旗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一切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在努力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我旗各级党政部门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满腔热情地宣传改革，积极做好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全旗城乡配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理想纪律教育、形势政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法制教育、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干部正规化理论教育；开展了“民族团结表彰月”活动，全面进行了整党工作，广泛开展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村活动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了社会综合治理。通过上述活动，使党风和社会风气日趋好转，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我旗的改革和建设。

(三)

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土左旗不仅有繁荣发展的历史，更有光明灿烂的未来。我旗社会经济“七五”规划描绘了我旗“七五”时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高举团结建设的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我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到一九九〇年，力争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三亿元，即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各项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发展。全旗各族人民行动起来，为实现“七五”计划，早日建成团结、文明、富裕的土左旗，振奋精神，团结奋斗，满怀信心地夺取新的胜利。

一、进一步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加强各族、各界和各方面的大团结

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我们要深入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进一步宣传、学习民族区域自治法，继续开展民族团结表彰活动。同时，要采取一切措施，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和少数民族干部、职工群众的文化、业务素质，防止和反对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现象，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各族干部、群众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安定团结为准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团结，象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团结。我旗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要做团结的模范。各民族之间、党群之间、新老干部之间、军政军民之间，都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努力把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团结，特别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搞得更好上加好。

二、认真贯彻“以农为主，牧工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加快城郊型经济建设步伐

在自治区“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下，从我旗的客观实际出发，我们制定了“以农为主，牧工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七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我旗经济建设中，要稳定农业这个基础，以发展畜牧业和乡镇企业为突破口，抓好科技、流通、加工增值三个环节。这是符合我旗自然规律的，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是切

实可行的。我旗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仍然是我旗国民经济的基础。根据中央“继续坚持改革，争取粮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面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总要求，我旗农业必须有一个更大发展。要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我旗关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坚持不放松粮食生产，以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物质生产条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不断提高种植业的产值和经济效益。

畜牧业和乡镇企业是我旗农村治穷致富，由“温饱型”向“富裕型”过渡的两个突破口。我旗农村发展畜牧业的潜力很大，载畜量可达六十七万个羊单位，客观上占有一定的经济优势。各族人民要因地制宜，有效地利用我旗有利条件，实行舍养与牧养相结合的办法，大力种草种树，发展人工草场，有计划地还林还牧，走建设养畜的路子。发展畜牧业，要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变头数畜牧业为效益畜牧业，提高畜产品加工能力和牲畜出栏率、商品率，以增加林草业、畜牧业在我旗农村经济中的比重。

我旗地处呼包二市之间，广阔的山川又给我们提供了多种自然资源，构成了便于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服务城市和资源丰富两大优势，有利于发展乡镇企业。我们要继续坚持“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利用资源优势，实行开放、引进政策，加强横向联系，采取乡办、村办、户办、联办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以工补农、以工促农、以工促牧，使乡镇企业到一九九〇年总产值达到一亿元，成为我旗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

在经济建设中，我们要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倡厉行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反对铺张浪费和盲目蛮干，争取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我旗城郊型经济建设。

三、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推向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功在改革。要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夺取新的胜利，必须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推向前进。对于我旗来说，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切实搞好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扩大农副产品市场，逐步减少定购，完善合同，扩大自由购销，改善流通条件，促进农村商品生产，提高生产效益；继续进行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镇经济体制改革。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以及近年来上级有关指示精神，我旗各企业要继续完善厂长（经理）责任制等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在加强技术改造，挖掘潜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增加经济效益，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要发展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实行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科技领域的联合，大力引进技术、人才、资金，增强企业发展能力，加速企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进程。

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两个文明”一起抓，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旗各行业、各部门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进行理想纪律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党性和职业道德教育，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努力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增强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

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发扬奋发图强、致力四化建设的献身精神；搞好文化建设，丰富城乡人民文化生活；移风易俗，搞好计划生育工作，使全旗各族人民形成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综合治理工作，实现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抓好教育事业，特别是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我旗经济建设服务。

土默特左旗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呼市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和绚丽多彩的美好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在迎接和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全旗各族人民要牢记党的号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团结、建设的旗帜，艰苦奋斗，锐意改革，开拓前进，再展宏图，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土左旗，为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旗委宣传部供稿）

一九四六年绥远蒙古自治请愿

团赴南京请愿亲历记

殷 石 麟

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酝酿

内蒙古自治运动，在蒙古族上层人物中的设想、规划由来已久，但一直到解放前夕都未实现。其中原因很多，当然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阻挠是最重要的因素。

抗战胜利后，德王闲居北平，一向幻想的蒙古高度自治和蒙疆政府一道化为泡影。西蒙地区的蒙族官僚，多以抗日居功，整饬军队，接收地方，扩充实力，扩大影响，因而还无遐谈及自治之事。一九四九年秋，傅作义改编土默特旗保安队为新编蒙古骑兵第一旅，由荣祥先生任旅长。不久部队便奉命开往公喇嘛一带抵御解放军，无疑想借此使蒙古部队和解放军两败俱伤。荣祥先生看出其中玄妙所在，故派人将我从前线秘密调回，在我返绥的第二天，解放军便包围了归绥城。于是我便成了无业游民，整日在一些蒙族同僚中闲游。

在战争年代，国民党当局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总是采取软硬并施的两种手法，即安抚拉拢和威慑制约的手段。在抗日时期如此，在解放战争时期亦是这样。在围城的日子，连荣祥先生的行动亦受到限制，明口保护，实则怕投到解放军方面，出城是绝无可能，甚至在城内也不可随意往来。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忧

忿地对我讲：“石麟，我不如你，我现在是犯人。”虽是言重了些，但在那段时间里，他确是被监视起来了。

在平时，各盟、旗军政要员都四处奔忙，有务公的，也有营私的。解放军一围城，大家便不用四处奔波，自然是群聚闲聊。于是，满春生家便成了王公贵族、达官名士的俱乐部。大家在一起打牌，议论政局，但久而久之，便觉得无聊。常言道，“闲人出故事”，确也不假，于是大家常在一块议及内蒙古自治的问题，很快，这一旧题材的新故事便又变成西蒙地区蒙古上层人物的口头禅。于是，在城防军务最繁忙的紧张时刻，一套内蒙古高度自治的计划草案在西蒙王公贵族的酝酿下措成了。当时的讨论非常热烈，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当然主要是自治限度、组织结构方面，而在是否自治问题上几乎是一致通过，并无他议。

后来，解放军自行撤兵，归绥城围顿解。国民党军又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反攻，这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的事了。四月上旬，荣祥先生将内蒙古自治问题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并同大家讨论后写成书面意见上呈傅作义，傅作义态度很不明朗，只是一味往中央推，其实这种情形是大家事先便料到的。于是大家反复商量，决定直接去国民党中央请愿，经征得傅作义同意后，大家便积极筹备这一行动的有关事宜。

二、请愿团的组成与请愿经过

请愿团由荣祥先生领衔任团长，巴维松任副团长，团员有纪贞甫、雄纳、经萃成、康济民、胡凤山、旺庆苏荣、贾文华、卜文瑞、任秉钧和我，共计十二人。巴维松（文峻）当时是以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的身份随行，纪贞甫、胡凤山是绥东四旗的代表，雄纳是乌盟西三旗的代表，旺庆苏荣是乌盟东三旗的代表，

贾文华是伊盟代表，其余均是土默特旗代表。

大约是六月中旬，除我和贾文华以外其它人等，乘飞机去北平，逗留几日后，便赶赴南京。（因代表团赴京时，适值贾文华不在归绥，故留我等他）。七月十八日，我同贾文华乘飞机去北平，又转乘军用飞机于二十四日飞抵南京。

待我和贾文华抵达南京后，即奔代表团驻地。当时代表团在蒙藏委员会招待所寄住，尚未见到蒋介石先生。大约在七月底即我们到达的四五天以后，方才接到总统府发来的通知，说蒋介石准备接见代表团。八月初的一天，我们全体团员谒见了蒋先生。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应答的主要是荣祥团长和巴维松副团长，其他人很少插话。荣祥先生就内蒙古自治的意义、目的和希望，做了中肯、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将写好的材料交给了蒋先生。蒋先生除了问问弄不明白的事情外，很少发表谈话，只是注意听，有时也点点头，表示同意某个观点。一小时后，蒋先生设便筵招待请愿团全体成员，当时作陪的还有七八位国民党高级官员。

当时，由于我要参加庐山受训，所以提前离开南京，在八月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飞抵九江北岸机场，很快乘轮船渡及九江，饭后乘汽车直达庐山。

代表团在南京羁縻半年之久，除了游览、参观之外，几乎一事无成，眼见内蒙古自治之事日显消沉，于是大家在四七年元月（旧历年底）悻悻返回归绥，这颇孚众望的内蒙古自治运动便也宣告结束了。

三、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

绥远蒙古自治请愿团回到绥远后，便再也没有勇气筹措自治事项，虽有许多人对此愤愤不平，欲议再举，但以荣祥先生为首

的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却已心灰意冷，只得做罢。

这次请愿活动，是西部蒙旗长期瞻望自治的一次总爆发，也是国民党当局对边远少数民族采取绥靖羁縻政策的一次大暴露。它以无情的现实打破了绥远省蒙古上层对国民党中央抱有的幻想，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傅作义先生在绥远所采取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国民党中央实是同出一源，在国民党统治下欲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无异是一种玩笑。

这次请愿活动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党中央对于民族问题的偏见

国民党中央政府，对于边远少数民族采用了自明清以来传统的绥靖政策，集中表现为控制、分隔、渗透。特别是外蒙古独立以后，对于内蒙古的控制便日紧一日。自民国初年由于战线的推移，已经先后几次实现了对内蒙古境内的移民和屯垦政策，并加紧了在军事力量威吓下的行政区域变更，随着一九二八年绥远省的确立，旗县并立的蒙汉分治日甚一日，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分隔治理的目的，在东西蒙古之间人为地制造了行政区域和思想感情上的分隔，以图利用东西蒙之间猜忌的有利条件分而治之。

民族问题，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特别是对于并非高度集中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由于国民党首脑人物自身的大汉族主义的作祟，使他们对于新形势下的民族矛盾不能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能把民族问题摆到一个正确的处理位置，而错误地以为只有逐步渗透，加强控制，有足以威慑对方的军事基础便万事大吉了，并没有从德工投日事件和伊盟“三·二六”事件中汲取教训，故而不能应允蒙古自治要求，这是导致这次请愿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时局造就的不利因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范围内进行接收

工作，俨然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由于伪满洲国和蒙疆政府的覆灭，国民党对边远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日渐加紧，妄图在政治上统一中国后逐步形成全国行政区域上的高度统一。四六年，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对比下国民党尚显优势的一年，因而国民党上层人物对前途抱有很大希望，自然对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就显得冷淡，甚至反感。

（三）内部力量的分裂

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绥远省蒙古自治运动，一方面采取拖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大肆活动，收买个别成员，以期形成内部分裂，从而使这次请愿归于失败。当时的这种活动，不光在请愿团内进行，而且扩展到绥远省及各蒙旗的蒙古上层人物中。他们利用封官许愿，馈赠钱物等各种手段，达到收买、分裂的目的。

总之，由于国民党当局和绥远省地方政权的反对破坏，一九四六年绥远省蒙古自治请愿活动以失败而告结束。

（责任编辑 万青林）

康旅奇袭令狐团

张 希 孟

一、逃者的自述

一九四六年深秋，我在鄂友三部绥远省骑兵保安师第二团当中校副团长（团长叫邢守忠），部队驻扎于武川县圪圖图，我本人住在乌兰花办事处（师部所在地）。

有一天，由河子上（乌兰花南四十多里）跑来一个临阵脱逃的上尉军官，他自言是令狐团一营的一个连长。当令狐团在河子近处的根根区被袭击而全军覆没时，他只身逃脱，到了河子上。在河子上休息了三天，原打算做战地收容工作，后打听到部队全军被歼才到乌兰花的。他在我们留守办事处住了一宿，天明就回了归绥（呼市）。那天晚上，我们招待他吃了饭，他和我们谈了半夜话。他的名字我忘了，但迄今我还清楚地能回忆起他那粗壮的身形，又黑又大而又迟滞的眼睛，年令大约三十岁左右。当时从他的眼神和面容来看，他依然处于惊魂未定、恐惧的状态中，神情极为沮丧，满口粗声愣气的甘肃口音，还带点半嘶哑。他说在河子上还亲眼看见白马连、黑马连驮着战利品，押着数百名俘虏从该村经过。被俘的官兵有的光头赤足，有的衣裳破烂不堪，有的泥污血迹满身，也有跛足受伤者拄着拐杖。他说事情发生得那样突然，如此的惨败，这是他们一千多名官兵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真莫名其妙，是那儿来的骑兵这样子勇猛！他的话总给

人一种印象：前来袭击的部队简直是从天而降！

二、奇袭的经过

一九四六年深秋的一天，塞上地区武川县一带，早晚凉风嗖嗖，出门要穿棉衣，但到中午还有点热。河子镇（日本人在时同乌克兰花一样繁华，日本人走后逐渐冷漠荒凉）附近有个叫根根区的小山村，农忙即将结束，小户人家已秋收完毕，粮食入场，马放山间，要按农家习俗，好些人家要吃“上场糕”。只有广有田舍的大户人家还在忙着碾小麦、打莜麦。凉风吹来，山上山下哗哗地落着黄树叶。凸凹不平的山地，草木半枯，遍野寒霜。三五成群的牛马在坡上沟里游来窜去，咩咩地叫着、欢跃着，都在觅食欲枯含籽的野草。

这天上午十点多钟，大户人家男女老少和雇用的长工在打麦场上忙着碾麦子，也有的用连枷打莜麦，口里哼着山曲儿和二人台小调，一派秋收农家乐的景象。忽然人们发现有不少步兵由西往东前进，渐渐来到小山村，缓缓地进了村，走进一个空场，发了“立定”、“坐下、原地休息”的口令。团部副官忙去找保甲长，说明要在此地打尖吃饭。保甲长不敢怠慢，当即引导营连负责人到各家各户安排米面和锅灶。团长下令队伍解散，按指定地点放哨、做饭。没有任务的各营、连、排官兵有的忙着大小便，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躺在地上聊天吸烟，都感到行军路上暂时休息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迫击炮和重机枪小部队还忙着铡草、喂骡马，并未懈怠。看来这确是经过训练、有纪律的部队。的确如此，这是一支经过连续几个月训练的新编歩兵团，共有一千几百人，官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由陕西、甘肃等地征来的（抗战时，绥西人少地窄，傅作义先生多从甘陕征抓壮丁），兵都是旧绥远省、察哈尔省征抓的壮丁，团长名叫令狐狸，武器也比

较齐全，除步枪外，还有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六〇小炮。团长不用说也是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的，他率部远道而来，很希望在离归绥不远的大青山区一带有所“建树”。

这天中午十二时，官兵们在一声不响地围成圈用饭，吃菜喝汤，忙得不亦乐乎。正吃喝得香甜时，突然四面八方喊杀连天。哨兵赶不及鸣枪警报，大刀已劈在头上，一命呜呼。连排长、士兵们被惊得呆若木鸡。当官的一迭连声地喊叫射击抵抗，可是已来不及了，许许多多的官兵头上、身上被大刀劈得血花四溅。骑兵部队势如洪涛般地冲杀下来，仿佛天塌地陷一般，军容严整的令狐团被砍了个一塌糊涂。在惊慌失措之余，一些官兵意识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开始四散逃跑，可是处于四面包围中，没有逃脱了几个。除了杀死杀伤的，大部分做了俘虏，可令狐团长侥幸得脱，逃到田间，躲在莜麦码子底下。他惊魂稍定之后，回味刚才所发生的事，使这个从军多年的军官真有点想不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是从天上降下来数百骑兵？他经过多次大小战役，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样的惨局，从没见过这样的场合，一枪也没打响，只用大刀砍杀、劈刺，而只有几百个骑兵，在仅仅一小时之内就全歼解决了一个一千几百人、全副武装的步兵团。这是什么部队干的事？他痛定思痛，又悔又恨。

究竟是什么部队袭击了令狐团？原来是解放军康旅黄二团（康健民将军骑兵旅的黄厚将军，当时任康旅二团团长）。据说令狐团奉命移防，路经小村打尖吃饭，黄团是打游击路过此地，双方都没有战斗任务。在秋高气爽季节，黄团人壮马肥，不打仗官兵都觉闷得慌，常常磨刀擦枪准备打仗，想早日完成解放大业。他们在抗战年间，同日军、伪军在大青山后周旋，打过多次恶仗，因而对这一带的地形地物、一草一木非常熟悉，可说是了如指掌。白马连、黑马连远远就发现了村里的岗哨和打尖吃饭的官兵，当机立断，纷纷利用地形地物飞快接近小村的四面，但

令狐团的哨兵没有发现，全团还在架枪吃饭。黄团长当即下令袭击，战士们一个个身背步枪，手执大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其势如泰山压顶，锐不可挡，只用了四五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此次战斗，机动灵活，迅速勇猛，充分发挥了骑兵应有的性能。令狐团垮了，全军覆没，团长本人也逃之夭夭，不敢见董其武将军，更不敢去见傅作义长官。

三、我所知道的黄二团

我是国民党军官学校十期骑兵科毕业生，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历来以骑兵为业，曾参加过张学良东北军骑兵第三师（师长王奇峰），也参加过河南部队骑五旅（旅长张占魁），后又调到国民党中央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解放战争期间，在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骑兵十三旅（旅长高理亭）供职。这些部队要算骑七师纪律尚可，战斗力也较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大小小也作过几十次战，尽管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国民党军官极力推崇骑兵，精心筹划战术，但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在实践中从没有发挥过骑兵应有的性能。官长腐化，白白消耗了粮饷，加上纪律不好，实是扰民有余，作战不足。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有人提倡废骑论。

但康旅在抗日战争时，在察绥地区、晋北地区纵横驰骋，严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也因之闻名塞外。解放战争刚开始，由于八路军武器弹药缺乏，鄂友三自夸康旅是他手下败将，但对战多次，鄂友三部也没有打过胜仗。可是，四六年春，在旗下营斗金山淖梁一战，康旅出奇制胜，袭击了鄂部绥远省骑兵保安师三个团，用大刀劈死数十名士兵，伤了很多。从此以后，鄂部听到康旅黄二团，真是谈虎色变，鄂友三本人也再不吹牛了。一九四九年春天，骑兵十二旅（鄂已改编为骑兵十二旅）被康旅击败，鄂

部被从乌兰花追击到二分子，鄂从马上摔下，折断了臂，其坐骑直跑得口中喷粪。康旅骑兵之神速、战斗力强，由此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 董贵马）

匪徒血洗朝号记

张 尔 杰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萨县五区朝号村（现属土左旗哈素乡）约有四百来户人家，就有七十多户过周年。真是家家上坟、户户举哀，白衣塞道，孝子成群，老人啼其子，少妇哭其夫，邻村亲友携供奠纸者不绝于途。特别是在当街大庙的戏台（现《村和民乐》台旧址）里的供桌上，树有七十二位死难者的灵牌，灵前各俸三牲冥纸，两旁鼓乐吹打，僧道诵经，超度英灵，寄托哀思。台心阴风惨惨，桌上烛灯摇摇，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丧痛悲愤的天地之中。这是什么缘故呢？话还需从头说起。

一、战前形势

绥远（现内蒙西部）地处祖国北陲，在三十年代以前，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外蒙独立”的影响，军阀混战的结果，社会动乱，土匪蠡起，大股如麻，小伙如毛，有的甚至三五串连，手持木棍刀杖明火抢劫，号曰“棒浪队”。致使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蹂躏荼毒之苦。北洋政府先后派任绥远的将军、都统，无不采取剿抚并用，杀录兼施的方针，妄图维持他们的黑暗统治。但因叛服无常，收剿两难，就形成兵匪合一的局面，遍及绥远全境，为害几无宁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各县区从一九

一七年（民国六年）开始，都先后组织起县保卫团和区保安队，以加强境内的防卫力量。有些较大的自然村庄，也多自发的制备火枪土炮，抵御土匪，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延及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任命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派石友三、孙良诚、石新亭三个旅分驻包头、萨县、归绥时，对以哥老会龙头小五杨（杨万贞）、张洪为首的匪众，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地方秩序虽欠粗安，但“棒浪队”和零星贼盗，仍在不时出没。

次年（民国十五年），阎（阎锡山），冯（冯玉祥）大战，冯军败北，国民党从察（察哈尔）绥（绥远）向后套（现巴盟）西撤时，真是兵败如山倒。沿途被达拉特旗和萨拉齐的土匪掳走不少枪支。有的溃兵竟然嫌枪累赘，自动扔弃道旁，而为不逞之徒所拣去，足见国民军不啻给土匪补充了枪支弹药。因此人心思乱，到处蠢动，匪类揭起。河曲人冯六套，尚得胜被警备第二路招安后又哗变为匪。萨县人邬大个（邬银来）、苏大老虎、苏八音及陕西人麻柱儿子，各自啸聚一二十人至四五十人的小股，公开打家劫舍，根本不把县团区队放在眼里。此时，萨县所属各大村庄为了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实力，意欲凭借刀枪棍棒，锹镢斧头和他们最先进的轻武器火枪、重武器二人抬及火药土炮，以自卫保家、抗拒土匪，其中最典型者就是朝号村。

二、战备措施

朝号是东邻后善岱，西及高全营，南通善岱镇，北至哈素、善友板，全村四百来户、计一千七百多人，拥有土地一百零二顷（据土改时的数字）的村子。土地肥沃，家给人足，且常利用冬季时节，几家自动联合，用铁瓦二轮木车跑运输，西至甘肃，东

到张家口、丰台各地，勤劳致富，骡马成群，系五区首屈一指的富裕村子。

朝号又是一个村风正派，人心古朴，蒙汉团结，贫富团结，老少团结，互助友爱，万众一心的村子。他们对富邻居不红眼，对穷亲戚不高眼，对外来户不白眼，所以周村躲土匪的人家，都愿意逃到朝号村避难。

朝号村民为了能够安居乐业，不受土匪蹂躏，经安、尤、吴、孙、赵、王、郭几家大户发起、村民会议，补充实力，自造武器，加紧装备；一时间，凡是比较富裕之家，无不向外村雇用铁匠，在院里生火开炉，锻造火炮、二人抬，并自动打靶演习。截至七月上旬，全村计有火枪二百枝，二人抬六杆，土炮三尊。炮身长约一米，外径约十七八公分，内径约六七公分，安置在村口。并从村边连房筑墙，浑然一体，成为围堡。众推吴掌锁在发现匪情时鸣锣报警，号令全村。又有数人专任火药运输，支援前线，火药也由村民自产。因此，全村男女老少形成一股有我无匪的民气和鄙视、仇视、蔑视土匪的心理，一提起打土匪，人人赞成，个个称快，争先参战，大有“老娃打狗，一齐动手”之势。五十来岁的中农程义（愣金狗）愤慨地说：“打死他一个不赔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怕什么！”就连小脚家庭妇女靳俊鱼也发出：“土匪来了，我拿菜刀也要劈死他几个！”的豪言壮语。而他们的主力就是由二百人组成的火枪队。靳大在、安福祥、赵顺宝等便是火炮队里的核心。

三、战火考验

当时有匪首小王王者（1），率匪徒四五十人，自成一股，轻骑抢劫，飘忽于萨县境内，农历七月中旬突然到了达营子村，扬言要进朝号。朝号村民早已磨拳擦掌，整装待发。五十多

岁的司警人吴掌锁是中农，自己虽然没有什财产可保，但却非常痛恨土匪，所以打锣用劲，走得飞快，语言简朴生动，很能鼓舞斗志。他不负重托，马上转街打锣，下达紧急动员令。一面打锣，一面高喊：“镰刀斧杖，屁股后插上根棒！”立刻结集了三四百青壮男子，有的持火枪，有的拿刀矛，有的提锹镢，有的挥棍棒……。他们见土匪正向沙梁移动，都愤然冲上去迎击，好似春雷滚地，浔江怒潮，直扑匪伙马前，有人竟把小王王的马笼头给摘了下来。二十来岁的张二圪挠，从地上拔起一株秋禾粗麻杆子，猛力格斗，犹如汉代的大树将军。土匪虽然把他一枪打死，但却为朝号村民的神威所慑服，不禁畏难而退。

朝号村人经过这次战火考验，虽然牺牲了一人，但首战告捷，证明他们人心齐，能自卫，越发鼓舞了抗匪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他们也察觉到自己的武器落后于土匪，但却没有采取积极的更新手段，只是有恃无恐，以逸待劳，日夜警惕着土匪的进犯。

有些小股匪伙，垂涎朝号殷实，但又不敢进去，就托人捎话要求送礼（土语讹为水礼），他们一概回绝到：“什么东西也有，进来取吧”！因此树敌日多，积怨日深。匪众都说：“打不开朝号，咱们这野鬼（刁人）就刮不成！”故在朝号村人“扩军备战”的同时，土匪也在进行着“联股合伙”的串联。

四、战云密布

土匪对朝号村早已垂涎欲滴，虎视眈眈，又遭恶语绝情，越发耿耿于怀。几个“班儿头”就互相串联，共谋所以刁人之道。有的主张要打，打开泄愤发财；有的迟疑不打，顾虑碰壁而还。此时高全营子的高毛头从中“折冲樽俎”，遂使他们从中统一了意见，决定必打。

高毛头从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以养车贩卖为业。他拴起二十来辆扣瓦木轮车马，每年秋后就收购粮食、皮毛、甘草等土特产，亲自押车运往张家口出售，换回水烟、布匹等杂货，从中牟利。沿途常遇歹人，必以重价贿通，甚至把所有货款悉数赠送，也在所不惜，因此他买通了这条道，使沿途盗贼都称他为高财主。他们一听说是高财主的车，无不争先护送，以图重赏。

到了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京（北京）绥（归绥）铁路通车后，火车取代了木轮车，高毛头虽然不能仍操旧业，偃蹇于高全营子家中，但与旧识盗匪却难以斩断关系，绝缘分家。此次匪股拟打朝号，曾密请高氏决疑，经他估计力量，权衡利弊，一锤定音，众议遂决。

各“班儿头”众推苏八音为总杆头，原商定在七月廿日会攻朝号，因虑把握不大，就于廿二日派人潜入朝号侦察虚实。回报是“打不得，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双，有去无回！”所以未敢按期轻举。朝号村的人也探确土匪也必定要在一二日内来打，都磨刃以待，准备迎击。但也自虑匪众已寡，火枪不如快枪。可巧在二十三日早上，有国民军溃退下来的三十几名散兵，在一连长带领下进入后善岱打尖。后善岱与朝号相距不过四华里，朝号村即派人去邀他们移驻朝号，允予换去军装，协助拒匪，他们不同意，吃罢饭就向西开走了。当时朝号村的抗匪勇士们曾想把他们的武器解除，装备自己，安太支持这一意见，但王四顾虑国民军以后算帐而作罢。傍晚，三十几名溃兵走到缸房营子附近，就被土匪全部缴械。匪众欢跃地说：“天助我呀！国民军给送来了枪弹，朝号一定能打开！”

与此同时，朝号村又派人到善岱镇搬兵求援。两村相距仅十华里。善岱为五区区公所所在地，有队兵约七八十名，还有六七百退下来的国民军也驻在那里，但那位国民军的团长拒绝说：“上级没有命令，我们不管土匪的事。”至于区队兵就更不敢出

头露面了。朝号村民只能孤军独战，用土造火枪抗拒敌人的快枪。

五、战斗过程

七月二十四日半前晌，朝号村人发现土匪从高全营子方向向东移动，并逐渐接近村边。因秋禾茂密，村周尽是麻谷高粱，阻隔视野，不能洞察来匪动态。报警人吴掌锁手敲铜锣，放喉高喊：“火枪队上房，瞄准土匪的胸膛！”镗！镗！居民们听到后，都接着喊：“有枪的拿枪！没刀的屁股上插上棍棒！”“镗！镗！吴掌锁在全村下达了紧急动员令。

各股土匪共约三百人，分股会攻朝号。从西口子（现通扬水闸路）扑来的一股，被安福祥击退，还截获坐骑一匹，旋因火枪射程不及快枪，被匪打死，是朝号抗匪勇士中牺牲的第一人。从西南口子（通高全营子路）强攻的一股，被阻于尤家大院外边，双方展开攻守战。邻间男女为安全计，纷纷进入大院避难，年仅十一二岁的靳崇智（解放初任绥远财政厅长），本是尤家的外甥，他见微知著，当机立断，刚刚折出院外，脱离了大院，大门既已关闭，旋被土匪火力封锁，再不能走出一人。门东不足二十米处有一口水井，群匪云集井口，被靳大在在房顶上用二人抬轰击一炮，打倒好几个。靳为雇农，激于义愤，嫉匪如仇。他黄须虬髯，奋张如戟，怒目高呼，勇猛还击，而且胆大，力雄，枪准，坚决，众匪对他多次描射，都未击中，但却认准他是黄胡髭。

匪徒先攻破大院东北路边的尤旺小院堡，解除了犄角之势，一面纵火烧房，一面集中全力环攻大院。此时乌云遮没了太阳，下起毛毛细雨，火药受潮，点燃不易，安太急从庙里的禅房提取多半斗干火药，口衔旱烟袋运送支前，不意烟灰引发火药，被烧成乌焦巴弓（后治愈），匪众受惊，慌忙乱退，旋见再无动静，

才又强攻。

接火之初，天色尚晴，火药能够发挥威力，因此火枪打伤苏八音的面部、二人抬摧烂麻柱儿子的胸脯。另有一匪因闹痢疾，在麻田地里屁股朝院，久屙不起，也被击伤。旋以天雨，药湿，枪钝，虽打在脸上，也不伤人肌肤，匪众便放胆近院，引柴烧门。院里的避难群众见固守无望，急从正房西北墙角凿开一个小洞向外钻逃，不意苏八音手卡自来得站在洞口外，满脸血污，余恨难消，除闺女媳妇箍到一旁外，出一个毙一个，出两个倒一双，后又指定匪众代他杀人。当梁二良士钻出洞口时，匪众问他“你愿站着死还是跑着死时？”梁说：“我要跑着死！”说时拔腿便跑。匪众开枪射击，遂即倒下，佯死以免，且未负伤。靳大在见大势已去，并不出院，“距跃三百”以头触石而死，私塾教师谢士珍被打掉手腕，从房上以头栽地碰毙。最后从洞口钻出尤开成（尤宝宝），匪徒杀人已杀红了眼，正要勾动板机打他，他大声说到：“你们打狐子是为皮吧？我是这院的少掌柜，这院的人都已死光了，你们如再打死我，这院的金银财宝就得不上了！”——他提醒了匪徒，被留下一条命，——土匪打开朝号，进了村里，又引出不少可歌可泣可传的英烈人物。

六、战乱英烈

土匪甫经进村，不意又遭到抗匪勇士的狙击，他们在惊悸之余，发现枪声是从一间场房子里打出来的。一人拒守孤室，仍不屈服。匪众喊他说：“不要打了，你出来，保你不死！”他却骂到：“爷爷宁死也不出去！”遂遇害。他是谁？他叫赵顺宝，时年仅二十余岁。

王凤池（金丑子）手执禾杈，站在自己的房上，准备拼搏。他眼见土匪进了村，便高喊到：“火枪队那里去了，快打狗口

的！”不意有的匪徒已窜到他的附近，遂被一枪打死。

程义（愣金狗）老人体格强壮，浑身是胆，他平日的豪言壮语，并非假话大话，他在一根长木杆头绑上屠刀作为兵器，当土匪进了他的院时，他就拿上他的兵器向匪走去，意图刺杀一匪。匪徒喝到：“呔！老汉，你不要过来！”他却佯装耳聋继续走去，遂被枪杀。

四十来岁的女英雄靳俊鱼儿，瞥见土匪进院，急忙操起两把菜刀，藏身门后，匪徒持枪进门，他便迎头一刀，匪徒骇退，她即关门抗拒，遂被从门外开枪打死，然犹手握菜刀，怒目不瞑，匪竟不敢复入，保住了家财。噫！朝号村民为抗匪而牺牲者，男英雄女巾帼何其多且烈哉！

匪伙入村后，但见双手沾有火药者即认定是火枪队成员，不是随手一枪杀害，就是绑出集体枪毙。当把康双举，赵二蝉，赵永蝉、赵仁蝉、班全成五人押缚枪决时，正要开枪，一匪突然高叫“全成哥！”并忙对匪目说：“他不是朝号人，是寿阳营子的。”因而只把康赵四人处死，班全成幸免于难。

旬日后，尤海旺出外向亲戚求借粮食，路过某村，不意又被土匪捉住，当追问他“哪个村的？姓啥？”时，尤以实对。匪徒惊骇道：“朝号尤家的人，抬死狗日的吧！”尤海旺以为冤家路窄，自分必死。苏八音又亲自问他：“你真是姓尤吗？”他仍以实对。苏匪思忖良久，徐徐地说：“尤家的人，也该给留下一个栽根立后吧！”遂令放行。——谁会想到朝号村人坐不改姓，行不易名的这种性格，竟能感动了苏八音，此是后话。

总之，战斗从开始直到匪伙入村，战乱停息，最多没有超过三个小时。土匪除多人受伤外，尤家四所院落连长工共死十人，尤家成了老少三辈子寡妇。安家死五人，赵家死三人，靳家死二人，以及洞口被杀和随手枪毙与集体屠害者共计尸体七十二具。《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根据于孝仁所写《绥远二十年来之土匪

记》，误为五十七具，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土匪最恨靳大在，入村后分头寻找黄胡髭，最后发现尸体，掏心烹食，残戾极矣！

七、战后余音

土匪打进朝号村，尤家两院为焚，吴家东房被烧，东头赵家场面放火，总计二十余家悉成灰烬，几乎全村中等以上人家，差不多都被请了“财神”（绑票），真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时已有“红眼病”患者，周村不逞之徒因人之危，幸人之灾，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纷纷去朝号村发“洋财”，背粮，驮物，刁钱者应有尽有。忻州营子诸村甚至有个别人套上车去搬运者，叫作“得侠赠”（土语讹为的下赠儿），其实是活刁人。

此时，被请的“财神”家属，督促迁居在朝号村的臧漠出头露面，与“班儿头”们接洽回赎事宜。因臧曾当过绥远土匪之开山始祖卢占魁的护兵，故为匪众所知名。贺万发（贺蝉）好高攀，愿为臧漠敲边鼓，于是联袂去见。但因贺蝉与靳大在相貌酷似，匪首误为黄胡髭，拔枪便打，臧漠急忙用臂架住说：“他是朋友，不能打！”匪首沉思少许，对贺说：“你去吧，拿三百块现洋来。”意即放他远走，以免他匪看见仍以黄胡髭击毙也。不意贺蝉走后顷刻又来，匪首一见瞋目道：“你还没走？”意即等着要死吗？贺蝉回答的好：“既是朋友，怎么能走？”即将现洋三百元奉上。匪首因此认为真够朋友，态度也较和缓些了。故在臧漠从中斡旋下，所有的“财神”，逐渐使穷者释放，富者降额赎回。

二十五日，土匪抢光朝号村所有的好骡马，开到善友板，当晚麻柱儿子伤重毙命。弥留时对众“班儿头”喟叹道：“我说不要打，不要打，你们要打，把人家一个很好的村子，一下糟害得甚也不像啦，唉！”嗟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真是这样的吗？

朝号村民在被土匪血洗以后，家破人亡，畜力精光，口粮匮乏，心情沮丧，但仍然擦干眼泪，挺起胸膛，要继续生活下去。由于当年根本无力举哀发丧，都将死者草草蒿葬。次年（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死者家属及村社负责乡警，为了悼念英灵，设祭招魂，就出现文章开头所述的周年活动。《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兵匪篇曾记及此事，叹为“绥区（2）第三次大惨案也”。朝号村社更把这次惨案牺牲的人，当作是本村的七十二烈士。原计划在头周年后过二周年，后因绥远受国内形势动乱的影响——奉军取代晋军——晋军又撵走奉军，——人祸促成了天灾，天灾又加重了人祸，匪灾、兵灾、瘟灾，旱灾接踵而来，终于暴发了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民国十七至十八年）的特大灾荒，和更为猖獗的匪患，致使后两次周年纪念未能如拟举办，殊遗憾也。

八、战败教训

朝号村民被匪徒血洗以后，怀着悲愤的心情力图重振。同年秋冬之交，请刘会文的警备第一师二团团部驻在安太院里。次年（民国十六年），刘被奉军绥远都统汲金纯枪决，所部离去。大岱人刘会元接充五区区长。他带区队官兵从善岱移驻朝号孙锤院内，人吃马喂均由村民供给。一九三〇年刘去职，新任区长某即把区队仍调驻善岱，因此，保家自卫又成了朝号村人的首要课题。他们汲取了上次战败的教训，采取了新的策略和现实措施：一是对土匪不挑战，不树敌，只要土匪不进村就灵活应付。二是更新武器，使用干才。全村集资购买步枪二十七、八支，手枪两支，组织民团，并聘任李三倚子当团总，保卫全村安全。

李为直隶人，真名失忆，曾充后套地主王同春打手及股匪“班儿头”，经臧漠引介来到朝号。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他被护兵曹三（察素齐人）击毙，掳走步枪十二支，手枪两支为匪。旋被萨县保卫团围歼。所失枪支经里素陈恭翰旋，县府又把枪支如数归还朝号，村人即推臧漠任团总，自统其众。适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陈国英组织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一路，任曲步霄为师长，号召五区各村民团保家卫国。朝号村人即积极支持臧漠带着枪马人效力曲部，改编为一个排，任臧为排长。旋因陈国英到了重庆，曲部为国民党骑六军军长门炳岳改编为游击第一支队，任曲为司令，驻守后套乌加河畔，被日寇打垮。朝号村人和所有绥远沦陷区人民一样，受八年亡国之苦。

九、结尾的话

窃谓《绥远通志稿》为纲目性文献。她在卷六十二里对于土匪血洗朝号惨案，未能备述其详，因此不憚翦陋，追书始末，兼寓招魂虔祭之诚，冀补史阙，俾使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青年一代，能知前朝兵匪动乱之苦，和当今安定团结局面的可贵，而珍惜她，维护她，发展她。除向资料提供者安高、安仁、尤增凡、王凤椿、刘润庆、刘福柱，安方诸老人致以诚恳的谢意外，谨以此篇史稿，作为我响应土左旗政协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征文的献礼。

注：（1）小王王，名不详，萨县人。按《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所附“著名匪首一览表”所记，小王王死于民国十二年，今以我的采访结果录之，但存疑。

（2）因当时建制为绥远行政特别区，故称。

（责任编辑 王永常）

大青山来了八路军（爬山调）

史银堂搜集整理

数九寒天刮大风，
37年打进来吃日本兵。①

日本兵长得豺狼心，
奸淫烧杀施毒刑。

针尖上睡呀刀尖上行，
亡国奴活的不如人。

遮天的雾呀卧山的云，
黑暗的年月几时晴？

藤缠树来树绕藤，
共产党和人民心连心。

旱地里下了一股及时雨，
毛主席派来李支队。②

李支队来打日本鬼，
救国救民显神威。

李支队就是那八路军，
拯救人民出火坑。

阳婆婆出来满山山红，
大青山来了八路军。

黑漆漆的夜晚亮晶晶的星，
共产党点燃那指路的灯。

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
一普真心③打敌人。

八路军纪律真严明，
从不遭害咱老百姓。

八路军打仗真英勇，
又能守来又能攻。

伏击战来麻雀战，
出奇制胜立新功。

打得鬼子漫山滚，
打得顽军④丢了魂。

一杆杆红旗头上插，
八路军为咱们打天下。

喜鹊鹊报喜叫连声，

胜利的喜讯震长空。

八路军里有个姚司令⑤，
指挥打仗赛如神。

姚司令带领子弟兵，
二架子⑥深山扎老营。

巴总窑子⑦万家沟⑧，
住过八路军司令部。

大小火烧⑨一前晌⑩，
到处有八路军的窝铺⑪房。

大青山建立根据地，
藏龙卧虎有生气。

南平川⑫派出工作队，
秘密发展救国会⑬。

河子、美岱、沙图沟⑭……
救国会员无其数。

救国会骨干扛起枪，
组织起来打豺狼。

骑马要骑枣骝红，
当兵要当八路军。

大青山高来土默川低，
好后生⑮要参加游击队。

蒙人汉人挨肩走，
团结起来打日寇。

穷人当了八路军，
说出话来有人听。

穷人参加了游击队，
儿孙后代不受气。

九峰山⑯松柏长得高，
萨县⑰游击队逞英豪。

柳树淖⑱打胜第一仗，
游击队威名震四方。

美岱沟⑲布下石头阵，
砸得鬼子送了命。

陶思浩⑳巧打伏击战，
作恶的鬼子上西天。

捉特务，除汉奸，
妖魔鬼怪心胆寒。

黄土尖㉑建起宿营地，

又练兵来又学习。

游击队改编成正规军，
绥西二连^②传美名。

哥哥在 frontline 打敌人，
妹妹在村里当民兵。

前方后方心连心，
战场上比赛谁英雄！

你打你的游击我种我的地，
打走日本鬼子咱们再相会！

要穿红来一身身红，
咱和八路军是一家人。

崖畔上苦菜根连着根，
咱和八路军心连着心。

鱼傍水来水养鱼，
老百姓爱的是游击队。

红旗一展哗啦啦响，
咱帮八路军扛机枪。

军民一起埋地雷，
炸得敌人满天飞。

赶上大车吆上牛，
一车车物资送到万家沟。

五十斤米呀三十斤面，
偷偷背过封锁线。

攀山越岭豁上命，
米面接济咱八路军。

军队有啥民有啥，
军民一块儿不分家。

做好军鞋种好地，
巩固咱们的根据地。

瞭见八路军进了村，
烧茶送饭端点心。

八路军来了烧开水，
顽固军来了埋地雷。

兰盈盈天上遮乌云，
鬼子扫荡进山中。

鬼子进山咱转移，
转来绕去把敌迷。

钻树林来过急流，

哪道沟深哪道沟住。

铺沙子来枕石头，
艰苦的生活炼骨头。

十八道沟的野菜嫩又鲜，
可就是差那么点油和盐。

骑马不骑带驹驹马，
马驹驹叫唤心难活。

骑马不骑大白马，
黑夜行军目标大。

枪不离人来马不离鞍，
文件袋袋脖颈上拴。

二黑啦啦轿车灰毛驴驴拉，
打不败日寇不回家。

冰凌碴墙雪盖房，
鬼子横行不久长。

草原上的骏马行千里，
八年抗战得胜利。

东山上打雷西山上晴，
黑暗过去就太平。

打败日寇不停步，
继续革命朝前走。

注释：

①日本侵略者侵占绥远省（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区）的大部分地区是在1937年10月。

②李支队：李井泉支队。1938年秋，李井泉奉命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七一五团和晋绥动委会四支队挺进大青山，开展抗日战争。这支部队简称李支队。

③一普真心：一片真心的意思。

④顽军：指国民党自卫军。

⑤姚司令：指开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姚喆同志。

⑥二架子：指大青山深处地区。

⑦巴总窑子：大青山中的一个村庄，现属土右旗。

⑧万家沟：大青山中的一道沟，在察素齐北，现属土左旗。

⑨大小火烧：即大火烧和小火烧，大青山中的两个地名，现属土左旗。

⑩一前晌：大青山白石头沟中的一个村庄，现属土左旗。

⑪窝铺：低矮而简陋的房子。

⑫南平川：土默川，与大青山相对而言。

⑬救国会：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组织的一个群众组织。

⑭河子、美岱、沙图沟：大山前的三个村庄，现属土右旗。

⑮后生：年青力壮的人。

⑯九峰山：大青山的最高峰，现在土右旗境内。

⑰萨县：萨拉齐县的简称。

⑱柳树淖：村名，现属土右旗。

⑲美岱沟：大青山的一道山沟，在美岱村北。

⑳陶思浩：村名，现属土左旗。

⑲黄上尖：美岱沟中的一处险要地方。

⑳绥西二连：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三团二连。该连由萨县游击队改编。

忆兴蒙学院学习的土默特 旗籍学生片断

胡克今

编者按：本文由蒙文原稿转译而成。作者原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任职，目前已离休研史。

胡老先生是该学院的肇建者之一。今虽年达八十有五，其忆所及历历在目，仍不减当年。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初在北京辅大任教，旋即转赴内蒙致力于民族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懈，为开拓民族民智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先生皓首穷经，通蒙、满、汉文及英、德等数种外语。终身不娶，生活异常俭朴，执教严谨而认真，诲人不倦，常人不堪其忧而先生不改其志。老来治学尤勤，堪为后学者的楷模。

先谈学校的历史：这学校是一九三九年秋在呼市新城（即厚和蒙特）成立的，校名是蒙旗学校。当时的学生是锡、乌、伊三盟的学子，约二、三十人。全是所在盟、旗私塾的学历，蒙文程度很好，其它课程未学。教师只我一人；我只能用蒙语授课，因为他们仅懂蒙语、蒙文。没有蒙文教科书，我只好翻译汉文教科书并刻钢版、油印。每天授课四至六小时。因此忙得只剩下了吃饭、睡眠的时间。就这样情况我亦非常高兴！因为我是蒙古人的子孙，对蒙古人的教育事业就应该这样做，而且责无旁贷。

一九四〇年夏，学校迁到张家口。上级来文《通知》内

称：调我去张北的一个民族学校任教。我说：我不去。我不是官吏，是教师。“用则聘，不能调”。同年秋学校又聘我返回原校。此时的学生人数增加了，招生地区也扩大了。除原有的锡、乌、伊三盟外又增加了察哈尔、土默特旗以及东部区的学生。土默特旗的学生约占学生全数的零点一、二。学校的名称也于一九四一年由蒙旗学校改为兴蒙学院并增设了预科、师范部。师范部又分为一、二部（一部学制为二年，二部是三年，本科学制定为四年。）时间大约在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初。首任院长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院长是超克巴图尔；教员除日本人外绝大部分是留日生。日式学院制已初具规模。时称“蒙疆最高学府”。

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又把几个蒙古中学（如厚和豪特、张北蒙古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集中到兴蒙学院和兴蒙学院的高年级学生编为训练班，给以师范教育。结业后分配到各旗去开办学校和教学。我对这个训练班内的土默特旗的学生人数和学习情况，除留在兴蒙学院学习的预科、本科生外，我都记不清楚了。

以上是兴蒙学院的简史。下面专谈在兴蒙学院学习的土默特旗的学生情况。

约在一九四一年开始，考入兴蒙学院的土默特旗学生，本科内有：乌云斯沁、白颜都固仍、吉尔格朗、巴音毕力格、图孟巴雅尔（后改名为乌云毕力格）〔注一〕。预科或本科一的有：蒙贡、乌力济、克什格、毕力贡达赖、额勒波力图、纳音泰、伊楞泰、乌力济、纳木吉勒多尔济、图孟巴雅尔等。

先说他们的一般情况，至于他们的卓越的认识、想法、志愿及毅力下面再谈。他们到兴院后，遵守纪律，努力学习，不叫苦，更没有挑皮、捣乱的事情发生，敬师爱友，不和同学们争吵斗殴，生活上尤其不存在恶劣习惯和放荡行为。

再谈他们卓越的认识、想法、志愿及毅力：第一批学生他们是越过预科直接考入本科的。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较长，从入学到本

科四年毕业都在一起。土默特旗去兴蒙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本旗中学的毕业生。他们所以能去兴蒙学院学习,需得到旗里、学校的推荐和家长及学生本人的同意才能去。这三方面有一方不同意就去不成。假如家长和学生本人要忙于取得有名望的高等学校毕业资格,急于求取名利,有这种想法就不去兴蒙学院了。因为该学院是新成立的学院,而且必须过两种语言关:蒙语和日语,当然主要是过蒙语、蒙文关。我认为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关于兴蒙学院用蒙语授课的情况如不知道而去的,入学后不中途后退,不叫苦,努力奋斗学习到底,是其意志可嘉,其毅力确强,令人钦佩;第二、要是已知道该学院用蒙语授课而去的,那就是家长和学生本人认识、想法、志愿、毅力就更为高超了,也就是对于民族热情更显得浓厚了,对于艰难困苦不惧的精神更是突出了。总之,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族事业服务,这就是他们的珍贵品质。

光阴荏苒,韶华易逝,解放后我只见着他们中的三、四个人,虽然在一地工作,恰是邂逅相逢。五几年见到了在内蒙古军区工作的巴彦都固仍;六几年又见到了吉尔格朗,他说他在搞翻译工作;八零年前后才见到了图孟巴雅尔说他在土左旗编纂《土默特志》。这几位学生在和我谈话时,完全用蒙古语,并且说得很流利,听不出一点后学的音调,使我很受启发,由此证明:困难是征服不了意志坚定的人。同时也证明我是废人,实觉惭愧!我为什么不在他们求学时,竭尽全力在课余帮助他们,勉励他们和督促他们呢!今天回忆起来真是悔恨莫及。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的感想:教育是促进人类进化的原动力之一;人类进退、国家存亡、民族生存等都以教育的先进、落后为转移的。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只知道喀喇沁左旗有学校。也知道喀喇沁右旗的学校比左旗好。两个旗之所以都有学校的原因是:右旗有个好王爷,贡王(即贡生纳尔布)这个人有学识,有作为,他首先在旗里创学校,请先进教师,为了兴办学校不惜重

资邀来日籍顾问指导教育，并派学生出国留学，左旗人民中有先进人物，为地方教育的人物大有人在。（在清朝以前的一个时期，没有贵族作主，都是人民群众自发建校。）旗王虽不先进，但不作梗，于是这两个旗在清初都成立了学校，给深造人才打下了基础。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北京，听说土默特旗的学生进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我很惊奇，又很羡慕！一九三二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在北京大学求学的蒙古学生也是土默特旗的学生占多数，其次才是喀喇沁右旗的学生。而喀喇沁左旗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只我一个人。喀左旗的其他三个大学生却在北平大学。原因安在？

后来我涉猎到有关蒙古文史的书，才知道土默特这一部，原是阿勒坦汗的直属部份。这个汗，据称：除武功外颇爱好文化，晚年又信仰佛教，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他重视文化，开始崇信佛教，蒙古人全部信仰佛教了。于是土默特人重视文化成风，特别是办旗务的人，立足教育，长时期的不懈努力，形成土默特旗的人才辈出而意志坚定、观点正确、不怕艰苦而努力前进。就这点值得人们学习！

深望土默特旗的广大人民，今后更加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年老精衰，认识浅浅，蒙、汉文两稿奉上，请指正。

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

附注：

一、乌云斯沁：原名乃勒太，汉名温和。生前任内蒙科学院语文研究所主任。

巴彦都固仍：汉名李芝华。原内蒙军区《二五三》医院院长、后勤部副部长。

吉尔格朗：汉名马庆云，在达茂旗工作。

巴音毕力格：汉名李芝富，在呼市税务局工作。

图孟巴雅尔，后改名乌云毕力格，汉名万青林，在土左旗政协工作。

二、蒙贡，后改今名赛希，汉名云银旺。在内蒙古建材局任局长？

毕勒贡达赖，汉名云禧。原呼和浩特供电局劳资科长。

额勒波勒图，汉名苏元正，原土默特左旗党校校长。

纳音泰，汉名姜继明，托克托县章盖营务农。

伊楞泰，汉名姜继勋，托克托县章盖营务农。

克什格，汉名索恩正，呼和浩特职工大学图书馆馆长。

乌力吉，汉名奎寿，土右旗民中任教。

那木吉勒多尔济，汉名荣世业，呼和浩特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图孟巴雅尔，汉名云其格，任内蒙政府农机局机械处长。

（责任编辑 万青林）

忆 母 校

土默特旗立高等小学

——兼述土默特旗立蒙文专修学校

丁 成 贵

我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考入土默特旗立蒙文专修学校的。该校附设在呼和浩特文庙街土默特旗立小学校内。到一九四一年暑期毕业，是该校蒙文专修班的第一期第一班的毕业生。

原校的校门头上有荣映屏先生用隶书写的阳文塑字“土默特旗立高等小学校”的校名。并在校门左右两侧各挂一块用蒙汉文书写的当时学校校名的木牌。西边挂的是“土默特旗立蒙文专修学校”、东面挂的是“土默特旗立文庙街小学校”。它是青城唯一的一所历史悠久的民族学校。还是一校两制的学校。

蒙文专修学校分甲、乙两个班，定为四年毕业。主要课程是蒙语文，加授汉语文，毕业后，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小学部是六年制，主要以汉语文为主，加授蒙语文。该校是一直为青城唯一的民族的初小和高小制的高等小学。

我在校期间，回忆更调过学校负责人有：

麟 祥——在我入学后不久的时间，他被调到旗政府了；

恒 升——接麟祥的工作后到一九四一年夏季；

云惠盛——续接恒升的工作到我毕业后继续任职。

各班主任老师有：

蒙文甲班 恒 升

王 庆

蒙文乙班 艾隆格

云沛霖

汉文班 一 六年级 咎 良，兼教务

五年级 库雅熙

四年级 丁贵和

三年级 云淑端

二年级 王吉厚

一年级 云淑静

还有任课老师孟仰兴老拔贡，任古汉文

荣宝麟老师

包英杰老师

乌力吉那仁老师

卜 斌老师

锡振华老师

路润斋老师、常文光老师、等人。

饭厅是包饭有三人，传达室打钟一人，杂务一人。

学生人数：

汉文班一至六年级，每班平均为25—30人。土默特旗蒙人仅占百分之50左右，一半都是学校附近的汉族同学。土旗高小历来是以团结为根本，特别对汉族老师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传统风尚。

蒙文专修班，各有三十五人左右，全部公费。可能坚持学完全部课程学时的学生为数不多。例如我们甲班在四〇年春从乙班升入甲班后有三十人左右，而到学习期满毕业时仅有十四人了。其他同学早已各奔前程。特别值得一提的第一批奔赴延安革命圣地的同学有云一立、李存义、程德仁、张玉庆、赵青山等同

学，后来又有二批三批……。其他有的考入蒙古中学、巴盟师范、家畜防疫所、青年和幼年军官学校、留口预备学校、北京蒙藏学校，更有万全林、李芝华、李芝富、马庆荣、温和五位同学，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兴蒙学院。也有少数人返乡务农，还有的同学参加了游击队。因而仅留毕业人数就不多几人了。可后来这些同学无论到哪，还是参加了抗日革命和解放战争，最终都是革命的骨干，蒙汉兼通的人材，这都是母校的光荣和自豪。

那时学校校舍虽不能与今朝相比，但应学的都能与其他学校相比齐全，其他学校难与媲美的革命传统教育唯独我校。每年全市运动会的总分第一总是我校；图书室虽小，能满足你学习课外读物的需要；成绩展览室鼓舞着同学们的进步；篮球队是市内的一支强队，很有点名气的；网球，器械活动人人都能做两手。所以回忆起当时的实情至今犹如前几年的事情，特别怀念当时的老师，他们耐心、负责、诚恳的教学态度，苦口婆心的教导至今难以忘怀！

想起我们甲班和汉文廿班的同学毕业时情景，事事涌到脑海，感慨萦回心头。汉文班毕业的同学有孙明亮、云惠钦、云海、王广成、福文明等十五位同学；蒙文甲班毕业的有马庆荣、万全林、李芝华、李芝富、云守正、王有才、张耀庭、奎寿、王德馨、丁成贵、荣世业、温和、韩仁、那木凯十四人。现都已花甲之人，退离休的占一半还多！时光如飞，日月变迁，母校也在变革中前进着，可怎也磨灭不掉我脑海里对母校旧景象的怀念！现把母校的旧景记述一下，也好留下点影响纪念。更为母校的进步发展，人材倍出的祝愿，留下一点我与老同学们的想望，能在土左旗资料史志中永留一页给“土默特旗立高等学校”的原景原貌，永传后代为愿望，此献。

责任编辑 孙明亮

恒升同志编年

乌云毕力格

恒升同志，性宽和，寡言笑，有坚定的信仰，能坚持原则。他的一生事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依据档案资料及其生前共事者和他的学生提供材料，汇集整理于下。这个材料可能是挂一漏万，或者是拣了些芝麻，尚请知者多为指正补充。

一、生平事迹

恒升同志原籍土默特右旗阿都赖村人，蒙古族。1898年10月出生在小土地出租的家庭。

1912年入包头土默特旗立初等小学堂念书。

1915—1916年在土默特旗煤炭租税总局，就局长都格尔扎布专学蒙文（蒙语在家略通）。

1917年考入旗立土默特高等小学堂，当年毕业。

1918年入北京蒙藏学校。

1926年考入绥远骑兵旅（第一）满泰部任文书弁目，同年11月参加内蒙古军政治学校任上尉副官，因白云梯叛变革命被迫回家。

1928年秋，曾和吉雅泰、勇夫等去蒙古，因途中匪阻而返回。

1933年由李森介绍与吉合发生关系，继而和梁一鸣、王逸伦、刘仁等同志在绥西一带工作，具体做缮写、翻译宣传品以及

通讯联络等工作。同时为掩护一个叫张明远的人安置在阿都赖当教员，在他家印宣传品做地下工作。此人在三八年后半年参加了陈柄寅部队和王英部队，对往延安输送学生有过很大帮助。

抗战前不少同志如：乌兰夫、王若飞、奎璧、吉雅泰、刘仁、吉合、勇夫、梁一鸣、李森等经常去他家住，一住就几个月，还在他家开会，布置工作。他还在包头租一处院，专设一间房供地下工作者们用。时局一紧张，立即转移到他的农村住宅，食宿包费。他的夫人也全力支持，将党的宣传品译成蒙文给蒙古群众宣传。

1934年—1935年在西公旗小学任教。

1935年同吉合、刘仁、王逸伦等赴蒙古学习一年。恒升做翻译，一路很苦，没有水喝，下雨时将帐蓬拧下来的水几个人分着喝。正如王逸伦所说：“他一直和我党的关系很好，为我们帮了不少的忙，那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能找到这样的人来帮我们，是很难得的”。

1937年由蒙古政府派回阿拉善旗、宁夏工作。

1938年×××去延安，因从延安来的张福民、胡玉生、××，要恒升隐蔽在日本统治区工作，因于七月返回土默特旗立文庙街小学任蒙文教员。

1939年12月任该校校长兼蒙专蒙文课，同年为地下工作的铁路工人张福民领取了土默特旗蒙民良民证，使之便于从事活动，后又介绍他去伪蒙军十八团当兵。此人为大青山游击队转运了不少枪支。

恒老师不畏强暴，遇事据理力争。在他当校长时，有一日本工程师看准土小门前的一块石碑要拉走，恒老师不准拿走，日本人举手就打，恒老师还是不准，这位日本工程师只好走去。事后不久，恒老师被警察局抓走。（王有才提供）

1940年因人告发，被日本伪警察局拘留，因无估证，旋即取

保释放，校长职务被撤销。

成少江被新校长麟祥开除学籍，恒老师知道后又把成少江叫回学校，并恢复了学籍。

李金山、云生福是通过组织由恒老师掩护送往延安的。恒老师平时对学生很严，但又处处关心学生，这是同学们公认的事实。（以上是李存义提供的）

时间可能是1940年的夏季，有一天早晨上第一节课时，发现少了七名学生——李存义、成德仁（少江）、赵青山等，我就向恒校长汇报。恒校长说：“我知道。千万不要声张，咱们知道就行了。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恒校长是为革命工作的人。（王庆老师提供）

日寇投降后不久，恒老师同李森同志去伪蒙古军军官学校宣传形势，说明党的民族政策，并通过金海如经常和军校联系，使绝大部分师生倾向共产党，起到极大作用。（上述纪实一则，是国家民委原处长吉儒木图《回忆“一二·五”小教场流血事件及其影响》一文所提供）

赵真北、云其格常去恒老师家，恒老师给他们讲：“共产党领导的苏、蒙军打败了日本军，八路军也是共产党领导的。蒙古青年要有志气跟共产党走，蒋介石、孙中山都是大汉族主义者，欺压蒙古人，……”这对赵真北、云其格参加革命起过很大作用。（赵真北提供）

同年12月末——41年3月任保商护路队会计。

1942年4月—1948年夏任土默特小学蒙文教员。毕力格巴图尔、贾力更、勇夫等同志，经常去他家或办公室研究工作，恒升为八路军购买了大量雨衣。

1945—1946年，恒老师动员学生到解放区工作。如骑五师的文科同志，就是在他动员下参加工作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军和伪蒙军围攻我进

城（呼和浩特）部队时，陈炳宇、耿殿章在恒升家开会研究组织游击问题，陈炳宇临走将白洋三十元，俄国表寄存在他家。随后耿殿章在城东古楼板一带组织起游击队，要恒升提供枪支弹药。恒升立即通过图布信（军官学校副官）处搞到自来得手枪子弹三匣，八音枪子弹两匣，亲自送到什兰岱村毕力格巴图尔家转交耿殿章。

1945年国民党强占呼和浩特市后，恒老师强调不参加国民党、不受训、不接受工作，他坚持执行这一条，直到48年暑假毕业典礼上对总管荣祥讲话不满，坚决辞职回家，到“九·一九”解放后才又参加工作。（赵真北提供）

金海如在南高任教时恒老师动员他参加革命，并托他把他的儿子余兴华也领上。于是金海如、云继光、赵书铭（又名托林）等由恒老师协助去张家口。（李存义提供）

1947年恒升同巴音巴图同志发生关系，他与另一个同志调查城内国民党部队驻扎情况，包括指挥官的姓名、特点以及碉堡位置等，并写出书面材料详细绘图，向巴音巴图报告。

1949年10月在绥东和奎璧、苏克勤同志发生关系。

1950年元月，任绥远省文教厅民族教育科长。

1951年元月，任绥远省农林厅畜牧局长。

1952年7月，任绥远省民委办公室副主任。

1953年2月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6月，任绥远省民委办公室主任。

1957年初，任内蒙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处长。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揪回批斗。

1978年不幸因病逝世。

二、两个结论

1、组织结论——依据档案按语摘录

参加革命后努力学习，特别是对政策、文件的学习，事业心强，工作任劳任怨，积极、肯干、负责，办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待人以诚。

2、共事者的评价

热心教育事业，特别关心民族干部的培育，正直无私，态度和蔼，蒙汉语文精通。（王庆老师提）

〔说明〕

本文凡没有注明提供人的，都属档案资料的引用。

（责任编辑 云文瀚）

抗战胜利前后的毕克齐教育

王 道

(一)

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中，毕克齐处于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人民在敌人的蹂躏之下，无不思念民族的复兴；生产除罌粟的种植有所扩大而外，粮食、经济作物、蔬菜等生产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发展；教育自然是一个停顿的阶段。这一停顿，为期八年，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日伪时期，改用成吉思汗纪元。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为成纪733年。这年毕克齐原来的两所学校陆续复学。一为土默特旗立第二小学（真武庙内），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一为厚和市（即今呼和浩特）信安乡小学（关帝庙内），四个教室，六个年级，三四年级复式，五六年级复式。真武庙有学生约三十名，关帝庙有学生约一百五十名，全镇总共有学生不到二百名。

由于许多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日本人办的学校，不愿孩子受奴化教育（特别是不愿学日语和向东方遥拜），所以镇内出现了不少私塾，让孩子们去接受封建的启蒙教育，目的是“睁开个眼，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群众先后自发办起的私塾不下十处，每个私塾学生多则三四十人，少的也在十人以上。

这种“双轨”制的教育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上半年。

(二)

抗战胜利前夕，毕克齐有私塾四所。最大的一所设在二道桥对正的三合店院内，塾师张之祥。其父张铎先生，一生教书，人称“小张先生”。以解家的学生为主，后街、银匠房子、流水巷子、香房巷子的学生都在张先生塾中念书。其次，西大成店院内有山西崞县人郭建铎先生私塾一所，学生约三十人。郭先生右足跛，走路一颠一颠，人们暗称他为“郭拐子”。西头各巷，如曲房巷、衙门巷、崞县巷以及南园子的学生大多在郭先生塾中念书。奶奶庙街正对奶奶庙的西大门中有马先生（马辑）的私塾一所，学生也有二十名上下，马王庙街、奶奶庙街、庆春园巷以及头道桥东的学生多在马先生塾中念书。张文正先生在关帝庙街东口自家院内办私塾一所，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北园子、碾道巷子不少学生在张先生塾中念书，学生在二十人上下。

这些私塾属于“散馆”性质，以一年为期，根据学生所读书籍的不同，付给先生一定数量的“束脩”（即送给先生的报酬），可给粮食，亦可给现款（蒙疆银行的钞票）。如郭建铎先生的“束脩”是：念《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学生一年收小麦六斗（可随市折价付钱），念《经》书的学生则要收一石。初入学的蒙童只收三、四斗。其他各塾与此略同。有的贫寒家庭，孩子只上“春冬”塾，农忙回家劳动，“束脩”多不定，家长与先生面议。

从授课内容上看，属于“蒙馆”，启蒙学生占多数，念《四书》的较少，念《经》书的绝少。学生入塾后依次读的书为《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读《四书》。念《四书》的学生，兼读《幼学琼林》、《朱子治家格言》等书；念《经》书的，兼读《纲鉴辑要》、《唐诗三百首》等书。

教授法为传统的“诵背”法，整日诵读，早晨背生书（新教的），下午背温书（以前学过的）。有的先生开讲，由先生给讲解所读书的文句，学生次日回讲。大一点的学生学珠算和简单的笔算（只限于加减）。

“诵背”而外，主要的一门为习字，初为描红，次为写引子（白纸下边衬先生给题写的仿引，也可写买的仿引）。大一点的学生则临帖，照着颜、柳、欧、赵等历代名书家的字帖写字。写好后，先生给“判仿”，写得好的字，用红笔在右上方点个红点（也有的画个红圈），写得不好的字，画个竖红杠。

学生不过星期日，大热天“闭伏”，犹如现在的放暑假；大冷天“闭冬”，犹如现在的放寒假。一些传统的节日，家长给先生送些礼品，如端阳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春节送猪肉、油炸糕等。另外，一如旧俗，每年二月和八月上旬的丁日，各放假一天，叫做“祭丁”，即祭孔子之意。这天，学生各自给先生送现钱（款额不等，似乎最少一元，也有送三元、五元的），先生则给学生每人一份备好的食品（如麻花、刀切、蒸馍等）。“祭丁”是先生、学生都盼望的，先生可以收取一些钱，可补清贫生活之不足，学生可吃到零食，休息一天。

（三）

学校是采取新式的班级授课制，这无疑有利学生身心的发展。

日伪时期，也实行蒙汉分治，毕克齐的蒙校属巴彦塔拉盟土默特旗管，汉校属厚和市管，只是没有归绥县了。所设的统一课程为日语、算术、修身、体育（一、二年级为游戏）、图画、唱歌、汉文，蒙校学生学蒙文。

有升留级制度，计分采取百分制，六十分及格。每周授课六

天，星期日休息。

蒙、汉校均收女学生，男女混合编班。

当时十分强调决战意识的教育，这是日寇侵华期间奴化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实际就是灌输其军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精神，只是给它罩上了“建设蒙疆”、“扶植邦民子弟”、建设“王道乐土”的外衣而已。这种精神除溶于教材之中，还通过“训话”的方式进行。然而这种教育除去死心踏地地为日寇卖力的极少数“监督官署”派来的汉奸而外，绝大多数教员是抵制的，他们平时并不对学生进行这种教育。

另一门被大家抵制的课程为日语，学校借口缺乏教师暂停日语课，学生受家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心理上对日语也不感兴趣，日语课的开设实际只有形式。

个别教师在汉文课上除教课本而外，还加授些儿歌、古诗。低年级教学生学《蜘蛛的自述》，其中有“堪笑春蚕，吐丝自绑，怎及我经纬伸长”的话语。高年级则教学生读《木兰诗》。学生对这些附加课很感兴趣。

1943年（成纪738年）巴盟师范事件中，毕克齐关帝庙的汉校中，王云卿、李老师（此老村人，想不起名字了）被捕，王死在狱中，李后来取保释放，但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出狱后抑郁而死。另一位王润老师有人给通了风，连夜逃回农村，一直隐居到1945年抗战胜利。

学生去向。真武庙蒙校学生四年级以后，少数学生去厚和市土默特旗小学，继续读五、六年级。关帝庙汉校学生毕业后，少数学生去厚和巴盟师范学校、巴盟实业中学（其实是一个学校，在梁山街）学习，大多数学生各回各家了。

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我们可以拿当时的人口做个大致的估计。1945年，毕克齐全镇人口为10,343人，学龄儿童按百分之八计算，应为827人。当年在校学生（包

括私塾学生)约190人,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有百分之七十七点一的适龄儿童未能入学读书。

(四)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于10月份毕克齐蒙汉两所学校同时复校。真武庙蒙校只一位教师(锡振华),学生无几。关帝庙汉校有教师三、四人,其中有一位山西人叫周耀庭,其余不认识,学生报名的不多,大致编了一下班,并未实际上课。

民国三十五年(1946),两所学校同时正式开学。蒙校有教师二人,锡振华负责,另有教师张存福一人,工友一人,学生三十名左右。后来又有毕镇附近十来人要求入学,旗政府派来另一名教师,四个年级分两个教室复式上课。所授课程为公民、国语、蒙语、算术、手工、唱歌、体育等科。

关帝庙汉校因私塾均停办,学生大量要求入学,乡公所指定王润负责学校工作。王老师毕业于归绥一中(高中,1934年毕业),抗战前曾任教于归绥市省立第五小学。因为有同学关系,他邀集了一批高质量的教师。

张万鹏,毕克齐人。此人为人和善,有多方面的才能,精于数学,能书善画,上学时被同学们称为“张万能”。祖上曾开药店,他本人也能诊脉处方。开学后任高级级任教师,五、六年级复式,在正殿教学。正殿中泥塑神象前边加一道隔扇,隔扇前。墙上抹一块黑板。学生们下课后还进入殿内在供桌上打乒乓球。

许德隆,毕克齐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七·七”事变前,学校转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办西南联大,他走到青岛被日本人拦住,回到家乡,八年抗战在家中赋闲。许先生小个子,连鬓胡,胖胖的,上学时一次看《西游记》(无声电影),影片中给牛魔王端饭的佣人,酷似先生,同学们以后便亲切地叫他

“许厨子”。他为高级科任教师，教自然、史地等课。

傅守仁，本镇人，字雨卿，毕业于归绥一中（四年制初中），小于张、许二先生约十岁，当时二十四五岁。傅先生秉性聪慧，有过人的记忆力，写一笔不错的柳体字，讲课略带口吃，但效果好。先生有偏爱好学生的小毛病。任三、四年级（复式）级任。

二年级级任教师郭丕明，小古城人，毕业于巴盟师范，爱好体育，有较好的音乐基础，业余爱好晋剧清唱，镇里唱社戏时他还登过台呢。

一年级级任王金，大毕克齐人，是个顶老实的好人，和学生关系极好。体育教师解守功，文化不高，篮球打得不错。

课程设置，初小与蒙校相仿佛，又开蒙语，高小多自然、史地两门。由于不少私塾转入的学生汉文程度较高，再加学生年龄结构特殊，教学很难进行。除上统编教材而外，还另授一些课外知识，如四年级加授历史，教材由傅老师自编，学生学得很有劲。五、六年级还选学一些古文及诗词，《吊古战场文》、《长恨歌》等诗文，同学们都背得滚瓜烂熟。

当时办学条件极差。关帝庙的格局是这样的：正殿三间，檐下横三个匾额，中间写着“浩气凌云”，左边为“威镇华夏”，右边为“忠心赤胆”。院狭长，中间一个牌楼，东厢房三间，三、四年级教室；两厢房三间，一年级教室。东厢房下边的一间为厨房，对面的一间西房为办公室，教师办公拥挤，批作业就去各自的教室；这也好，边批改，边给学生讲解，收益更高一些。牌楼正中间悬一横匾，上书“端品励学”，柿黄色底子，绿字，大约是寺庙办学后挂的，记不得年份了。下东厢房两间，二年级教室，两间下西厢房是危房，空着不用。庙门两侧为钟鼓楼，庙门正中竖挂“关帝庙”一匾，字形略小。庙有个东跨院，是空着的，可以做操、上体育课，再往东便是民房了。庙西边是一块园

子地，比庙院地面低了不少。庙门前东西一条街，即关帝庙街。庙门对正有戏台、戏场，戏场西端为一篮球场。学校只有两颗篮球，几根跳绳用的绳子，手风琴也是1946年下半年才添置的。

学校设备虽然简陋，但并不影响开展活动。记得在傅、郭二位先生的指导下，还组织了学生会，开展学生自治活动，维持秩序，领队喊操，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王润校长倡议，由傅守仁先生作了校歌歌词，郭丕明先生作曲，很快便教会全校师生。其歌词曰：

阴山苍苍，
田野茫茫，
榆柳相映，
绿水游中央。
呈现大好河山，
塞外之风光。
“端品励学”，
吾侪之榜，
朝夕锻炼，
健身强。
勤劳勇敢，
互助至诚，
使此种精神发扬。

教师的待遇是微薄的，主要特点是没有保证。蒙校经费及教师薪金由旗里下发，虽不能定时，倒还能定量；汉校的经费及教师薪金既不定时，又不定量，因为是由乡里拨给的。每月乡公所拨给学校小米，分派给各保，各保又派给各甲，最后各甲派到户。学校派工友到各户收米，收回来分配给教师。有些刁户，用种种借口，一推再推，总是不给；有的贫困户，自家还经常断炊，本来就拿不出，这可难坏了校长，跑乡公所，跑保公所，跑

大户。老师们说：“泽普（王润字），小心跑断老腿，磨破老嘴。我们是穷教员，你办的是饿学校。”大家哈哈一笑了之。先生们意在办学，并不计较眼前的得失。

（五）

1946年下半年，张万鹏先生应聘去归绥中学任教，许德隆先生应聘去了青年进修班（与正风中学同院），傅守仁先生也被归绥市恒昌店巷女子小学请走了。王润先生又请来两位教师，一位乔介林先生，毕镇人，北京师范大学肄业，一位高之汉，兵州亥人，人们叫他“算破天”、“高三汉”。二位学识都不错，只是都有轻微的精神病，常对学生发脾气，王校长怕他们一怒之下体罚学生，不久便辞退了。后来又请来刘巨巢（毕克齐小古城人，从后套回来）、任志盛（本镇人，巴盟实业中学毕业）、许绥（许德隆先生长子，巴盟实业中学毕业）。

由于要求上学的日益增多，这年下半年有两所私立小学酝酿成立，一所是一贯道办的“忠如小学”，另一所是天主教办的“崇德小学”。这两所学校都在1947年3月开学，满足了儿童入学的要求。其中“崇德小学”的成立是费了很大周折的。

天主教归绥教区派神甫高若山（后套人）1946年下半年分别到察素齐、毕克齐筹建教堂，顺便办学校，办学校是为了建立教堂。听说察素齐比较顺利，办起了“崇仁小学”，即现在的察素齐第二小学校址。毕克齐则引起以李福田为首的地方绅士的反对。李福田，名存善，福田是字，蒙古族，住抹泥巷子，毕镇绅士之首，文盲，很会说话，从言谈上听不出他并不识字，谈古道今，引经据典，派头十足。少年时练过武功，身体清瘦，三角眼，走路很有精神，据说义和团反对洋人时，他练过“神兵”的功。李极力反对在毕克齐建立洋教堂。高若山经过多次的试探性

拜访和谈判，都不能奏效。天主教的来头也不小，他们和省里、旗里、县里都有来往。归绥教区副主教白祥（磴口人）善于交际，曾与主教穆清海（比利时人）及集宁教区主教樊恒安（中国神甫）在归绥市创办“恒清中学”，被推举为“恒清”第一任校长兼校董事会常务理事，经常出入绥远省政府，与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也相当熟。高若山在毕克齐碰了壁，回归绥向白祥作了汇报，白先后拜会了归绥县县长杨凯南和土默特总管荣祥，并请荣祥先生（他也是“恒清中学”董事会常务理事）出面说情，荣派旗政府教育科长锡子玉（锡琨，阎桂房子人，蒙古族）专程对李福田做了工作，最后毕镇的士绅们讨论决定：只许办学校，不许建教堂。实际上这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作法，办学和建堂本来就是一回事。1947年“崇德小学”还是开学了，校址即现在毕克齐第一小学。

“忠如小学”的建立虽也遭到地方士绅的非议，但他们认为“一贯道”只不过是歪门邪道，根本不放在眼里，且教师多系本镇青年，很快便被同意了。校址在头道街衙门巷口路南的大院内。

这两所学校都是初级小学，与公立学校使用同样教材，学生都不多。

至此，毕克齐有了公、私立小学四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百出头，约占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1947年7月，关帝庙汉校第一届高小学生毕业，毕业学生共三十六名，其中二十多名升入归绥市的中学或师范，其余因年龄较大，家境较困难，回家参加了劳动。

真武庙的蒙校后来逐渐扩大了规模，由复式改为单式教学，校址迁到井儿街的药王庙，就是现在的民族小学。

关帝庙的汉校后来演变为今天的第四小学，这所学校历史最久，民国十三年（1924）建立，对毕克齐的教育事业有不可磨灭

的功绩。

崇德小学解放后被政府接办，改为毕克齐第一小学。忠如小学后来并入奶奶庙的第二小学。

民国三十四年到三十六年（1945—1947）这三年，是毕克齐教育由复兴转向发展的三年。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一，结束了封建的教育方式——私塾，走向了现代化的班级授课——学校；第二，学校从初具形式的复式教学，转变为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第三，学校布点合理，镇东北、西南、西北、东南各有一所学校，有利于学生上学读书。

责任编辑 孙 才

记土默特旗农业大学

云 志 刚

土默特旗农业大学是一九五八年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建立起来的一所新型农业大学，在区内有过一定的影响。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这所学校的先进事迹。一九六〇年选派代表（郭崇道）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创办农业大学是为了培养土默川地区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的基层干部的需要。办校三年多的时间确实也培养了一批农牧业战线上的基层技术骨干，为土默川农牧业的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这些学生在基层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现在呼市地区，包括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郊区和土默特右旗，许多单位的中下层领导干部就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

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农大创办是白手起家的，既无校舍又无教师，更没有办学经费。办学人员是凭着一种良好的愿望和一股极大的热情昼夜奔波，真正体现了抗大的精神和延安作风。经过一段筹备，在内蒙古党委、呼和浩特市委和旗委的正确领导下，加之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学校克服了不少困难，终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在萨拉齐北端大青山下的北只图村正式开学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胡昭衡同志，在学校的创办过程中，跟办学人员

商讨学校宗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师资来源以及经费解决办法等，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开学之后，教师缺少，自治区有关部门积极支援，旗农业部门也从农村抽调回了一批正在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干部，行政人员由旗各部门指名抽调。内蒙物质储备管理局将北只图村137处的房屋也暂时借给了学校使用。学生宿舍无床，就在地上铺上草垫凑乎，教学条件也极为简陋，教室没有课桌，学生就自制马扎加以解决。尽管如此困难重重，师生们的教学和学习热情都很高。一九五九年因137处房屋系战备用房，不能长期占用，农大就搬迁到呼和浩特市郊区大台什村原内蒙古农业学校的地址。

农大第一届招收了五百名学生，绝大多数是乡干部，也有少数返乡知识青年，学制定为二年。按照大专设置课程，在教学安排上把学年作了大体的划分，上半年讲授文化知识基础课，下半年讲授专业基础课，最后一年讲授专业课（包括实习）。

学校共设七个系，其中农学系六个（小麦、高粱、玉米、糜黍、山药、甜菜等），畜牧兽医系一个。农大受旗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业务教学方面同时也受内蒙农业厅、教育厅领导。

农大校长由旗委书记阎兆麟同志兼任，副校长郭崇道兼党委书记，副书记吴锡璧，校党委由七名委员组成。

党委下设八个支部，即教职工支部，农牧场支部，学生支部。校团委下设团支部六个，团委书记关继生。全校有党员二百五十多人，团员一百五十多人。绝大多数学生系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学校党政机构设二处二室一委，其负责人是：教务处教务长陈希贤，副教务长郝钟瑞；总务处总务长赵继周；党委办公室负责人郭诚；行政办公室负责人韩志高；学生会主席杨板仁，副主席白文宣、吕振兴。

教务处下设文化课教研室和专业课教研室九个，包括语文、

数学、物理、化学、政治、体育、植保、园艺、栽培、畜牧兽医等。

专职教师五九年前已陆续达到近三十人，五九年后最多时达到四十多人，总共教职工达到一百多人。

克服困难 渡过难关

大学办起来了，但各方面的条件仍然很差，如不解决势必要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师生员工的生活，也就难以使教师安心教学和学生安心学习。在学校的积极努力和旗、公社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首先解决了教学实验基地，旗农牧部门将北只图村的国营果园交给了农大领导，做为实习基地。之后又在只几梁大队建起了农牧场，配备了拖拉机、汽车、骡马车和各种农机具，购回了猪羊良种公畜，配备了兽医技术人员。既种庄稼又养畜，既生产又实习，既可为教学服务，又可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这样，对于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缺乏理论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层干部学员，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法是比较适宜的，学习效果也是好的，学生们感到很满意，并受到上级党政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赞许。

随着农大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教学设施逐步得到了充实和完善。演示实习显微镜达到每人一台，学生学的知识完全可以在实验室和实习场得到验证，真正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方针。

1960年8月首届学生四百八十多名按期毕业，发给了毕业证书。第二期又招生二百名，除在自治区西部地区招了一百五十名外，还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郊招了五十名。农业大学的声誉已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学校的教职员办好农大的信心也就更足了。特别是副校长郭崇道热爱教育事业，到处奔波、各方求援，平时在

他的办公室内是很难找到的。难怪有人说：“郭校长的桌子上灰尘足够一寸厚了”。

正当农业大学热气腾腾前进发展的时候，国家遇到了暂时的严重困难。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各级财政状况均很紧张，学校的经费得不到保证。只几梁农牧场在一九六〇年被洪水淹没，损失极为严重。农业大学的处境极为困难。

为了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八字”方针，农大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经有关领导批准，决定停办。

农业大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历程，然而它也是土默特旗教育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大事，是农业教育战线上的一朵花蕾。

责任编辑 郝钟瑞

土默特左旗察素齐

第一中学简史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随之对教育事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和我旗各族学生的升学要求，土默特旗人民政府于当年决定在太平庄中心完小和毕克齐第三小学分别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各两个班。

1957年，旗政府决定在察素齐镇筹建一所完全中学。当年6月筹建，于9月底竣工。建成教室三栋，宿舍三栋，传达室1间，厨房、食堂一栋，师生厕所一栋。政府又于9月份下拨经费20,400多元购置了体育、音乐、美术等教学设备和办公、卫生、饮水等设备，于10月1日正式开学。定名为土默特旗第二中学。

建校初，共有教职工36名（专职教师16名），学生470名（从太平庄和毕克齐三校接收回来的4个班学生共222人，新招收初一新生248名编为5个班——后来又合并成4个班）。

1958年，遵照政务院关于“学校名不应按顺序排列，而应以地区名命名”的指示，我校改名为土默特旗察素齐中学。

从1960年开始办起了高中班。师资力量逐年有所增强，领导班子进一步得到充实，教学质量明显提高。1966年察素齐二中（原）成立后，学校更名为察素齐第一中学。

至今，察素齐一中建校已整三十年了。先后共毕业初中126个班，学生6,480多人；毕业高中班66个，学生2,729人。为高一级

学校输送了561名新生；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建设人才，为本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十年的历程令人鼓舞而又艰难曲折。察一中刚办起来后有朝气蓬勃兴旺发展的十年，“文革”期间，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了十年，碎粉“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又在改革中前进了十年。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如何端正方向办好学校必将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朝气蓬勃，兴旺发展的十年

建校的地址原是一个旧营盘和一片乱坟滩，占地面积为68,626.8平方米。全校师生建围墙，平操场、整校院、搞绿化，进行了艰苦的建校劳动，使学校面貌日渐改观。上级逐年拨款进行基本建设，增添教学设备，到1962年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在的规模。据1962年3月份统计总建设面积为4,738.67平方米。基建情况如下表： 见（171页）

共支出177,000多元。

有一般设备（炊具、办公桌、办公用品及学生桌凳915套等）价值28,285元；有音乐设备（钢琴、黑管、巴里冬、手风琴和各类号等）价值2,194元；有体育设备（联合器械、平梯、兰球架及各式运动服装等）价值10,936元；有各类图书11,030册，价值6,528元；有各种教学仪器1,956件，价值20,757元。另有校田95.9亩，农业生产工具1,924件，价值5,273元，工厂设备价值11,396元，医疗、交通及其它设备计值9,734元，为开展教学工作和勤工俭学活动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证。

这几年的领导班子比较稳定，领导力量较强。学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是张璠琦同志，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是云海同志。历年学校领导干如下表： 见（172页）

时 间	教 室		学 生 宿 舍		教 学、行 政 办 公 室		阅 览 室		工 作、午 间		其 它 建 筑		家 属 宿 舍	
	栋 间	平 方 米	栋 间	平 方 米	栋 间	平 方 米	栋 间	平 方 米	栋 间	平 方 米	栋 间	平 方 米	栋 间	平 方 米
1957	336	756										216	221	
1958	112	252										422	537.3	
1959	17	168					1	7168.12						
1960	112	276												
1961														
总 计	667	1452	791	1321.5	224	504	1	7168.12	220	309.75	638	758.3	115	225

时间	校 长	党支部书记	教导主任	总务主任	团委书记
1957	张璠琦(副)	张璠琦	孙长春 殷石麟	魏幼厅	常作义
1958	张璠琦(副)	张璠琦	孙长春、王永光(副)	"	常作义
1959	张璠琦(副)	张璠琦、王永光(副)	殷石麟	云德善	常作义
1960	云海(副)	云海(兼)史福(副)	殷石麟、丁守义(副)	云德善	刘福
1961	云海	云海"史福"	"	云德善	刘福、李林(副)
1962	云海	云海"史福"	殷石麟 丁守义(副)郝钟瑞(副)	云德善	"
1963	云海	云海"史福"	"	云德善	"
1964	云海	云海"史福"	殷石麟、丁守义(副)	云德善	"
1965	云海	云海"史福"	"	云德善	"
1966	云海	云海"史福"	"	云德善	"

这些同志在创立和建设学校当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成绩。总、教两处及团委也都配备了比较得力的环节干部。大多数年富力强，工作很有生气。如丁守义同志，他严格勤奋的工作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校的师资力量刚建校时比较弱，多数为专科和中师毕业，没有一个本科生。以后经过在职提高，调整调入，师资情况大为改善，据1966年统计，26名初中教师中不到大专文化程度的仅有9人；16名高中教师中不到本科程度的仅有2人。

建校初的教师任教情况是。

语文： 谢振宇、孙才、石乃新、王 道、贾永兴等

数学： 王正光、关 麟、白效文等

物 学： 王 锦

化 学： 丁守义

生 物： 景湘新

政 治： 王 茂、刘 福

历 史： 于恩源

地 理： 孙 芳

体 育： 王宏孝

音 乐： 刘 福

美 术： 杨泽民

其后，杨汝林、高全仁、贺志勇、于凤斌、荣竹田、冯一、赵 甫、赵静贞、刘竹奇、潘 孝、李焕文、吴均民、李 培、张亚利等教师调到察中，1961年又从内蒙古党校调来文宝，卢鸿仁、于碧霞、郑守恪、王锡林、荣振华和从内蒙古工学院调来了罗时健、曹金杰、李家植、王兆忠、卢金麟等具有大专学历的教师任教，师资状况大为改善。在那物资条件极差的“困难时期”都能任劳任怨地热情工作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1962年以后又先后调入丘谔兴、王慧筠、郝景林、陈木根、孙香明、吴秉衡、赵九

思、于润池、董惠杰、刘元俊、施沁、李文彬、姜明、邱明义、云兆瑞、宁大明等骨干教师，师资队伍不断充实更新，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同时，我校的体育活动很见成效。体育教师前后有王宏孝、潘孝、冯一、李培、荣竹田等同志。音乐教学也很突出，除了课堂教学很活跃而外还组织了歌咏队，小乐队等等。美术教学成绩也较好，还经常举办师生画展以激励大家的学画兴趣和丰富师生们的文化生活。

学校的教学状况，除1958年大炼钢铁劳动过多而受到影响外，其余年份的教学秩序一直良好。教学质量在1961年，1962年呼市地区初三年级毕业考试中双年连续名列第二。（1961年总均分为70.49分1962年总均分为64.5分）。以后在乌盟初、高中毕业统考中均名列前茅，受到上级的表扬，社会的好评和家长的信赖，成为大家所仰慕的治学比较严谨的一所完全中学。

附表二见（175页）

首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报考了呼和浩特等市的高中或中专，一部分劳动就业。

第二届毕业生因中专招生任务大，本校也要开设高中班，所以除168名应届初三毕业生外，在初二年级中挑选了年龄大，学习成绩较好，家庭生活较困难不能坚持上学的学生共92名提前毕业均被中专录取。应届生168人，高中录取100名，中专录取61名，仅有7名学生劳动就业。

其后五届也是大部分就地升学，一部分劳动就业（学校没有详细的记载）。

1、历届初中毕业学生人数统计表

时 间		班 次	人 数	备 考
入 学	毕 业			
1956	1959	1—4	220	这4个班是1956年先在太平庄和毕三校招收的 包括初二提前毕业考入中专的92人
1957	1960	5—8	260	
1958	1961	9—14	280	呼市地区毕业统考总分名列第二 70.49分
1959	1962	15—17	155	呼市地区毕业统考总分名列第二 64.5分
1960	1963	18—23	311	乌盟地区毕业统考总分名列前茅
1961	1964	24—27	190	"
1962	1965	28—32	171	"
1963	1966	33—36		“文革”开始，留校闹“革命”待到1968年才毕业
合 计			1,587	

2、前三届高中毕业学生人数统计表

时 间		班 次	人 数	备 考
入 学	毕 业			
1960	1963	1—2	71	升入高校42人
1961	1964	3	36	
1962	1965	4	46	
1963	1966	5—6		两班学生共84人“文革”留校，1968年毕业。
合 计			237	前三届毕业生中升入区外大学者13人升入区内大学者54人共67人。平均升学率为43.79%。

另外，在1959年9月到1960年8月，为适应我旗小学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我校开设了两个师范班。招考高小毕业生104名进行培训。毕业后由政府分配了工作。

在这十年里，师生关系和睦融洽，蒙汉团结亲密无间，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心情舒畅而愉快。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二、十年浩劫，道路曲折

（ 1966—1976 ）

“文革”风暴侵袭，极左思潮泛滥，使察一中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走过了一段曲折而坎坷的道路。

“文革”一开始，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就被打乱，学生停课

闹革命，出去大串连，纷纷组织红卫兵战斗队、司令部，对大部分领导干部和教师进行了批斗和管制劳动。在“挖黑线肃流毒”、“挖新内入党”的过程中更是残酷打击，武斗成风，致使不少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并将我旗、呼市和自治区的部分领导干部揪到学校关押管制，刑讯逼供、批斗示众。祭一中在社会上人称“第二监狱”其严重性可想而知了。

这个时期，学校的基本建设基本没搞，只是1970年在旗军管组的强令下，把学校操场计7,200平方米的地段划给轴承厂使用，让轴承厂协助学校建起一座640平方米的简易礼堂。致使现在的操场狭小，活动比较困难。至于所有校舍原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加上年久失修、红卫兵造反破坏逐渐成了破败不堪的危险房屋。图书、仪器损失不小，不仅新东西没有添，旧设备也大伤了元气。学生课桌损失惨重，造成其后十多年桌凳短缺，最困难时只好让学生从家里拿上小板凳到学校上课。其实，这个时期的经费数额并不少，而是将宝贵的教育经费用在了支持革命造反上，用在了所谓大办工厂开门办学上。总之，浪费加破坏，使学校的教学设备受到了严重破坏，直到现在也未得到根本恢复。

这个时期的领导成员几经变化、情况复杂。最初是造反派夺权、掌权，接着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后是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这些人大多不懂教育，只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大批判，搞开门办学，学“朝农”、办“共大”，“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经折腾，浪费了钱财，耽误了人才，造就了一批“只有文凭、没有水平”的毕业生，给教育事业造成了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附：学校领导干部表 （1966—1976）

学校领导干部表（1966—1976）

时 间	校 长	党支部书记	办公室主任
1967	史福、王茂、（副） 张银魁（副）		
1968	史福、张银魁（副） 王茂（副）		
1969	史福、许明义（副） 王茂（副）		
1970	郭荣珍、王勇（副）	郭荣珍、王勇（副）	李 林
1971	王勇、郭荣珍（副）	郭荣珍、王勇（副）	李 林
1972	”	”	”
1973	”	”	”
1974	”	”	”
1975	郭荣珍、王勇（副）	郭荣珍、王勇（副）	朱 光
1976	张光普、李林（副） 马呈玖（副）	张光普、李林（副）	刘建明、刘俊（副）

附：学校领导干部表（1966—1976）

教导处主任	(后勤)总务主任	团委书记	备 注
			造反派夺权掌权。冬季成立革委会
			5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
刘福(负责)	吴国义 高天发(副)		8月复课“闹革命”。二中并入
刘 福	"		改班级制为连排
刘 福	"	王勇(兼) 李林(副)	制。
陈自成 白士新(副)	高天发(副)	李 林	
"	高天发 郑兆嘉(副)	"	二中成立又改名为察一中
"	"	"	工宣队再进察中
"	"	李 林 朱 光(副)	办起农业机械、农业技术、理论写作等班
白士新 冯一(副)	高天发	李 林 何天明(副) 刘 俊(副)	

这一时期的师资队伍变化很大，师资质量急速下降，原来的骨干老师（即所谓的“牛鬼蛇神”）先后调离学校，高等师范院校没有毕业生可分配来任教，只好大量调入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员教高中，不足部分就聘用从前的初、高中毕业生来校临时代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十多年。

这期间来校任教的教师有：

- 语文组： 阎秀珍、赵文荣、李大彬、陈 宏、梁召女、
崔 勇
- 数学组： 李羲洛、白士新、冯志明、李杰英、赵国华、
朱鸿津
- 政治组： 郝 磊、朱 光、王正棠、赵兵元、方进狱、
刘 俊、郑玉林、陈银刚、
- 物理组： 康启超、张书贵
- 化学组： 陈敬堂、杨淑梅、朱秀珍、彭 清、李树宽
- 生物组： 郭振华
- 外语组： 潘鲁全、赵德成、王路易、吴爱兰、高丽华
- 美术组： 云雪冰、史富程
- 体育组： 景延陶、高罕兵、王玉宾、王维业、李维亭、
云珍明等

学生们中“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流毒很深，读书学习的风气极差。老师们深怕受批判，深怕被扣上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右倾回潮”等大帽子，不敢抓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不敢进行严格的成绩考核，教学无计划，教材不固定，质量无要求，随心所欲，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育规律可言。新生来源无关可把，混够年限毕业，只有文凭，没有水平，只讲数量，不求质量；交白卷堪称英雄，弄虚作假反以为荣。败坏了风气，压抑了人才，使教育事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留下了多年来难以治愈的恶性后遗症。

附：历届初中毕业生人数统计表（1966—1976）

时 间		班 次	人 数	备 注
入 学	毕 业			
63—65	1968	33—46	约700人	66、67、68三届同于68年毕业下乡
1966	1969	47—54	394	上山、下乡。69年二中并来两届八个班
1967	1970	55—60	约300	其中有二中来的四个班
1968	1971	61—64	200	
1969	1972	65—68	200	
1970	1973			
1973	1976	69—72	240	
合 计		40（班）	约2,034	71、72年没招初一新生。所以74、75年没有毕业生。

历届高中班毕业生人数统计表（1966—1976）

时 间		班 次	人 数	备 注
入 学	毕 业			
1963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4	1968	5—9	232	
1965				
1970	1972	10—12	135	新编1—3班、即1连(1排—3排)
1971	1973	13—18	297	" 4—9班
1972	1974	19—26	427	" 10—17班
1973	1975	27—32	290	
1974	1976	33—34	123	
小 计		30个班	1,504	

这期间学生的去向是城镇户籍的多下乡，农村户口的均返乡。初中毕业生中的一部分升入本校高中。

1971年、1973年、1976年共办了三期短期师资训练班，为克服当时我旗中、小学师资严重短缺的困难起了缓减作用。大致情况如下：

①、1971年7月12日—1971年10月25日，办初中师资训练班一期招初中教员100名。文科、理科各一班。

②、1973年4月20日—1973年8月15日，办了一期理化师资培训班，招高中毕业者49人，结业49人。，其中原为民办、代课教师者均转为正式教师。

③、1976年12月—1978年8月，办了一期社来社去师范班。招收初、高中毕业生54名分为文科、理科各一班。毕业后回原地任教。1980年均转正。

三、拨乱反正、改革前进

(1977—1986)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察一中经过拨乱反正、恢复整顿在新的形势下改革前进，各方面均有了起色和发展。首先的困难是校舍破烂，设备不全，办学条件十分困难。几年来经过上级拨款和自筹经费，教学设备逐步充实，学校面貌有所改观。1977年以来，上级共拨维修费22万多元，自筹经费约3万元，先后新建教室两个，改建教室三栋；宿舍二栋；扩建了食堂、新建了教师宿舍二栋，总建筑面积约为2,474平方米。新增添教学仪器244种，1132件，合款17498元。基本上满足了教学实验需求。新增添图书1,723册，每年订阅各种报刊60多种，为开展教学和阅览活动创造了条件。文娱用品和体育器材逐年有所添补、学生课桌虽有三分之一是破旧的但也基本配齐。教师的办公用品也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对干部“四化”的要求，学校领导成员几经变化，作了较大的调整。（表见184—185页）

这些同志，大都是多年从事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熟悉本行，富有经验的同志。他们在不同时期，都为拨乱反正，整顿学校端正办学方向，提高教学质量，改革领导体制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处室的环节干部也陆续提拔任命了一些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他们大都有事业心强，密切联系群众，精力旺盛等优点，是办好学校的中坚力量，也必将锻炼成为一批较好的学校领导骨干。在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之后，按照旗教育工作会议的部署，学校从1985年起实行民主选举校长，建立了教代会。初步形成了校长全面负责，党支部监督保证、教

时 间	校 长	党支部书记
1977	张 光 普 李 林(副) 马呈玫(副)	张光普、李 林(副)
1978	张 光 普 马呈玫(副) 史步云(副)	张光普、史步云(副)
1979	史步云(副) 马呈玫(副) 吕 斌(副)	史步云、吕 斌(副)
1980	"	"
1981	吕 斌(副)、郝锺瑞(副)	吕 斌(副)
1982	郝 锺 瑞 孙 才(副)、孙长春(副)	宁大明(副) 云文彬(副)
1983	郝锺瑞、孙 才(副)	宁 大 明
1984	孙 才、李广忠(副)	宁 大 明
1985	"	宁大明、孙 才(副)
1986	"	"
1987	孙 才、李广忠(副)	宁大明、孙 才(副)

办公室主任	教导主任	总务主任	团委书记
刘建明 刘俊(副)	白士新 冯益(副)	高天发	李林
侯学良	孙才 韩林书(副)	刘俊、冯一(副)	刘俊(副)
"	"	冯一(副)	"
侯学良、王伦	"	曹国珍 冯一(副)	"
王伦	"	"	"
"	"	曹国珍	"
"	孙才(兼) 韩林书(副)	曹国珍 祝如章(副)	"
"	"	"	"
"	韩林书 连仲璧(副)	李广忠(兼) 祝如章(副)	赵月恒
"	"	"	"
王伦	韩林书 连仲璧(副)	李广忠(兼) 祝如章(副)	赵月恒

代会民主管理的新的领导体制。这对加强校长的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学校制订了各级各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宣传教育，考核评比逐步予以落实。不过在好多方面还处在逐步摸索，进一步适应和完善的过程中。

建立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是办好学校的最基本条件。这方面的情况虽然逐年在好转但仍存在着差距。

1977年以来，做了大量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的工作，处理了“文革”中的不少遗留问题，为38人彻底平反了冤、假、错案，陆续为50户教师解决了住房问题，安排子女30人，家属就业17人，办理农转非的共12户28人。有10名教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资调整和增加生活补助以后，教学人员的月平均收入由1965年的54元增加到1986年的103.8元。广大教师从极左路线下解放出来，心情比较舒畅，工作积极性得以进一步调动。

原在一中工作，在“文革”期间因工作关系或因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调出的骨干教师如李家植、罗时健、王兆忠、高全仁、于凤斌等同志又先后调回。从1978年改成重点中学后，又先后调入一批骨干教师，如孙运志、白贞、郝静珍、连仲璧等，教师状况大为改善，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学校风气渐渐好转。

1982年以来，察三中新建后，一次就将任高中毕业班课的七名骨干教师调走，调出区外一人（罗时健），调旗教研室二人（赵国华、陈宏），车祸死亡一人（李焕文），调政府机关二人（武振荣、崔岩军），再加上高中改为三年制，高中教师短缺严重，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

目前，我们可喜地看到一批学历虽低的老高中生已成熟起来变为骨干力量，一大批进修回来或新分配来的专科毕业的青年教师正在实践中锻炼成长，老教师传统的严谨教风得以发扬光大，教师队伍后继有人，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可望逐步形成。

语文	郭学诚	赵维武	付俊良	李振仕	邬文萍
	白莹琦	睢建基	王守义	王 荣	郭凤枝
	祝如璋	郝万慧	杨 茂	尹俊深	任生莲
	王德锁	刘刚秀	郝凤英		
数学	翟明亮	潘元博	董如英	杨秀珍	王福仁
	李树才	黄瑞香	何锦瑞	周瑞祥	王满怀
	栗军军				
政治	白 贞	孙运志	杜敬理	李宏宇	刘秀珍
	刘惠生				
物理	段云霞	韩文仙	贾凤林	王怀怀	杨满林
	刘全应	孙 轶	杜建园		
化学	郭志军	连仲璧	李金牛	边文清	李兴中
生物	冀和平	张金正	阎瑞清	张 杰	
外语	刘 蓄	李小凤	孟存福	武尉静	李凤珍
	骆彩霞	高柱柱	宗玉毓	董贵保	延秀生
	孔繁义	张桃生	周俊英	张耀田	
体育	渠文玉	张耀光	张瑞金	王 俊	
美术	陈铁柱	张伍科			
音乐	阎瑞枝	武凤梅	石建波		
历史	赵前宽	郝静珍	贾 平	马耀飞	张秀芬
	赵维武(语文)				
地理	史富程(美)	郑 通	孟建国	张庆云等	

人。

至今，旗直属中学有四所，以及职业学校，进修学校，这些学校的校级领导，环节干部，骨干教师不少人都曾先后在察中任过教，还有一些同志是一中毕业的学生。一中无私地支援了兄弟学校，一中毕业的学生遍布各地，不少人已成为领导或骨干。社会上有人把察一中赞誉“土旗文化的摇篮”，我们要引以为励，也

引以为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深入进行，学校逐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努力端正办学思想，整顿教学秩序，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创造良好的条件。学校狠抓了《中学生守则》的贯彻，坚持开展“学雷锋、创三好”、“五讲四美三热爱”、“创文明单位”等活动，形成“全面发展，严格要求，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的良好校风，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人才。近年来按照改革的精神，学校注意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加强年级组、班主任工作，改进政治课教学。形成多渠道、多层次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局面。学校召开有关会议注意研讨新形势下学生思想工作的新特点，改进教育工作，倡导采用开放式、引导式、自理式的方法，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结合，尽力克服一般化、形式化、简单化的错误做法，寓思想教育于各种教学实践活动当中，增强趣味性，知识性，初步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党和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教师的政治、生活待遇逐年有所改善，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这极大地激发起广大师生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一年比一年明显地好起来。学校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加强教学管理做了大量工作，教导处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严格了学籍管理，对教学提出了常规要求，加强了对教学情况的考核与检查。1978、1979两年高中每年从全旗择优录取四个班，在此期间初中也试验性地从全旗择优录取过部分班，学生素质明显提高，学习风气较为浓厚，这几届学生毕业后的升学率较高，初中升高中最高的1982年达到80%。高中升大、中专的升学率，最高的1981届曾达到41.47%。从单科成绩看，最好的1979年，在呼和浩特地区按均分比较，文科地理名列第一，数学名列第二。理科的政治、物理、化学名列第四。1982年，全国数

学竞赛中，我校学生常秋生获奖。1986年全国物理竞赛中，8班学生岳峰在呼和浩特地区名列15名，荣获二等奖。察一中前几届毕业生中已有10多名当了研究生或攻读博士或留学在外。

兹将近十年来的学生毕业、升学情况统计于下：

历届初中毕业生人数统计表（1977—1987）

时 间	班 次	人 数	备 注
1977	73—80	230	（两个蒙古族学生班转民中） 升学130人占56.5%
1978	81—84	216	升学142人 占毕业人数的66%
1979	85—92	505	" 162人 " 32%
1980	93—96	231	" 140人 " 61%
1981	97—100	211	" 168人 " 76%
1982	1—4	195	报考188人升入高中155人 占毕业人数的80%
1983	5—8	238	升学114人 占毕业生数的54.5%
1984	9—12	228	" 162人 " 71%
1985	13—18	351	" 143人 " 41%
1986	19—22	224	" 116人 " 51.7%
1987	23—26	226	（待补记）
合 计	54（班）	2,865	

注①、101班开始编为新1班，以此类推

②、三十多年来共126个班的初中生毕业。学生人数约为6,480多人。

③、高中毕业了66个班，人数约为2,729余人，升入大专、中专者共为561人，不包括今年的升学人数。（见表191页）

1978年办了一届师训班，调集教师共116名分数、理、化三个班。从3月份培训到7月份，结业后，各回本校任教。

同年6月5日至7月15日举办了一次土左旗应届高考生培训班。抽调尖子教师和各校毕业的尖子学生（按毕业生的10%抽调）进行高考培训。

（我校历届毕业生的“校友录”，学校准备着手调查整理汇编成册。待续。）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校除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外，同时也大量开展文体活动，注意提高学生的体质。从1980年起为学生建立了健康卡片，对学生进行定期体格检查。“二课二操二活动”坚持始终，并注意提高质量。传统项目的运动队训练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全旗中、小学运动会中，1980年初、高中组均获总分第一名，在其它年份的各种比赛中也大都名列前茅。体育达标活动开展较早，1985年达标率已上升到70%以上，曾被评为呼市地区开展群体活动的先进集体。学校近几年来为落实体育卫生两个暂行规定做了不少工作，通过旗、市两级验收认为基本达到要求，并颁发了合格证书。另外，每学年都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和美术书法展览，检阅和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察一中办学思想比较端正，工作比较扎实，在社会上广泛受到好评，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1978年被评为市、旗级先进集体，由市委颁发了奖状，旗委授予了一面锦旗。

1979年又被评为市、旗先进集体，由市政府授予锦旗。旗

② 历届高中毕业学生统计表 (1977—1987)

时间	班 次	人 数	注
1977	见76届	见76届	恢复高考,升入高校仅5人
1978	35—36	104	报考87人录取17人
1979	37—40	237	报考214人、上线76人、录取70人,系大专30名中专40名,占毕业生的29.5%
1980	41—44	199	上线101人、录取77人,系大专50名、中专27名,占毕业生的38.7%
1981	45—48	217	上线94人、录取90人,系大专68名、中专22名,占毕业生的41.47%
1982	49—52	217	上线64人、录取58人,系大专50名、高中中专8人 应届36人占应届生的16.82% 重读22人、占重读生的35.5%
1983	53—56	188	连同补习生共报考344人,上线149人、录取131人,升学率为38%
1984	57—58	110	三中择优录取后,本届毕业两个质量很差的非重点班升学率为零
1985			本届没有毕业班(改为三年制)
1986	59—62	216	大专录取34人、高中中专录取13人,共占毕业人数的21.7%
1987	9—10 63—64	214	本届高考尚未进行,待续
合计	32	1,702	

委、旗政府授予一面锦旗，上书：“为四化建设再立新功”。

1980年，旗教育局授予锦旗一面，上书：“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同年，被评为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旗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被评为呼市群体活动先进集体，由市体委授予锦旗。

1981年，被评为旗先进集体，旗委、旗政府授予锦旗。同年，我旗举行的旗直属中学生篮球赛中，男女队双获冠军。

1982年，由呼和浩特市科技学会、教育局授予锦旗一面，上书：“奖给为市培育全国数学竞赛者的母校——发挥数学的魅力”。同年十月被评为旗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1983年，旗委、旗政府颁发给“先进单位”奖。

1984年，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体委奖给“学校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奖旗。

同年，旗委、旗政府颁发给“模范集体”奖旗。

同年，旗运会上荣获初中组总分第一名奖，和“精神文明代表队”奖旗。

1985年，旗委、旗政府颁发“工作成绩显著”三等奖。

同年，获教育局、文体局发的中学生足球赛冠军奖旗。

1986年，旗委、旗政府颁发给“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奖旗。市教育局、卫生局、体委颁发给《学校体育卫生验收合格证书》和旗教育局、卫生局颁发的《学校体育卫生验收合格》的证书。

同年，市政府发给“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奖。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学校组织广大教职员工认真学习文件精神，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以“三个局面”为指针，在改革中探索前进，以求取得更大的成绩，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四有”人才。为此，各教研组在大力改革陈旧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还抓了

系统的教学研究，努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学校分别制定了教研组工作、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等三个考核细则，谋求通过量化的考核办法，建立常规性的科学管理办法。但目前由于领导力量还较薄弱，改革措施落实不力，前进的步子还迈得不大。要使这所具有三十年历史的学校在新形势下不负众望大展宏图，各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切实加强。

（察素齐一中供稿）

责任编辑 李林

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 学校的沿革

云文瀚 荣世德

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学校的校名，是在1977年确定的。距今只有十一年的时间，但她却走过了兴废盛衰、艰苦奋斗的一百七十多年的历程。她没有记载，也缺少系统的传说。怎样延续到现在，怎样走过这个历程，到目前为止还不大清楚。从清朝嘉庆年上溯，完全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给她的延续造成极大的困难。嘉庆之后，也仅仅有一个蒙、汉文造诣很高，村人尊称之为嘎把克什（姓名无考）的一个翻译故事留下一点传说梗概。这一梗概就成了把什书房（学校）的依据。她证明把什书房正式在公和寺（把什召，下同）院组成。嘉庆十七年到宣统三年整整一百年，民国到解放又是四十年，再加上解放后的三十八年，总计有一百七十八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远年难考，即连民国之后的近代，也多是从众知情人的口碑中取得的。有人说把什的书房尽是一些冬烘老头，好象算不得学校连接，其实就是这些冬烘先生延续了学校，延续了这里的文化，也烘出不少后代的“文人”。当然，冬烘先生确实有，而且数量还不少，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尺子去量古人，把非冬烘的也烘冬起来，似乎不太合适。

据传说：嘉庆年间，部里给察哈尔的来文里有“太阿倒持”一句。这“太阿”，意译不好说，音译，蒙古人弄不懂，于是派

人来把什求助于嘎先生。先生即时把“太阿倒持”以“虽有利剑，授人以柄”的意思译成蒙文，来人十分佩服先生学识高深。第二年察哈尔又派人来请他无论如何去察哈尔走一趟。先生推辞不过，去了。他只走了半年就回村了。在他临走时，把近村住在他家求教的学生和本村人一起组织到公和寺的东禅房学习，并指定负责教的人才走的，周村附读的人，都在书房食宿。有人问：“这事在嘉庆几年？”多伦五老人说：“记得书房里间后墙下放着一个大柜，柜里放着许多蒙汉满文书和历年所收学生米面柴炭的帐，其中有一本嘉庆十七年的学生伙食帐，这帐可能是初组书房时外村学生留下的。”这就是传说的全部，谈这话的是补音泰老人。

补音泰老人，村里通称补老爷。因为在清朝他担任过一度骁骑校，凡骁骑校以上的官，都得称“老爷”。补老爷，常年在呼和浩特住，只有在每年春节初六到十五这十天，他一定回村念麻尼（注1）。他蒙汉文造诣很深，村史他知道的最多。到目前为止，推求把什的过去迹象，这些片段的传说还是宝贵的依据。它可以推知把什的书房是从嘉庆十七年开始，以前多半是家庭附读的方式，家庭附读可能延续的时间较长。由附读到书房，由书房到民办公助的学校，最后才是公办学校。从学习内容上看，起先单学蒙文，清代加授满文，因为清朝规定凡学蒙汉文必须加学清文。其后经过“移民实边”，汉民大批出塞，无限垦牧，牲畜减少，蒙民穷困，人口锐减，汉民逐渐增多，社会上普遍使用汉语，私学里添了汉文课程，加授清文成了形式，学学字母，念念《圣语广训》就算了事。同治之后，机关行文也多用汉文。七默

注1：念麻尼——是把什村蒙古族传统习惯，在每年的春节初六日到十五日十天里，相约村中十几位至二十位老人，轮流到愿意在家组织经会的人家去办经会，三天、五天不等，由各家自行决定。经会每天只念一个上午，下午不念了，念时有一个休息时间，在这一时间里，以谈村里应兴应革的，以及有关村史的事为主。

特的念书人，每年只由书院选取一二名翻译和笔帖式，还得蒙汉皆通，此外只好回家当兵、当差、当喇嘛。有志青年，流向外地找出路，学习汉文逐渐加重，最后走上专学汉文的路子。“五四”之后，新学已盛，当地学校，还多诗云子曰。至民国十五年（1926）私学开始改为民办公助的学校，只在原课程外加了一门算术。到民国三十年（1941）之后，学校才改为官学，课程按教部课本进行。民族学校加授蒙古语文，还是后来的事。

当时的教师和学生，在家庭附读阶段，多为家长教子弟，深造才就教于学识修养较高的人，到后专学汉文期间，本村教师感到不足，多向周村聘请，也向内地约请。学生有常读生（连续十几年），有的念二三年就不念了，有念冬书的，也有念几个月的，情况较为乱杂。

把什学校校址，以公和寺、老爷庙为主，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迁到别处的。如尧先生带家眷，公和寺、老爷庙住家不便，在后场、东场设书房。也有因公和寺驻兵，学校迁到户家院。也有因为学校（包括私学）多了，只能在户家院设。后来办起了蒙汉两所学校。公和寺是蒙人办的，称蒙校，老爷庙由汉社办，叫汉校。学校分蒙汉，学生却蒙汉皆收。从大体上说，蒙校师资质量好，念大书开讲的多在蒙校，汉校差，启蒙学生多罢了。

清代可以考知的教师和学生，不是从嘉庆间开始，因为传说里没有提到教师学生的名字，无从查考，嘉、道间仍属空白，到咸丰年间可以考知一二。

早期：1853—1869（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所学以蒙汉文为主，兼学清文。教师无考，学生有：补音泰（即补老爷）、旺旺、苏吉泰、富珠理、多伦五、圪什泰、唐贡、三红、阿力宾、二毛、六斤、海亮、树圪东等。这里单提提树圪东。

树圪东姓卜，汉人，总共念了两个冬书，因在开始上学时闹了个红猴判官的笑话，树圪东就流传下来了。树圪东是专学汉文

的，一上学自然是《百家姓》。他学到“云苏潘葛”时，好赖记不会，先生火了，让他一天就念这一句，树圪东只好口念心记。先生外出，同学们玩得挺热闹，他只顾看热闹不念了，先生一进门，大家归坐朗读起来，树圪东却把“云苏潘葛”忘记了。先生不高兴，他不敢问，同学们都念着，他不好问，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忽然想起个“红猴判官”，于是就念起“红猴判官”，有些同学听出他念“红猴判管”一鬼串，大家都不念了，树圪东却在念“红猴判官”，引起哄堂大笑，传为笑话。从这里可以确知当时是蒙汉合校的，当然，汉族学生不只是他一个，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批：1870—1901年（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七年）

这一阶段的学习内容，以汉文为主，蒙文为副，清文成了形式，只走走过场。当时学校分做两处。一为努尼老人招聘的尧先生（名不传），因他带有家口，书房初设后场，后迁东场。尧先生学识很好，教书也极认真，学生受益多，只教了三年，被呼市请走，在九龙湾设教，是个好先生。另一所书房在公和寺院里，由白先生掌教（名不传），学识也不错。这时学生，在后场的有：伊力更、吉力更、春风、富森阿、崇权、二桃（女）、崇廉、海宽等。在公和寺的主要有富元、银宽、珠海、常在、记心儿、吕森、白仁、小二子、成燕、米全、金泉等三十多人。后场书房没有汉人，却有把什第一个女学生。金泉、米全是汉族。

第三批：1902—1917年（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六年）

这一阶段已经专学汉文了。教师为李恒泰、章元。学生主要有根成、云泽（乌兰夫）、奎璧、康二娃（康济民）等三十多人，其中有外村人二人，汉人一人。

第四批：1918—1931（民国七年至民国二十年）。

这一阶段学校有三处，公和寺一处，公和寺西隔壁福在老汉新房院里一处，汉社在老爷庙另立一所。公和寺学校叫蒙校，

老爷庙学校叫汉校，把什蒙汉分校即自此始，但学生是不分蒙汉的。蒙校的汉族学生并不少。1926年，把什蒙校改为土默特第八国民小学校，校长阎照离，学生增到六十多人。阎校长鉴于学生多坐不下，在校西福在老人新盖的房里分设一校，由公和寺拨出学生十人，校外另招了八九人，共二十多人，一人照顾不来，又请来尚志廉主管分校。土默特每月支給补助费十四元，余外都由学生负担。这期学生只蒙古学校可考的就有恩林、福林（克力更）、聚德、聚才等四十七人，上列四人都是外村蒙族，还有汉族学生十二人，女生一人。

第五批：1932—1949年（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八年）。

这一时期所学课程较杂，大体虽按部定课程进行，但还杂有学“四书”的。1933年，察素齐土默特第三国民小学因学生没来源而停办，全部迁到把什，仍用察素齐第三国民小学校名，学生增多，校舍不足，把什蒙民投资，添盖教室五间。1940年改名为察素齐把什联合小学。1941年又改校名为把什板申小学，1942年又改校名为把什板申初级国民小学校，1948年把什学校成为中心小学。同年中心小学迁到察素齐，把什学校又变成村办小学了。在这改动期间，任教教师计有王国楨、章文秀、丁秀秀、丰文华、郭恩善、郭存贵、李成焜等。学生人数保持在50—60人之间，全年经费约五百元左右，由土默特旗供给。

沦陷期间，把什学校名存实亡，因为当时岁数大一点的流向外地，参加革命，留校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外地教师不好呆，只由本村人来维持局面。正因为学校尽是小孩子，敌人也不大注意，支援大青山游击队的物资多存放在学校，然后设法运上山去。在此期间，参加革命斗争的本校学生可考知的有：赵振璧、荣世章、丁守仁、托林、云文义、云万虎、云文

（注）上面划分的五批，每批有先有后，两批交叉的人也多，本文只按时间长短归上拨下，详细、准确尚难办到。

礼、云文达、李华、云文宾、李芳（女）、丁彩云（女）、李培德、李存龙、李林森、云贵生、王锁锁、李满贵、云正旭、丁树林、云雨林、荣德贵、金计成、荣厚成、李文魁、李贵贵、李计生、云贵明、王贵树、李贵生、王贵林、德力克（女）。

保送延安学习的本校学生有：云维善（李志勉）、云维全（李新民）、云润润（女）、二兰（女）、丁松秀（黄静涛），丁贵善（潮洛蒙）、康桂英（女）等。

1950年，土默特第三小学再次迁回把什。校舍不够，在把什群众支持和李成焜校长的努力下盖起五间教室，统由地方开支。三个月之后，学校由旗政府接管，定名为土默特第三小学，不久改为土默特旗把什民族初级小学，经费由旗供给。这时除把什学龄儿童外，又从呼和浩特的土默特小学拨来各地学生不少，学生几乎遍及全旗，于是住校学生增多。全校实行供给制，学生食宿衣被、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统由学校供给。当时共有一至四年级四个班，学生五十一人，教室不足，不得不采取复式班教学。

1951年贾宝善同志来校，丁贵和、冯发生、荣世德、康福成、云德清等老师相继到校，课外开展了文娱活动。

1952年，把什蒙古族贫下中农把胜利果实的木料捐赠给学校，一次在公和寺校院建起二十三间房子，全校计有校舍五十四间，学校才按年级分班授课。同年各地学生云集把什，人数猛增至二百余人，教师七人，学校更名为土默特旗把什民族中心小学。是年全国工资制度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学生也由供给改为助学金。当时不论住校与否，每人每月发给助学金七元，贫苦学生另行补助。此时增设了五年级一个班。1955年第一个高小班毕业，学生绝大部分升入相应学校。秋季把什蒙汉合校，学校共有一至六年级十个班，学生达三百余人，其中蒙古族学生二百余人，住校生达八十余人，教职员工五十六人。是时李成焜任校长，丁贵和为教导主任，康福成教蒙语文兼管总务，学校人多

了，社会活动也加强了，文娱活动更为突出，学校成了把什周村活动的中心。

1958年，李成焯校长调走，丁贵和继任，荣世德任教导主任，师生共同经历了反右和大跃进运动。1960年，丁贵和、荣世德调走，董登美任校长，云如珍任教导主任。1961年，云如珍调走，锡振华任教导主任。1963年，公和寺大殿被拆除，学校迁往大青山脚下的荒滩。学校只有六个教室，其余什么也没有。1964年，董登美调学区，丁贵和、荣世德调回把什，续任校长和教导主任。同年乌兰夫主席来把什视察工作，并视察了学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及把什蒙古群众的支持下，从1963—1966年四年里在把什后荒滩上建起了新的校舍。这时有一至六年级十二个班，教职员工二十五人，其中蒙文专职教师四人；学生六百五十人，其中蒙古族学生二百五十人。经过建校，学校教室宿舍初步足用。

从1950—1966年的十六年间，学校共毕业了二十八个班，学生一千二百余人，其中蒙古族学生八百多人，以后升入大专院校的四十九人，参加工作任领导职务的二十五人。

1966年，造反派已开始向学校进攻，强占了公和寺校院，说什么学校是“反党叛国的黑据点”，教师是“黑爪牙”，学生是“黑子黑孙”等等，疯狂地践踏了党的民族政策。校名被取消，教师被关押，学生被打跑，民族教师无一幸免。学校变成刑场，教室设立公堂，宿舍成了牢房。白天，校院墙下站满了身着单衣单裤的全村受害者，在那冰天雪地中，一站就是半天，暴徒们还往受害者的头上脸上抹雪，甚至还给一些人颈上带桌面，挂粪桶，他们手持片刀、铁棍、木棒，威风凛凛地监视着。夜间，按计划给被关者“吃小灶”（即刑讯），什么“压杠子”、“捆吊烤”是家常饭，“栽杆子”（头向下靠墙立）、“烧山药”（把头塞进炉坑里，漏下火烧）、“烤馒头”（逼着把头放到生旺的

火炉上烘烤，不高兴还给炉里倒点水、“夹笔杆”（四指分开，指间夹进笔杆，指尖用铁丝狠拉）等，统其刑名，不下数百种。校长丁贵和被活活打死，学校变成人间地狱。十年浩劫，学校停顿了十二年。

十年动乱，不论在精神上、物质上、社会影响上，损失是十分惨重的。刘金财、春花两位蒙文老师一平反就离开学校回家了，临走时说：“我这才知道你们是怎么生活的”。公和寺校院被强占后，学校多年积累的教学资料、仪器、图书、桌凳荡然无存。

1968年，刚刚初建的后荒滩校址，宿占威以大队名义把新校址四幢十二个教室计三十八间房，以五万元卖给旗粮食局做了备战粮库。到1975年，云三娃仍以大队名义把公和寺校址全部卖给把什供销社做了仓库。经过这两次出卖校址，加上文革时期强占公和寺校址，把什民族学校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到1976年筹备复校，才由学校联系把卖给粮食局的三十八间教室收回。这件事，学校受尽了熬煎，旗粮食局白花了五万元，大队占了大便宜。

1977年，把什民族学校复校，并开设了初中班。学生增加了，校舍不足，一开始是一室三用，既是教室，又是宿舍，也当饭厅。建校已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了。于是全校师生参加劳动，把什蒙众也来参加，在各方面的支援下，迅速解决了校舍紧张的困难。这年的十一月上旬，正当筹备复校庆祝的前三天，学生云福锁因患急性脑炎，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家长来校处理后事说：“孩子得了急病，医院抢救无效，这不能怨学校，复校是大事，不能为这事受影响，要求学校找一本蒙文课本放进棺材里，满足福锁一心想学民族语言的愿望”。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全校人的心。

1978年，云国正任校长，荣世德任副校长，丁九恩任教导主任，学校逐渐转入正常。1979年，云国正调学区，荣世德任校

长，丁九恩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十一月十五日举行复校暨蒙语幼儿试点班开学典礼，参加庆典的有一千二百余人。1980年学校直属旗文教局领导。五月间，旗委决定，由文教局主持在学校举行前校长丁贵和追悼会，到会来宾有一千二百多人，乌兰夫副主席给寄来花圈。当时学校有一至八年级三十一个班，其中初中六个班，小学十八个班。此外还有蒙语教学五个班，蒙语幼儿二个班，学生共七百七十七人，其中住校生初中有157人，小学470人，幼儿70人，共697人。

1981年，依据内蒙教育厅指示精神，实行蒙汉分校。当初蒙汉合校时，教师学生合入学校带来为数不多的破桌凳，汉校校址也归学校做宿舍，后为公社占用，分校时公社已迁入新址办公，汉校校址本应交回，但以盖了房子为理由，几经磋商，才以一万七千元代价由学校赎回归汉校使用，教师学生将桌椅以移走人数每人一套带走。

1984年，荣世德改为名誉校长，丁九恩书记调走，校长由敖日格勒继任，苏布达任副校长。1985年民主选举校长，敖日格勒连任校长，赵德生任书记，云济友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苏布达改任幼儿班领导，领导班子变动较大。

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学校走过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经历了沦陷期的半停顿阶段，也渡过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兵荒马乱、驻兵拉夫的岁月；解放后刚刚走上安定发展的路子，却又遇上十年动乱毁灭性的打击，多年经营建设，变成一无所有的境地，地方修建的校址两次被卖，桌凳设备盗窃一空，直到1977年复校后，由于各方面的支援，逐渐成为现在的情况。在历次波折中，前人确实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心血，但也接受了不少的关注和支持。创业难，守成不易，后人应该重视过去的艰苦，应该把学校办得更好。

本文脱稿后，查得1978—1985年学生人数报表一份，谨付后

作参考。

年 代	初 中 部		小 学 部	
	班 数	学生数	班 数	学生数
1978	8	365	14	461
1979	11	368	15	529
1980	9	330	18	592
1981	5	186	14	424
1982	5	174	17	533
1983	4	128	10	352
1984	2	28	11	370
1985			11	297

幼儿班的创设，是在1978年土左旗把什民族学校谈起恢复民族语言问题时开始设想的。大家深深感到蒙古人不会自己的民族语言的痛苦。恢复民族语言也是土默特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过去采用以汉语文授课加学民族语文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收效不大，有许多人用心学了五六年，结果还是不能说，不会写，听不懂。加授蒙古语文是不适应实际情况，因而产生了一些设想：

一、恢复民族语言，必须走学用结合的路。光学不用，前学后忘，难以巩固。加授办法之所以收效不大，主要毛病就在这里。

二、学民族语文，必须有合适的语言环境，“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是不会成功的。制造学习语言的环境，实质上也是学用结合，并锻炼了听说能力。

三、充分利用幼儿三至六岁学话最好时期的特点，有利于幼儿学话。

四、鼓励幼儿多学多说影响亲人，巩固所学。

五、要求幼儿必须常住学校，和保教人员常在一起，不说汉语。

六、课堂决不说汉语，课后提倡说蒙语。

设想终归是设想，把设想变成事实，还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当时估计的，只是：

一、幼儿岁数小，如何保育护理，还不十分明确；

二、师资缺少，哪里去请；

三、校舍桌凳没有，经费从哪里来。

实际工作中的一切困难，当时还没有预计到。

1979年3月初，旗文教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创建蒙语幼儿试点班的任务交给把什民族学校，民校校长荣世德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开始筹建，得到蒙古群众的热情赞助和支持，于是在校院西北角腾出一栋旧房，大队支援了木料进行翻修，全校师生和把什蒙古群众参加了劳动，抬土、垒墙、担水、和泥、搬石头。宿舍、教室、办公室、幼儿活动场所，初具规模，到十一月间，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校的蒙语幼儿试点班正式诞生了，招收了五十三名幼儿，分为两个班。入学后，幼儿全部住校。

幼儿班的诞生是全校教职员员工付出了极大精力创建的。幼儿班新到老师的老师也都参加了劳动，亲身投入筹建活动。年高体残的苏文秀老师和来自乌兰察布十七岁的斯仁老师，一到校就投入战斗，主动承担了清除垃圾、平垫校院、粉刷墙壁、油漆桌凳的工作。苏布达老师原为锡盟阿诺旗的小学教师，为支援土默特恢复民族语言的事业，毅然应聘，沙茹娜老师，在家乡已领到大庆油田的招聘表，也放弃这一机会同苏布达老师一道来校。当她们到校时，正值房屋翻修未久，屋里很潮湿，她俩二话不说，亲自

找木板搭床铺。

幼儿班开始，一连串困难也跟着迎了上来，离开妈妈奶头不久的孩子，吃、喝、拉、撒处处需人护理，起、睡、铺、叠样样离不开老师，洗手脸、穿衣服、梳头扎辫，都得老师关心，一时照顾不到，自然要出问题，即便事事留心，有时也会发生事故。幼儿想家是常情常事，有的偷着往家跑，有的因想家哭闹，有的贪玩碰伤，有的互相打骂。有一次家住朱尔沟村的孩子布和，晚间不见了，估计是往家跑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夜间单身跑三四十里路是会发生危险的。幼儿班老师着急得很，骑车子追，步行查问，一直追出十几里才把布和追上。布和找回来了，谁能知道他不再跑？苏布达老师主动经常和他在一起关照他，夜间搂着他睡，日久了，他跟着苏布达老师不离，夜睡间常把老师叫妈妈，一个还是姑娘的老师被孩子叫妈妈，总有点不自然，但她深知布和跟自己近多了，心里很高兴。幼儿班的老师们常说：“我们远离故乡，日夜操劳是累一些，但一看到孩子会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心里是满高兴的。”孩子们年龄小生活不能自理，离开家来过集体生活，又有些不习惯，每逢假满常推托不愿离家。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去学校，常给带一些孩子爱吃的东西，却没注意到孩子吃多了，肚子胀得哭闹，着了凉又要拉肚子。安排好孩子们的生活，过生活关，成了不容忽视的工作。幼儿班的目的是学会日常使用的民族语言，必须过语言关，过语言关之前还得先过生活关。

幼儿班没现成课本，教材都得教师自己编。从牧区请来的老师汉语不大通，教的又是一伙连半句蒙语都不懂的孩子，这是十分困难的事，但幼儿的模仿性、适应力都很强，不久就克服了这一困难，用蒙语代替了汉语。这两关过后，困难少了，孩子们也习惯了，本村幼儿在放假后还留在学校玩不回家（外村有家长来接），孩子们学到的话多了，能用民族语谈话了。有些孩子放假回家当起小先生来，教弟妹和父母学民族语言，家长高兴得不得

了。这一情况传开后，呼和浩特市蒙医研究所大夫丹津老人，专程来把什幼儿班访问。幼儿教师把孩子们集中到教室，丹津老人亲自用民族语言和孩子们交谈。起先孩子们不大说话，老大夫就先用蒙语讲笑话，孩子们听得都笑了。老人知道孩子们听懂了，接着和孩子们拉家常，孩子们敢说话了。丹津老人笑着说：“我来考考你们，让谁回答谁回答，回答得好，我请大家吃糖，行吗？”孩子们齐声说：“行”。老人一连问了七八个孩子，都回答得挺好。中间有没学过的词，还当面请教，老人高兴极了，和孩子们说笑开了。这时太阳落山了，老人赶快出去给买糖，供销社早已下班关门了。丹津老人询问售货员的住处，有人建议：“下班了，明天再买吧。”老人说：“不行。我不能骗孩子们！”他终于设法找到供销社的人，买了不少糖果，回校给孩子们吃。

幼儿在一年里学会课堂用语、日常生活用语，通过讲故事也学得了一些社会用语，但对牧区常用语知道的很少，于是在假期组织到牧区学话的夏令营。1980年到四子王旗走了四十来天，学生五十余人，参加了“那达慕大会”，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照顾和欢迎，也学到不少新语汇。

记得在幼儿班初到乌兰花还在找住地的时候，一个牧民装束的老太太来问：“你们是不是卖小孩子的？要卖我买一个。”教师把实情告诉给她，她说：“可勒克依（可怜的）！土默特人丢了蒙古话，这么大的孩子，来这么远学话。”

1981年，王庆老人来校，考查了幼儿班学习蒙古语的情况，临走时他说：“我教了一辈子蒙文，总没想到从幼儿抓起，这办法很好。一个不会蒙话的孩子，在一年里学到这样实在想不到！”

同年，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苏鲁局长来校视察，并当面试问了所学蒙语情况，认为这办法是成功的。内蒙古委舍诺主任来校视

察，对幼儿班极为赞赏。

1979年，土左旗旗委云瑞书记拨款给建校舍。内蒙社会科学院浩帆同志给了五百元为幼儿班寝室、教室糊了顶篷。内蒙民委李森主任拨一万五千元给幼儿班盖房子。复校暨幼儿班开学典礼中，各单位、个人总共捐赠财物达四万元。幼儿班的校舍就是在这样支援下兴建起来的。

1982年，学校组织了第二次夏令营活动，地点在锡盟的正白旗。学校鉴于上次与当地学校合班上课的办法，对牧区的实际接触太少，收效不大。这次采取把幼儿分散到牧民各户，既可学话，又能熟悉牧区生活。这一办法一经协议确定，牧民一下子把七十多名幼儿抢光了，有几家没抢上，还得从抢得多的几户中抽补解决。夏令营结束时，学校去人挨户访问、致谢，并送去幼儿伙食等一切费用，领孩子到集中地，可是牧民老爷爷说什么也不收这些钱款，并要将孩子亲自送往集中地。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他的一切要求。到了集中的日子，也就是走的日子，牧民老爷爷亲自把孩子送了来。孩子们上车了，他们围住车嘱咐孩子们。开车前，请求他们离开车身，他们只向后退了一步，眼里掉下了泪。车开动了，孩子们淌着眼泪招手，牧区老爷爷也哭泣着挥手。当时情景确实万分感人，全体教师也都流了眼泪。当车走到半路时，孩子们拿出牛奶、奶豆腐、奶皮给接他们的老师吃。老师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说：“在我们离开牧区爷爷家时，爷爷给我们准备了这些东西让我们在路上吃，还每人给了我们一元钱，让我们在火车上买苹果吃”。啊！慈祥的牧区爷爷，伟大的民族情感！

蒙语幼儿班是一颗新生弱小的幼芽，她极需要阳光、雨露、肥料和护理。她没有经验，缺少借鉴，单靠几个人的设想去办，不足和错误是肯定不会少的。幸蒙各方关心者（包括集体和个人）的耳提面命，亲自来学校具体指导，使我们纠正了不少错

误，改进了不少工作。如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包括八个省区）、呼市蒙古幼儿院、呼市蒙古学校，都给我们作了具体指导。亲身来校指导的，从省区来说，有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云南、广东、吉林、辽宁、黑龙江，其中有二、三次的。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来校多次，并派幼儿教师七人在学校住了三个月，对我们帮助极大。从民族角度来说，有汉、蒙、回、藏、彝、壮、维吾尔、朝鲜等。

从1980年—1982年旗政府拨款在点什气筹建了蒙古学校，把什民族学校幼儿班的学生已升到三年级，在1982年10月，蒙校校舍建成，把什蒙语小学班全部迁去。用民族语文授课的小学，正式在土左旗出现了，学生几乎是由把什民族学校全盘端去的，教师也拨去一大部。从把什拨去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毕力克达赖在全市蒙语授课数学竞赛中取得了第一名。

土默特左旗把什民族学校幼儿班从1979年创始到1986年为止，总计办了十九个教学班，学生五百五十五人。1982年把什民族学校一至三年级学生二百一十六人拨归蒙校后，本校只办幼儿班，没有小学班了。这是把什民校幼儿班的大致情况。

目前，土左旗幼儿班已在全旗展露新姿，并向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恢复土默特民族语言的曙光，已经出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深愿后继者突破困难奋勇前进，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土默特旗工商业联合会

薛 益 寿

一、组织机构的演变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和平起义以前，原归绥县实行的是保甲制。察素齐农商分四个保，商务会是第一保，王庆义是被雇用的一个保长。刚解放时，仍由王庆义负责商务会工作，刘宏图是文书。不久，成立了归绥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武祝华担任，毕克齐分会由副主任委员赵万山主持工作，王庆义留用为干部，调走了刘宏图，招聘了薛益寿为文书，毕克齐分会文书是张静安。两位主任不脱产，实际脱产干部三人。

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了归绥县工商业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商联）。主任委员索巨元，副主任委员赵万山、李希泉（供销社主任）；委员王有义、李占银（粮食局主任）、张德玉、赵秉山、张金生、牛金保、任天威、张守元、武祝华、卜玉山；其中王有义、李占银、武祝华、卜玉山为常务委员。毕克齐分会主任委员赵万山，副主任委员张德玉，委员杨志清、赵秉山、卜玉山、孙国华、傅执瑞。工商联做日常工作的干部是王庆义、薛益寿、张静安。一九五四年，结束了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局面，归绥县划归土默特旗，归绥县工商业联合会改为土默特旗工商业联合会。工商联的领导机构没有动，只是派来几名干部，进一步加强了工商联工作。派来的干部，有李振学（党员、秘书）、

刘启文、刘俊山、周亚贤、罗国章（通讯员）五人，连原来的三人，共计八名干部。

一九五八年土萨合并，工商联设在萨拉齐，并进行了改选。改选为主任委员王文焕，副主任委员索巨元、杜华，委员赵万山等人。脱产干部杨占林为秘书，还有原萨拉齐的干部侯佩、路贵存、阎英超等。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商联主任被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黑牌子，不少工商业者被揪、被斗。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无法贯彻执行，工商联无事可做，干部被调到旗人委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一九六九年，工商联宣布撤销。

二、工作任务与职能作用

土默特旗工商联是在上级工商联和党委统战部及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一方面是代表正当工商业的合法利益，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正当意见和要求，更主要的是掌握他们各个时期的思想动态，组织引导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破资本主义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遵守国家政策法规，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恢复国民经济时期

我国是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解放过来的。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一定的破坏，工业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国家的处境是一穷二白。为了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在解放初的三年里，国家大力扶持工商业，发放了大批贷款，工商联还统一组织到外地进货，市场上一片繁荣景象，工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可谓“黄金时代”。

在此期间，工商联还组织工商业者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扫毒等运动，揭发出隐藏在工商界的日伪长春警察局局长刘春田、反动会道门九公道头头姜兴伟等。这些人都受到了人民的制裁；还清算出官僚资本家原国民党绥远省参议员潘秀仁在察素齐元义成投资的一百多石小麦，全部上交了国家。通过“三反”、“五反”运动，端正了工商业的经营作风。偷税漏税、行贿受贿、以假冒真等资产阶级经营作风有了明显的减少。工商联还配合税务部门每月进行一次定额评比，教育他们爱国守法，树立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思想。

在这一时期，工商联还进一步向工商业者宣传党的政策，教育他们积极经营，解除思想顾虑。共产党没收的是官僚资本、大地主的五大财产，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和扶持的对象，不是打击的对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党对他们采取的政策是既斗争又团结，对其不法行为要斗争，对其积极经营的一面要团结；工商业者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对其采取的是赎买政策，只要不与国家为敌，遵守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党指引的道路走，党决不会抛弃他们。通过读报组的学习和首长的大会报告，他们的思想疙瘩解开了，经营态度端正了，不论是在户数上、人员上和资金上均有大幅度的增长。据一九五一年统计，全旗工商业经营者只有180多户（察素齐镇110户，毕克齐镇70户），其中多数是家庭买卖、夫妻店，合伙经营的不过十几户；从一九五三年底的数字看，全旗工商业经营者发展到634户，1,086人，资金171,000元，其中商业455户，687人，资金116,000元（包括摊贩、挑贩197户，207人，资金6,400元），工业、手工业179户，399人，资金55,000元。按行业分类，察、毕两镇情况如下：

察 素 齐 镇				毕 克 齐 镇		
百 货	16户	18人	9420元	10户	13人	6100元
棉 布	5户	19人	14700元	10户	10人	5700元
杂 货	10户	15人	8660元	15户	24人	950元
糖业烟酒	24户	24人	9200元			
文 具	3户	6人	1800元	3户	3人	3200元
医 药	3户	9人	5600元	7户	13人	1500元
面 食	16户	17人	1500元	15户	17人	
照 像	2户	2人	560元	1户	1人	210元
旅 店	9户	18人	1130元	9户	12人	2800元
理 发	3户	8人	800元	3户	6人	130元
糖 粉 房	6户	33人	3300元	4户	17人	1500元
碾 磨	10户	18人	7900元	12户	23人	7300元
饮 食	2户	13人	960元	2户	11人	870元
肉 食	2户	4人	220元	12户	17人	2600元
醋 酱	4户	6人	2000元			
成 衣	5户	10人	1880元	3户	5人	1000元
钉 尚 鞋	5户	14人	1400元	17户	17人	170元
木 工	12户	23人	2000元	6户	13人	2300元

察 素 齐 镇				毕 克 齐 镇		
铁 匠	4户	9人	3300元	4户	8人	700元
翻 砂	2户	4人	4000元	1户	2人	300元
白 铁	4户	8人	930元	1户	1人	30元
箩 笼	3户	8人	400元	5户	5人	150元
修 表	1户	1人	150元			
皮 毛	3户	7人	1900元	2户	5人	130元
洗 染	2户	7人	430元	4户	4人	600元
香 房	1户	1人	700元	8户	15人	800元
修自行车	1户	1人	120元			
砖 窑	1户	11人	1000元			
豆 腐	4户	4人	180元			
柳 编	1户	4人	500元			
化 工	1户	5人	550元			
银 匠	4户	4人	150元			
鬃肠加工	1户	1人	250元			
推 挑 贩	36户	36人	4000元	62户	62人	5200元

除两镇以外，各乡的煤窑、旅店、推挑贩200多户，400多人，资金34,000多元。

从企大小来看，我旗资金最大的是察素齐镇韩长春，3,500

多元，他没有雇用工人，只是家庭买卖；刘亮资金3,000多元，雇用两个店员；曹天有开的一个药铺，资金3,000多元，雇用一个店员；毕克齐镇宿耀武资金3,000多元，雇用一个店员；郝广生资金3,500元，没有店员；雇用工人较多的是卜玉山，他开的一个粉房，但资金也只有1,700多元；还有崔六八开饭馆雇用工人5人，资金仅有三、二百元。根据行业情况，没有工人就不能生产、经营，因此，这些人实际上也不够一个资本家。

在此期间，上级工商联布置过一次调查任务，内容是资金在2,000元以上的多少户，商业雇用店员二人以上、工业雇用工人三人以上的多少户。这次调查，也没有划分过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

合作化过渡时期

一九五四年以来，工商联工作更为繁重，任务更为艰巨。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商业者发展起来了，对党的政策也有了明确的认识，但对过渡时期新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有所怀疑，对利用、限制、改造，走合作化道路更有抵触。工商联发现了这些苗头，对他们进行了政策教育，辅导他们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让他们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将所有的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规道。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时，国家对粮食、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业者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思想顾虑。有些行业人员认为这下子可把饭碗夺了，买卖不好做了，生活不好过了，可是，国家对这些人的生活是负责的。国家按家庭人口负担，限量供给一部分面粉，最多每户三十斤，量少的每天十斤，制成熟食销售完了就算；棉布行业也给棉布销售，但花色品种上受到限制，原则上不能让你太肥，人口多的还给带易销品。党对私营工商业采取赎买政策，生

活上包下来，资金定息，公私合营后，定息七年不变，到时有困难，可以再延长几年。通过组织学习，使私营工商业者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并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能不走，只有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行不通。

一九五四年，农民开始组织了互助组，工商业者也有一小部分自动地组织了合作小组（联营）。有些没落行业，如制香业、碾磨加工业等参加了农业或其它工作。到年底统计，察、毕两镇共有工商业548户，956人，资金144,800元，其中商业369户，553人，资金92,800元（包括摊挑贩116户，116人，资金5,700元，行商4户，4人，资金750元）；工业、手工业179户，403人，资金51,800元，比五三年底减少86户，130人，资金2,600元。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时，我旗和全国一样，敲锣打鼓地一下子过渡到国营、供销合作社（按行业归口）、手工业合作社、组。和大城市不同的是没有走公私合营这一步，对老弱病残的、行业不好归口的，察、毕两镇各组织了一个商业合作总店。察素齐商业合作总店归旗商业局领导，毕克齐商业合作总店归供销社领导，各派一名公方代表。农村的摊挑贩，有条件的、身强力健的也过渡到各乡供销社，体力差的给供销社经销、代销。人员多的供销社，全旗进行了统一调配，许多人调配到郊区一带供销社工作。过渡人员、合作总店、手工业合作社、组都是工资形式，按月发工资，结束了资本主义自负盈亏、肥瘦不均的现象。一部分行业不好归口的（如理发业、旅店、照像、饮食等）都归合作总店管理，还有一部分既有土地又做买卖的，自愿归到农业合作社。这就完全体现了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包下来的政策，不是一脚踢开不管，而是做了妥善安排。

据合作化结束后统计，走过渡形式的100多人，走合作形式的察素齐镇175人，毕克齐镇105人，镇外35人。其中共分合作商店

17个，99人，资金13,627元；合作小组23个，128人，资金7,000元；公私合营1个，5人，5,100元；过渡人员的资金详细数字不太清楚。在清产核资工作中，工商联也做了大量工作。

“大跃进”时期

一九五六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五七年全国进行了反“右倾”运动，五八年开始了大跃进，大炼钢铁，食堂化，紧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然后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当时，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和生活上的安排问题，对于工商联工作来说，更显得迫切和重要。具体工作有以下几点：

①生活互助金

我旗工商业虽然过渡到了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但是，有的家庭人口多，负担重，生活上出现了困难。这些困难，除由合作企业公益金解决以外，工商联还创办了工商业生活互助金委员会。具体办法是由各工商业者工资中交纳1%互助金，集中到工商联统一使用，并根据个人申请、委员会评定，按困难大小分别成暂借给或给予补助。这样，工商业者对工商联组织就抱有一定希望，觉得能够给他们解决一定的困难。

②反右斗争

我旗工商业者，虽然没有划成一个右派，但是，在全国反右斗争运动以来，工商联还组织他们批判了全国工商界的一些右派言论。如大资本家右派提出的“定息廿年，一次付清利息”的谬论，实际是将资金一次要走，不走公私合营道路，这和国家提出的“人员过渡，资金定息，七年不变，到期有困难可以再延长一些时间”的赎买政策相对抗，等等。同时对我旗工商者进行了内部划分左中右，即根据个人平时的言行，再按照上级要求的

“中间大两头小”的原则进行排类划分。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思想改造的第一步。

③思想改造规划和各种形式的学习班

私营工商业者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资本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虽然走了公私合营合作化道路，但在思想上仍然留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能发财致富、能雇人剥削、利润超过一倍，就不顾国家的政策法令。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道路不自由、受约束、只能挣死工资，再加上当时人口多的负担重，所以，资金大的人更感到悲观。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工商联不但组织了生活互助金委员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首先，让他们认清社会主义是取消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教育他们从长远的利益看，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不能只顾个人和眼前困难；要求他们既然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跟着共产党走，每人就必须做出思想改造规划，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检查自己思想深处对党的不满，灭资兴无，向党交心。然后，针对问题，进行批判。具体做法是，已经过渡的人员，以往资金大、雇用过工人、店员的，有代表性地选送到乌盟工商联举办的学习班学习，时间是三个月；其余合作商店的工作人员，当地组织学习，每星期一次。在大跃进期间，察、毕两镇各举办了劳动锻炼学习班。毕克齐的在茶坊要了几亩地种瓜，还办了一个养兔厂。察素齐的也抽出一定时间到生产队劳动锻炼，帮助农业生产，还挑选一些人到萨拉齐参加政协举办的“神仙会”，向党交黑心。当时定的是，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根据交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以提高思想认识。

④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市场管理

那个时候，没有工商局、物价局、防疫站等，因此，市场管理、物价检查、食品卫生检查、度量衡检查等工作就成了工商联

干部的具体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时期

自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工商联的主任、委员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商业者就都被公司、厂、店的造反派揪出去审查，并给戴上“资本家”的黑牌子。这样，工商联这个组织就无事可做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算完成了。到一九六九年，正式宣布撤销了这个组织。

民生渠史话

冯 宝 璋

滚滚不息的黄河水，昼夜不停白白地从土默川西南流过。

土默川“十年九旱”。旱情严重的年份，农田无收，造成特大的饥馑。多少年来，居住在土默川的人们，梦寐以求地想开一条大干渠，引入黄河水来消灭旱灾。这仅仅是一个愿望。

（一）从勘测到渠成

1922年（民国十一年），土默川的一些开明绅士，为了将这梦寐以求的愿望付诸实施，从后套请来了民间的水利专家王同春（注），勘测了一条干渠线路：自蹬口黄河北岸开口建闸，由西向东，到达哈素海，利用黑河故路泄洪，注入黄河，全长145里。

王同春勘测的这条引黄灌地的干渠，关系到土默川人民的生计大事，因此，起名叫“民生渠”。

民生渠勘测后，由于工程需款数额巨大，地方上无力承担，搁置了五、六年，并没有动工。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1928年），土默川地区连遭三年旱灾。特别是1928年，滴雨未落，庄稼颗粒无收，加之兵灾匪祸疾病流行，人民无法生活，青壮年背井离乡，四出逃荒，老弱留居家乡，饥寒交迫，坐以待毙，到处是卖儿卖女、妻离子

（注）王同春是后套的大地商，小名叫进财，瞎一只眼，人称瞎进财。

散，家破人亡的凄惨景象。

这年的夏秋之交，地方人士丁培基、于孔昭、杨作舟等，力主以工代赈，开挖民生渠，取得绥远省政府同意，款由平绥铁路赈灾附加及烟款附加项下支付。并派丁培基、费怀永、裴贻忱、王大勋四人赴京与中国华洋义赈会的救灾总会协商，以均资合办，组成民生渠工程总监处。丁培基、于孔昭二人董其事，募集灾民七千余人，于1928年9月18日开工。省政府又委郭象极、严肃为委员参与渠事，旋以冬寒土冻停工。

第二年春、夏，又是滴雨未落，许多田地没有插耩，旱灾成了定局。四处饥民纷纷向萨拉齐涌来，以求生路。华洋义赈会与绥远省政府订立合同，改组民生渠工程处，由美国人艾德敷任处长、塔德任总工程师，增加民工人数，加快工程进度。六月份，萨、托两县政府签订了联合开挖民生渠的合同，对开凿民生渠的资金来源、资金使用等，作了十条规定。

1928年的夏季，时年二十三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来到萨拉齐一带采访，他报导了萨拉齐一带灾民的种种惨象，也报道了以工代赈开挖民生渠情况，以及民生渠引黄灌溉对解除这里旱灾威胁的意义。使萨拉齐和民生渠一时名扬中外。

1930年，开挖民生渠的民工骤减，原因是灾民不堪工头肆意盘剥、压榨、迫害。出现了《萨拉齐县志》里记载的“因办理未善，（工程处）与工人间发生齟齬，工人时有逃散者”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一年庄稼有了收成，灾民也能回家务农了。

1931年春，因民工人数不敷，当局派了七十师和七十三师四千多名士兵，参加开挖民生渠。6月中旬，干渠及七条支渠全部挖通，渠口进水闸也已建成。从1928年9月中旬动工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共用款八十多万元，挖通了民生渠。

（二）一条“民害渠”

1931年6月中旬民生渠及七条支渠挖通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6月22日，工程处举行放水典礼，国内外不少知名人士、记者纷纷前来祝贺、采访。但是，一开闸门，在场的人们全都傻眼了。因为渠位高而黄河水位低，河水根本流不进渠里去。来访者感到失望、扫兴；工程处的官员艾德敷、塔德等人既极度沮丧，也十分难堪。放水典礼不欢而散。

其后，艾德敷、塔德等人也曾采取过措施，在进水闸下边黄河南、北两岸垒石坝，企图提高水位。结果，徒劳无功，黄河水仍然流不进民生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土默川后，也曾经想利用民生渠。曾搞了一些小工程，并在民生渠上游的东富村、海岱村之间的荒滩上，开垦了稻田。结果，全都没奏效（解放后笔者还在这片荒滩上，见到当年日本人修稻田留下的痕迹）。

民生渠进不了黄河水，渠上桥梁又少，既不能灌溉农田，又阻碍了交通，对人民群众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1933年解冰期、1943年和1944年，黄河三次猛涨。河水涌进了民生渠，冲毁了不少建筑物，淤塞了渠道。更由于渠的北背挡住了从大青山流来的山洪，洪水没有出路，到处泛滥，平川淹成泽国。庄稼被冲，民房被淹，出现了土默川上少见的洪患。当地人民苦不堪言，称民生渠为“民害渠”、“民死渠”。1949年的秋汛和1950年开河时的凌汛，也给沿渠农民带来了不少灾难。

（三）转害为利

美国人、日本人都束手无策、半途而废的民生渠，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生。

“十年九旱”的土默川渴望着的是水，黄河里有的是水，开挖民生渠并没有错。黄河涨水，民生渠也有过渠满水急的时候，完全可以用来浇灌农田。基于这个想法，1956年中共萨拉齐县委和萨拉齐县人民政府决心修建、利用民生渠。县水利科提请内蒙古水利设计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修建工程方案及设计。

修建工程主要项目有：干渠上游段清淤，开深引水渠口；整修七座茅庵桥、二虎营桥；新建赵家圪梁闸、麻花闸和五座桥梁；在干渠下游另挖九条支渠，新建九座支渠口闸。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民生渠挖通之后，其所以一直未能利用，渠口地势高、黄河水位低、河水进不了渠是个主要原因。再就是原来挖的七条支渠，在干渠的上游，与干渠垂直，呈“丁”字形，干渠里即便有水，也流不到支渠里去。这次制定修建民生渠的方案，最主要的突破，是废弃了原来在干渠上游所挖的七条“丁”字形支渠，根据地势情况，在干渠下游新开九条支渠。支渠与干渠斜向开，呈“人”字形，干渠有水便能流入支渠。

修建民生渠的方案及设计，得到了上级水利部门的支持。1956年初，内蒙古水利厅召集了会议，张仁俊副厅长、乌盟水利处刘天宝、薛世俊副处长、萨拉齐县委书记郭汉、副县长云福祥、县水利科长冯宝璋等人研究、审定了方案，并决定了工程投资。整个修建工程计划投资四十万元，由乌盟从当年水利经费中拨款二十万元，内蒙水利厅增拨二十万元。后因水利厅经费不足，增拨二十万元的计划不能兑现。投资缩减了一半，在工程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萨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决定：降低工

工程造价，上级投资首先用于满足建筑物工程，另给干渠清淤（十二万土方工程）适当补助，新开渠（三十二万土方工程）改由受益乡村负担。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修建民生渠的工程，专门成立了施工委员会。县长李瑞亭担任主任委员，副县长云福祥、县水利科长冯宝璋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内蒙古水利厅工程师赵广信、乌盟水利处工程师李玉珠、民生渠管理处负责人胡佳樵等人。

民生渠修建工程，由冯宝璋负责前线指挥，领导整个施工工程。下边有三个施工摊子，一是由内蒙赵广信工程师率领的水利厅施工队，负责修整进水闸、退水闸、倒拉板闸、七座茅庵桥、二虎营桥五项建筑物工程；二是组织民工疏通干渠、开挖支渠的土方工程，由各乡按任务包了地段，派出一名乡干部负责对民工的行政领导和生活管理；乌盟水利处将盟水利训练班的五十多名学员全部调来，由李玉珠工程师带领，指导民工按技术规程挖渠；三是水闸、桥梁技工队，专搞新建赵家圪梁闸、麻花闸及九条支渠的进水闸和五座桥梁的施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干渠、支渠上新建的十一座闸，全部是草闸。草闸原是后套地区群众创造的独特水工建筑物，建闸的主要材料不是石料、水泥，而是就地取材的只几、芦根、红柳、白茨等野生植物。在先于民生渠修建的民族团结渠施工时，曾聘请后套技工指导建草闸。民生渠修建工程上马后，从民族团结渠调来了这支水闸、桥梁技工队。其中，骨干技工有后套请来留用的秦子政、马成义等土专家；有在修民族团结渠中锻炼成长的新技工张柱、杜六十五、王爱等。他们对建草闸已经很熟练，在当时资金极度不足、又无钢筋水泥的情况下，因陋就简建草闸，达到了调节、控制水位，利用黄河水灌溉农田的目的。草闸，是发挥了历史作用的。当然，草闸存在着不坚固，年年要整修麻烦的缺陷，后来，条件转好都改建了钢筋水泥闸。

修民生渠时，遇到过许许多多困难。例如，在渠口和引水渠搞清淤土方施工，全部是流沙，随挖随涨，挖一尺涨八寸，难度很大。再如，建筑工具、运输工具奇缺，全县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记得修渠口进水闸时，缺了一块钢闸门，而在离渠口四十来里的七座茅庵村渠道上有座已经毁坏的水闸，闸旁有一块闲置的钢闸门。为了把这块闸门搬到渠口去，不得不向驻军部队求援，借用汽车，靠人海战术装卸，才解决了问题。所有这些困难，都靠集体智慧、施工大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一一解决了。

整个民生渠修建工程从1956年8月30日动工，只用了两月零二十一天，一鼓作气，全部完工。当年，利用秋汛浇地三万亩，1958年浇地面积扩大到十多万亩。

（四）利用汛期水

民生渠得到新生，名符其实地起到有益于民生的作用。除了党的正确领导而外，初期的修建工程，立足于充分利用黄河汛期水的指导思想是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也是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

当萨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修建、利用民生渠的任务时，水利技术人员思想认识并不一致。极少数技术人员认为，民生渠是“破茶壶”，不是“金饭碗”，美国人都没搞成功，我们怎能搞成？对修建民生渠持有非议、抱消极态度。多数的技术人员分析了实际情况，认为美国人的失败并不是干渠没有挖成功，而是支渠开挖不合理：开在干渠的上游，同干渠垂直，呈“丁”字形。支渠还没进水，干渠已被淤澄。另外，进水闸放水，没有掌握住黄河汛期涨水的规律，所以放水失败。原设计的缺陷，是可以纠正的，放水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

为了纠正原设计的缺陷，这次修建民生渠，新开的九条支渠，全部布置在干渠三十公里以下，开成了与干渠呈“人”字形。并在干渠三十公里以下的赵家圪梁建闸提水，大大减少了干渠的淤澄。

据测定，当兰州水文站流量达到1,500秒立方米时，黄河水便能流进民生渠。修建民生渠后，利用的是黄河汛期水。在管理上，掌握了黄河汛期水涨时才引水的规律。一般来说，每年有四次汛期，就是凌汛、桃花汛、伏汛、秋汛。在汛期民生渠管理处密切注视黄河上游各水文站（主要是兰州水文站）的预报，在水位许可情况下，便开闸放水。汛期过后，黄河水位下降，立即闭闸。为了防止渠口被淤澄，在引水渠口垒了土坝。

（五）扩大灌溉面积

民生渠自1956年修建后，下游十万多亩农田得到灌溉，解除了旱魔威胁。但在上游的五坝、明沙淖、大城西各乡，还不能受益，那里的人民呼声很大。

为了使民生渠上游的农田也能浇上水，1958年在渠口进水闸附近建起一座扬水站（后来，因在西边又建起磴口扬水站，习惯上称此站为扬水东站）。并且开挖了与民生渠平行的扬水干渠，安装了八台55KV高压电机和202J—70型轴流泵，民生渠上游十几万亩农田也都能灌溉受益了。为了扩大灌溉面积，1958年新开了跃进渠。跃进渠的上游与民生渠上游基本平行，到了距黄河口18公里的大城西附近，跃进、民生两渠汇合。在两渠交汇处建筑了枢纽工程。而后，跃进渠朝东南挖到大岱乡沙金兔。跃进渠全长77.9公里，从大城西枢纽工程起，跃进渠与民生渠呈“人”字形。

开挖跃进渠和建筑大城西枢纽工程，是采取边勘测、边设

计、边施工的跃进办法，速度也是跃进的。整个工程于四月初开始，冯宝璋陪同萨县县委副书记雷飞、内蒙水利厅工程师张恩忠在前勘测选线，测量队随后测量、设计，五月份全面开工。跃进渠连同支渠共一百五十多万土方、二十多座建筑物，到十月底全部竣工。桥、闸等建筑物工程（包括大城西枢纽工程），当时都是草闸、木桥。

民生、跃进两条干渠，后来陆续改建、配套，草闸、木桥都已淘汰，另建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性工程了。现在，两大干渠上共建有分水闸、节制闸十八座，测流桥十八座；支渠闸一百一十二座，简易测流桥九十二座。

新开跃进渠后，民生、跃进两大干渠仍然只能利用黄河汛期水，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农田要用水，什么时候就能放水浇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起先是寄希望于开挖黄灌总干渠（俗称二黄河），由巴盟三盛公枢纽闸供水，通过土默川，再注入黄河。后因工程浩大、问题多（主要是通过包头市区的问题不好解决），下了马。后来，改为在磴口建扬水站。

1964年作了磴口扬水站的勘测设计，并进行了施工准备。1965年施工，1966年秋竣工，1974年进行扩建。扩建后，磴口扬水站总装机二十台、装机容量四千八百二十瓩，总扬水能力为五十秒立方米。

1972年成立了内蒙磴口扬水灌区管理局，由内蒙水利厅直接领导。现在磴口扬水灌区可灌面积达92.6万亩，灌区范围包括包头市郊区、土右旗、土左旗、托县四个旗、县、区的三十个乡。

（六）消除洪水灾难

前面提到：1931年6月挖起民生渠后，黄河水进不来，利用不成，又由于渠北岸渠背挡住了大青山洪水的出路，每逢雨季，渠

北平川洪水成灾。当时，民生渠不得利，反受害，惹起群众不满，称之为“民害渠”。

解放后，改造了民生渠、新开了跃进渠、建立东扬水站、磴口扬水站等等，解决了灌溉农田得利的问题，还有个防洪、泄洪消除洪水威胁问题需要解决。为此，六、七十年代，先后修建了五当沟泄洪工程，哈素海泄洪渠、哈素海围堤、泄洪大闸等工程。

五当沟洪水泄入黄河，必须通过民生渠及与民生渠平行的跃进渠上游段（即现在的总干渠）。1963年，在民生、跃进两大干渠的上游（距渠口10.8公里处），建造了立体交叉的泄洪工程（由内蒙水利设计院设计）。该工程分上下两层，上层是洪水渡槽，下层是渠水涵洞。洪水渡槽是箱形的钢筋混凝土整体结构，泄洪流量1200秒立方米，下层涵洞共六孔（民生渠、跃进渠各有涵洞三孔），每孔涵洞宽、高均为2.3米，长186米，过水量30秒立方米。

五当沟泄洪工程的总工程量：钢筋混凝土及素混凝土为三千立方，干砌石及浆砌石为八千五百立方；土方四万八千立方；总投资三百多万元。

民生渠进水后，有一部分水，有时甚至是大部分水，流入哈素海储存。哈素海犹如一个大水库，起着浇灌、蓄洪等调节作用。为了提高哈素海蓄洪能力，1960—1965年，先后建筑了哈素海东、南、西三面的围堤，1980年又修了北围堤。哈素海四周围堤共长24.2公里。

为了便于哈素海泄洪，1961年开挖了哈素海泄洪渠，1965年兴建了哈素海泄洪大闸（退水能力为50秒立方米）。西堤由大闸至三道河乡槽牛营，东堤由大闸至托县七星湖，与大黑河汇流退入黄河。

五当沟泄洪工程、哈素海围堤、泄洪大闸、泄洪渠修建后，洪水有了出路，起到了防洪作用，保证了安全。

此外，为了浇灌哈素海以东的农田，1958—1960年，土默特旗和托县联合修建了哈素海第一扬水站，装机440瓩轴流泵八台，出水量4.8秒立方米。同时开挖了哈素海至托县乃只盖乡的干渠，全长30公里（其中土旗段为18.6公里）。1973—1975年，扩建了一扬站，新建二扬一站、二扬二站，又开南分干、北分干两条干渠。一扬站扩建，增加水泵三台，装机容量465瓩，出水量4.5秒立方米；二扬一站装机1550瓩轴流泵10台，出水量10秒立方米；二扬二站装机620瓩轴流泵4台，出水量4秒立方米；南分干渠长23.73公里；北分干渠长33.78公里。这些工程组成了现在总共机泵25台、装机容量3075瓩的哈素海扬水站，灌溉面积为三十一万多亩。哈素海扬水站的供水，主要是由民生渠负担的。

（七）富起土默川

老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句话就不适应了。拿土默川地区来说，引了黄河水，农田水利建设事业大发展，成了广大农村奔向富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土默川的土地是肥沃的。但是，在旧中国，这肥沃的土地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历代政府不修水利，使这个干旱的地区经常被旱魔所欺侮，灾荒连年，家破人亡。这片肥沃土地成了出灾民、出乞丐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财经、物质条件还很艰难的情况时，处处为人民着想的党和人民政府，就下了决心，化大力气，组织人民群众修建民生渠。后来，又新开跃进渠，兴建扬水站，引黄灌溉了近百万亩农田。土默川干旱面貌大改观，由经常遭灾、农田荒芜、贫穷苦难的旧农村，转变为基本上旱涝保收、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塞外“鱼米之乡”。

过去，民生渠范围内，七十多万亩地只能种子干埋等雨，种靠天吃饭的糜黍，不种需水量大的小麦等作物。即便是好年头，人民也常年吃糜米酸饭，很难吃到几顿白面细粮。如今，这里广大农村，到处是麦浪滚滚，成了米粮川，农民家家有余粮，白面、细粮成了家常便饭。

民生渠惠及包头市郊区、土右旗、土左旗、托县四个旗县、区的广阔田野，经济效益的全面统计数字，一时难以搜集。以土左旗来说，其经济效益就十分可观。在民生渠灌溉范围内，解放初期小麦种植仅几千亩，亩产百斤上下，根本没有种过甜菜等经济作物。现在，小麦扩种到十多万亩，由于不缺水，加上其他增产措施，小麦的亩产量已增加到四百斤左右，被群众称为“发财疙瘩”的甜菜，也年年扩种，旗内的民生渠灌区已种到两万多亩，亩产二千斤左右。灌区内其他作物也都是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民群众已经丰衣足食，生活蒸蒸日上，逐步走向了富裕。

1923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到萨拉齐考察、采访时，他所看到的是“许多街道两旁挤满快要饿死的男女老幼……不少人，除了缠腰布以外，全身一丝不挂，俯卧在大街”。萨拉齐昔日悲惨景象，震动了这位进步记者，他感慨地说，这里是他的觉醒点。然而，时隔56年，1985年夏，斯诺夫人又来到萨拉齐访问，当她看到这里完全另是一番景象后，高兴地说：“要是斯诺先生还健在，能亲眼看看萨拉齐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会含笑九泉了”。

是啊！土默川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赶跑了旱魔。昔日斯诺所见的饿殍遍地、到处是赤身露体、卖儿卖女的灾民的惨景，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斯诺夫人在土默川农村看到的，是渠道纵横、绿树成荫、禾苗茁壮、牛羊成群、工业兴起、新房连片；农民脸上没有饥色、没有愁容，而是衣着整齐，面色红润，精神焕发，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旱的土默川，有了民生渠，引来黄河水，成了“鱼米之乡”，这是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例证，一个缩影。

（胡志英编辑、整理）

责任编辑 云文瀚

三朝亲历话今朝

张 志 炯

我是萨县五区（善岱）三座茅庵（现属土左旗只几梁乡）村人，我亲身经历过日本占领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的新社会三个阶段。现在我已退休，七十来岁的人了，居安思危、忆苦思甜，在幸福的晚年之中，不由得爱想苦难的过去。因此，不怕自己文化水平低，大胆地写些史料，以供文史办的同志们作为素材参考。

一、暗无天日的年代

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十月中旬末，日本人占领了归绥（现呼市）、萨拉齐、包头各地。当时我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我们村是一个仅有二十来户，共约八十多人的小村，随着国家的倒霉，也马上陷入暗无天日的境地。一时天下大乱，不少的人就根据各自的条件，有的当了土匪，有的参加了国民党的游击队，有的跑到延安去抗日，都不愿当亡国奴。但大多数青年，由于家境不同，心里虽然不服气，也只好暂时当顺民。

日伪政权在善岱一建立，叫警察署，正式征收的是耕田杂税，门户费，车牛票，地捐红粮一齐逼，还强迫佩带“良民证”。国民党的游击部队是要，这种要是言出法随的。小股土匪是刁，这种刁是杀人害命的。但最可恶的是伪警察，他们戴的日本帽，穿着协和服，打听见谁家有些油水，就仗势欺人，敲诈勒

索，稍不如意，就给扣一顶窝匪或通南军的帽子。一九三九年开始，大青山里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活动在我们周村，一些伪警、汉奸又改变了调门，动不动就说你通八路。因此，只要是一个穿烂衣服的讨吃子到了家，也得向他说好话，要什么尽量给什么，怕他是一个汉奸特务向日本诬告。日本人为了镇压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从哈素村、五甲桥村经过我们村边，到达双龙镇，修建一条军运公路。在伪保甲长强迫下，家家出差去修路，不出人的就罚款，人、钱没有的就抄家（拿东西），只有给伪政权办事的人，或与伪军警有勾结的大户，才能逃脱这种苦差。那年头，日本人用毒化政策“鼓励”种大烟，所有伪政权、伪军警、以及汉奸、特务、土匪，无不要大烟，更加重了人民的灾难，闹得家破人亡，十室九空。就拿我家来说，我的父亲被扣押到伪官府迫害致死，留下我们全家六口人，我是最大的强劳力，才十八岁，因怕土匪，躲汉奸，白天劳动，夜晚隐藏。有一次被日本人看见了，放出狼狗追上我咬住了腿，把我揪倒在地，正要咬脖颈，那个郝督导唤了一声才放开，他们拥上来打了我一阵耳光，捆起来让我领到家里，我母亲一见到就讨告：“放开我的儿子吧，你们说咋办就咋办！”这些恶狼却说：“哼！先吃饭抽烟吧！”他们饭饱瘾过以后，把我放开了，临走时捉了四只鸡，赶走一百多斤重的一口猪说道：“给你共算三石糜子行啦。”可是过了三天，他们又来说：“要去挖战壕，派人也行，给烟也行，什么没有就不行。”我二次又跑又被捉住，狼狗虽然没来咬，却吊在二梁上，水沾麻绳打得我死去活来，我母亲应许下卖了房子送三两大烟板子，才算放下来。但没过几天，一个翻译领着鬼子来到我们村，硬说村里有八道，声称：“皇军让把房子都烧光。”当时各户的口粮还不太够，如果把房子烧光，连住处也没有了，于是都给他说好话，求乞不要放火，送他三两大烟也不要，幸好有一位在准格尔旗伪奇子祥部当排长的马三给说情，全村

凑起三十石糜子，换了三十两大烟板子交给那翻译，才象饿狼似地领着鬼子窜回窝去。马三呢，也要了三两，他说：“这是应得的好处费。”

不过，说我们村里有八路，倒是真有，当时有一位大青山里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名叫何奋时（编者按：何于一九四五年叛党，死于同年冬解放归绥围城时），他有时就到了我们村，住在我的堂兄家里，给我讲解革命道理，并嘱咐我们要保密。不久，离我村二里的南壕畔村人刘保和，因他在延安学习后回家搞地下工作，被善岱伪警署扣走，非刑拷打，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经家里托人说情送烟，才又释放。那位常去我家勒索的日特刘虎，却被捉到大青山处决了。

人们都在默默想着——中国几时回来呀！

二、恶煞横行的时期

数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熬到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中国突然回来了，兵山兵海，武器齐全，一色的黄制服，我们激动得咽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国可回来了！伪警察、汉奸、日特再不能欺负我们了，甚至还要惩办他们呢。可没料到这些人真“日能”，第二天也变成了中国军，当官还是当官，我们还是我们，地位不变，灾难依旧。我们在莫明其妙之后，冷静下来慢慢一想，才发现他们原来是一路人，除了名称叫得不同外，比前朝还增加了一项拔壮丁。真是走了凶神，来了恶煞啊！

说起拔壮丁，虽然已经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啦，但我每次回忆起来，凄惨景象，历历在目。真是“拔壮丁，去当兵，壮丁不够抓老翁，剃了胡须顶壮丁，麻绳捆绑送县城。妻子哭得断了气，老妈哭瞎两眼睛，娃娃嚷饿要吃饭，柴米无来似揪心。壮丁身犯何等罪，‘囚捆我们进衙门？’县长厉声喝：‘去打解放

军！’ ‘八路要共产’，‘我无半畦垆’，‘八路要共妻’，‘我还没结婚’。县长无言问，壮丁暗思忖”。

我当时正是拔壮丁的好目标，但有钱有势的人家，能抗能雇，我是寡妇老母小脚妻，小儿小女一大堆的人，只有逃跑躲避一法，还必须照料家里的农活，这种罪，真和狼狗咬腿的时候差不多，当然也不是我一家，而是普遍现象！

好在又熬过三年，共产党来了，绥远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国民党的这一朝也完了，我们才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的生活要爱护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了，党的富民政策到了绥远，经过减租反霸，剿匪肃特，土地改革运动，我们彻底翻了身，生活随之幸福起来。就以我来说吧，我是一个仅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解放后参加了工作，由于党的使用、培养、提拔，担任了哈素供销社的主任，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我能以一个泥手泥脚的庄稼人，居然懂得了为人民服务，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路线，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生气勃勃，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使生活幸福加幸福，而我们都必须爱护这种幸福。依我说，日本占领年代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那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有谁会欢迎它呢！只有今朝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人心民意所在。所以我曾告诫我的几个在工作岗位上的儿子们说：“做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咱们此地不产红薯种山药，你们如果不与民作主，就回来卖山药且吧，以免辜负了今朝”。

（责任编辑 张尔杰）

忆往思今话内蒙

——为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张 希 孟

(一)

内蒙是中国北部的长城，东连辽宁、吉林、黑龙江，西接甘肃、宁夏，南至山西、陕西、河北，北通外蒙，广袤绵亘数千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北部国防线上重要基地之一。它的历史悠久而复杂，自古以来，内蒙广大地区多为游牧民族杂居，人少户稀，土地广阔而肥沃。从秦汉以来，为了防御北边的匈奴，移民屯垦实边、迁徙汉民族十数万，并派军队保护，历朝不断增加，数以百万计，长期以来形成各民族交错杂居、互相帮助、融合的状况。满清康熙时代是鼎盛时期，由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迁来的汉、满、回各族人民越来越多，其中以汉人最多，其次是土著蒙人，满、回较少。从古到今，由于历史在不断变迁，内蒙也在不断变化，从历史上来看，现在就是内蒙的黄金时代，它正处于稳步健康的发展之中。今将我记事以来，所经、所见、所闻概述如下。

（二）

肥沃的内蒙，自古是养穷人的地方。内蒙的土默川、河套以及其它地区，自古以来人少地广，土地肥沃。我幼年就听爷爷说，我们原籍是山西榆次县人，前辈曾祖因贫穷、生活困难而背井离乡，来到土默川定居下来，到我整六代。年岁大了，接触的亲戚朋友多了，绝大多数都是山西迁来的，都是因贫苦不能维持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他们挑担、背负、推小车，带着极为简单的行李、引着妻子儿女，成群结队来到土默川和阴山以北开垦种地。勤劳勇敢的人，凭着两手逐渐创造出安居乐业的新天地。在河套这一带，鲁、冀、陕、甘、宁、青人较多，其后由土默川迁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如公布圪旦、大岱圪旦，证明是公布、大岱迁去的人多而以此得名。又听老年人说，只要勤劳、守本分，生活是不成问题的，甚至兴家立业。但也有个别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甚至不守本分、嫖赌、吸鸦片，结果沦为乞丐，冬天没住处，白天乞食、夜晚睡在牛马粪堆中取暖，光露头，身体蜷曲在粪堆里，听说来春必定死亡，可见当时社会悲惨的一面。总的来说，当时内地贫苦人对内蒙是喜爱羡慕的，由二人台剧《走西口》就可以想见了。

（三）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从满清到民国，列强势力不断地入侵扩张，租界、教堂林立，弄得中华民族丧权辱国，国内军阀依靠外国势力，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土匪遍地，骚扰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出生于1915年（即民国四年），听我母亲说，我出生的第二天土匪抢了善岱镇的福和当

（典当铺），并抢居民财物，强奸年轻妇女，母亲抱上我跑到三十里外姥姥家逃难。听说从此以后，不断有三十、五十成群结队的小股土匪流窜在土默川地区，我也亲眼见过和听人说过土匪抢财物，强奸妇女，请财神（绑票），拉骡马，甚至杀人放火。托县南窑子村我二舅苗昌，为了赎回表兄，弄得倾家荡产。象这样的事耳闻目睹不胜枚举。我也亲眼看到刘会文部和黑马队打土匪是为了发洋财。他们打上几枪，土匪扔下骡马财物为饵。他们只顾抢东西，土匪就逍遥而逃。

民国十六年土默川遭了荒旱灾，又逢阎锡山、冯玉祥联军打蒋介石，匪患未平又来兵患。不久奉系军队张学良由山海关进军华北，袭击阎冯联军后方。冯军败退，由张家口、大同、丰镇、集宁、归绥、萨拉齐、包头退入河套，沿途被土匪抢夺了无数枪支弹药，以此壮大了土匪势力。民国十七年，遍地是大股土匪，多者上千、三百、五百，骚扰蹂躏着土默川地区，人民整天在逃难、躲匪患，田园荒芜。在土默川流窜的土匪有“五座山”，即赵青山（赵半吊子）、郭春山（郭秃子）、徐松山（徐文标）、戴茂山（戴鱼儿）、金山（小金金），同时河套川也出现了千人以上的大股匪杨猴小，你来我往拉锯般地来回流窜，两川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奉军汲金纯任绥远省都统，他为了巩固政权，图得苟安一时，让河套川大土豪王英、土默川大绅士满泰、刘会文、陈玉甲出面收编土匪为军队，于是“五座山”都变成了师、旅、团长，但野性难改的土匪，白天是官兵，夜晚仍当土匪。人民称他们为官土匪，恨之入骨。斯年春天，萨拉齐发现灾异，一夜之间死了难以数计的老鼠，从此土默川广泛流传着“先死耗子后死兵，死了满泰死王英”的顺口溜。可以想见当时人民是多么愤恨他们了。可是满泰、王英都没死，可巧死了刘会文，人们又说刘会文生于鼠年，应在刘会文身上了。

民国十八年春干旱无雨，地干不能播种，夏天阴雨连绵遭了水灾，连续三年天灾人祸，米贵如珠，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卖儿、卖女、卖老婆，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自今老年人还留传着“十二盼”歌谣，反映了当年的悲惨情况。这首歌谣的内容是：

一盼到正月里，一斗高粱二三元，无钱难买肚里饥；

二盼到二月里，每天刮黄风，扛上楼（播种农具）地干不能种；

三盼到三月里，冻地消了个通，手拿锹挖点干根根（能吃的草根）；

四盼到四月里，去到哈素海，挖点蒲梨梨（能吃的水生果实）；

五盼到五月里，禾苗没一根，拿上锹去挖民生渠（“华洋义赈会”以开渠赈济饥民）；

六盼到六月中，天天下大雨，先烧椽、后烧檩，这样光景怎过成；

七盼到七月里，只好卖儿女，先卖儿、后卖女，卖了儿女又卖妻；

八盼到八月里，去口里眨儿女，眼泪汪汪实难离；

九盼到九月里，手拿镰刀割只几，有烧的没吃的，光景还是过不成；

十盼到十月，手拿布匹没人缝，你看伤心不伤心；

十一盼到十一月，遍地是冰雪，又挨冻、又受饿，难过又难过；

十二盼到十二月，眼看过大年，烧纸钱没一个，盼了一年整，挨饿、受冻、妻离子散刀割心。

绥远地区直到民国十九年以后，傅作义先生任绥远省主席，锐意图治，兴利除弊，组织保甲、全面剿匪，直到民国二十一年

以后，绥远人民的生活才稍有好转。

（四）

日寇侵华是内蒙人民最大的一次劫难。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海陆空三军向我华北、江南全面进攻，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我内蒙地区，只有河套川尚在我军手中，绝大部分地区为日寇所占。日寇、伪蒙军、伪绥西联军（王英）、特务、汉奸，加上郭长清、邬青云、曲步霄等不抗日专扰民的杂牌游击队，把整个土默川蹂躏得满目疮痍、血腥遍地，各族人民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毫无人性的日寇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1943年春天，我由陕坝出发，路经安北，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沿途所见都是颓垣破壁的废村庄，四天走了三百来里没见到一个人影。五天后才看见半荒废的稀稀落落的小村庄，但也看不到有壮年男女，只是老幼残弱之人，进屋土炕无席，窗破无纸，他们衣不蔽体，面黄肌瘦，吃了上顿没下顿，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萨县境内大青山一带才看到人烟稠密，牛羊等家畜，但也没见一匹骡马。据说都被游杂部队拉走了。这里大多数人家也是土炕无席，衣衫破烂，只有少数大户人家（如一前晌杨广德、永合泰尚威、六道坝杨安六等）与鄂友三、王有功、李海龙有拉笼，才能安然生活。鄂友三部、王有功部、李海龙部纪律甚坏，群众对他们是恨之人骨。只有一前晌、井儿沟中住窝铺，吃苦耐劳、纪律严明、抗日坚强的八路军最受群众欢迎，人民称他们为仁义军。延安发出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战到底的伟大号召受到全国军民、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全国军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用血肉、头颅换来了最后胜利，终于打垮了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

(五)

抗战胜利之日，也是内战开始之时。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不断发动反共高潮，但因大敌当前，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尚未形成大规模军事行动，直到打垮日寇，国民党要抢夺全部胜利果实，要想依靠美国的援助，一举消灭抗日的主力共产党八路军，才挑起全面内战，对此国民党内的一些人也不愿意。国民党立法委员祁定远（内蒙萨拉齐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硕士）还说，蒋、宋、孔、陈要打共产党，因为他们的财产没放处，太多了，就怕共了产，就必定要打共产党。虽只几句简单的话，意味着国民党的有识之士也不愿打内战。

这次内战，双方动员了几百万大军进行全面角逐，是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教育的总体决战。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优胜劣败，经过为期四年的战争，共产党因优而胜，国民党以劣而败。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人心大快。战争结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独立富强康乐的开始。

(六)

自从解放以来，全国一片安定，各行各业都在稳步前进，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好生活，真可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五八年突然刮来了“共产风”，城镇大炼钢铁，小高炉、土高炉林立；农村成立了大公社，小村并大村，成立管理区，小队并大队，大挖卫星田，集体吃食堂。驴、马、牛、羊、猪集中到大公社，成立了综合场。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死去的小牛、小马、小

羊、小猪无其数，卫星田也减了产。五九年由大改小，变成小型生产队。就这样由小并大，由大改小，朝令夕改，弄得社员精疲力尽，干部无所适从，生产上的损失很严重，连续几年农村产粮不够用，还吃国家返销粮。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年浩劫，全国动乱，国家的经济损失，文化破坏，更是无法估计的。

（七）

“四人帮”被打倒了，暴风雨过去了，全国雨过天晴，人人被温暖阳光照到身上。拨乱反正，安定团结，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一系列英明决策象征着和平统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打倒北洋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如能实现第三次合作，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包括国外同胞）的共同愿望，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经得起考验的，只要坚持到底，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自从落实政策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内外朋友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好。几年来，内蒙各条战线都在快速发展，白云鄂博稀土金矿富甲环宇，煤炭、水泥等以及各项生活用品都在快速增产。农村变化更为明显。善岱自立起了粮站，前几年运返销粮的数字比菜余粮还多，八四、八五两年，我亲眼见菜余粮的拖拉机、小四轮、大胶车、小胶车每天从早到晚一辆接一辆连绵不断，直到粮站没放处停止收购为止。近几年来，农民生活显著改善，苜、白、面是家常便饭，有些人家还要从城市买大米吃。小孩子不愿吃馒头，开口要饼干糕点吃。大部

分家庭都有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一部分家庭还有洗衣机、电视机、录音机。不少村还出现了专业户和万元户。现在是内蒙有史以来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她正在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作者是土左旗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孙 才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2 4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